

戴
晴



邓小平在
1989

邓小平在 1989

戴
晴

新世纪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鄧小平在 1989
作者： 戴晴
排版與製作：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3296-3-9
定價： 港幣 148 圓

香港出版，2019 年 5 月。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封面及封底照片：楊紹明 攝

English Title: Deng Xiaoping in 1989
Author: Dai Qing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3296-3-9
Price: HK \$148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n May 2019.

Copyright ©2019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Cover photographs: Yang Shaoming

目录

写在前面	1
开篇	3
临近 1989	9
第一节 邓小平的大局	11
第二节 蓬勃的八十年代	15
第三节 价格闯关起波澜	17
冬春时节	25
第一节 君侧	27
第二节 民间	32
方励之事件	32
三峡新书发行会	44
京丰宾馆会议	46
第三节 拉萨	48

春夏之交.....	51
第一节 耀邦辞世.....	53
第二节 李鹏登场——文吓开锣.....	66
4月23日.....	66
4月24日.....	69
4月25日.....	73
4月26日.....	76
4月27日.....	78
4月28日.....	84
4月29日.....	84
第三节 紫阳回京.....	87
4月30日.....	87
5月1日.....	89
5月2日.....	90
5月3日.....	90
5月4日.....	94
5月5日.....	96
5月6日.....	97
5月8日.....	100
5月10日.....	103
5月11日.....	106
5月12日.....	112
5月13日.....	112
第四节 会见戈尔巴乔夫.....	120
5月16日.....	120
5月17日.....	132
第五节 小平出手——武吓登堂.....	140
5月17日（续前节）.....	140
5月18日.....	144
5月19日.....	150
5月20日.....	158
5月21日.....	169
第六节 重兵布下——政局重整.....	185
5月22日.....	185
5月23日.....	189
5月24日.....	191

5月25日	194
5月26日	196
5月27日	197
5月28日	201
5月29日	202
5月30日	203
5月31日	205
第七节 镇压“反革命暴乱”——平民之血	213
6月1日	213
6月2日	215
6月3日	223
6月4日	235
6月5日	238
6月6日	241
6月8日	241
6月9日	241
炎炎夏日——处理异己	245
阴冷深秋——以退逼退	255
又一春暖——扳回一局？	265
尾声	283

写在前面

这里，呈上一部……“未定稿”。

“未定”，有哪个尚能喘气儿的著者，有胆、有脸、有良心……如此做？

当然，四十多年前，思想解放之曙光初露之时，社科院曾有过就重大、有争议议题发表“破冰”式意见的《未定稿》杂志——此书之胆气，或许来自这里？

著者工科出身。与《未定稿》杂志的作者比，文史哲专业训练，可说为零。将这本“未定”奉献于此，第一缘由，自然是飞逝的时日：30年了，著者从48岁长到了78岁，累积于心的史实与史识，还能再等吗（本书大量引用《李鹏“六四”日记》、《中国“六四”真相》，里边有多少遮掩、编纂……还是得用）？那么，等官家原始档案公之于众，猴年马月？

17万字“未定”奉献于此，所依据的，是著者作为亲历者、作为调查记者的讲述；是30年来所能翻检到的著述与文档；还有，对可敬的（“豁出去了”的）当事人的采访^[1]；当然，特别仰仗的，是历世阅人凡半个多世纪，日渐养成的逻辑与常识的交叉印证。

在这本书里，希望向读者呈上新的思索——

不再以学运（以及后来的所谓“民主运动”）为主线；

不再如30年来大多数评述：专制 vs 民主、当局 vs 学生、非黑即白；

邓小平在1989，反映出的，是红色中国发展至20世纪末的本质；

八九六四——中国现代化转型悲剧，命定？

[1] 但他们当中的多数，依旧生活在时时遭受打压的恐惧之中。所以，出于安全，文中的“某”字，一再出现——著者请求原谅的同时，也在这里敬告读史人：他们的原名和采访录音录像，都妥善保存。

“未定”，力图展现出具有中共特色的政争权争——

在皇权时代、在红色的毛时代、在邓的改开时代；
与之共生的，“形右实左”之民运，及其领袖。

切望，即使未定，《邓小平在1989》，值此30周年之际，为我们后世探索中国道路、探索中华文明、探索中国人在地球上的资格……得以留下：有限的史料和无尽的叩问。

开篇

1989

这一年，世界局势——够火爆了吧
而中国首都
正规军弹压本国平民
竟成全球关注焦点



就在 1989 年正正中间的三天里，5 月 31 日到 6 月 2 日，85 岁的邓小平，拼却生命余晖，做出了关乎他自己、他的党、他的国、乃至日后整个世界的决断——

政坛重整、弹压平暴。

自己开拓出的局面，绝不容干扰。为此，不计任何手段。

红旗，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已然飘了 40 年。此刻，古老中华帝国的五代古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枪声大作，坦克开进了天安门。

现代装备的野战部队成建制地出动，沿街射杀学生和和平民。

血溅长街。临近各医院死者与伤者堆积……

“平暴”胜利结束！从 6 月 4 日到 8 日，往日里旖旎优雅的五代古都，一片肃杀。

6 月 9 日，中南海怀仁堂。总头领邓小平终于出场，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怀仁堂，这座单檐歇山顶大殿，既具现代生活需要的各种功能，兼备没人不明白的正宗皇室范儿。而且，怀仁啊——

“人民子弟官”们，正襟危坐。

他们可曾想起 1955 年“对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授勋典礼”？那次论功行赏，册封了十大元帅，毛本人荣获一级勋章三大枚。或者他们会想起精彩的“怀仁堂布局”，一举擒拿毛之亲密战友？或者，轰轰作响的坦克履带声还没褪去，他们脑子里已飘过怀仁堂舞会上的莺莺燕燕，外加名角儿争相献艺的高端堂会？

或许有人会想到更久远的事？这怀仁殿堂下，埋着仪銮殿哪！暮年的慈禧亲手把她自己精心选立的光绪皇帝送到不远的瀛台囚禁，自个儿再次端坐重理万机。

“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此时此地，受到高龄85的小平同志亲自接见——怀仁么？不见对百姓与学生的安抚与忏悔，他只为“死难的烈士（20万官兵当中的15位）默哀”。

之后，这位最终决策人紧接着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什么风波？什么国际和国内的气候？开放世界吹进的普世之风？不甘为奴之平民的呼号？日渐成熟的民间社会？或者，常委们、元老们（以及这位、那位元老的代言人）谁下谁上？也许，还有赵紫阳——看走眼了？师徒主仆二人，对“学潮”的判断、心灵深处的价值，竟然如此南辕北辙……

但小平，只抖“面上”的、或曰上了《人民日报》社论的话：

“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

而“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原来如此。

“四个坚持”，什么阿物儿——独裁、专制、攥在手里随便捏的制度和主义？但他确实明明白白地说：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是这样么？怎么回事呢——莫非“做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做”？这里必须讲讲著者的亲历了：

不过两个月前，就在胡耀邦含冤离世当天，著者本人曾经亲历不曾为官家披露、也不曾为研究者注意的一场准高层会见：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汪锋。

想来胡的离世，在那一刻尚未影响到党政常规工作，汪主任于是也没有修订他事先准备的谈话——意图通过台湾享有盛誉的严肃传媒，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

那是4月15日上午，在北京饭店的一间不大的会客厅。汪锋主任面带微笑，几句“欢迎多回来看看”的客套之后，直奔主题：“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

如果读史诸君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对接下来的“理论务虚会”截然对立的上下两段（上段批“两个凡是”下段推“四个坚持”），以及整个1980年代这“坚持之金箍”——中共执政之道统——如何一次次挥舞，径直砍向正在民众中萌生着的自由、自立、自尊……略知一二，就能想象，此话从汪先生口中吐出，笔者所感受到的冲击了。

30年过去。以上所述现场，已非孤证。从中枢人物的回忆录知道，邓做此想，即汪锋所谓“最近”，是在那年（1989）年初：而“四个坚持”的起草者胡乔木，早在一、两个月前，在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之后，已经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采访鲍彤）。

如果没有五月底六月初那三天里的决断，如果没有这血腥支撑下的稳定，这声音本可以传出去，传遍世界。中国百姓或许从此得以步步挣脱红色桎梏，感受并且享用稍许不那么压抑的天地。

然而，六部口血迹尚未彻底清洗，面对党国钢铁长城（首都戒严部队）百名军以上干部，他在怀仁堂大殿凛然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

难道胡乔木、汪锋在传谣？从4月15到6月9日，两个月都不到啊！



临近 1989

中国社会，分外活跃
政争权争，未见稍息



第一节 邓小平的大局

临近1989，85岁的小平同志，若说踌躇满志，也许嫌过于乐观，但心绪上宁帖坦然，大功可期，或许算得上吧——特别是和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此前几十年比：比如“五马进京”之后的蹿升；又比如此后二十余年在毛伟人麾下昂扬复志忑。

1976，上天眷顾之下，“大救星”殒天：改开上路。而今天的邓小平，已登上权力巅峰^[2]。

1988，十年啦！作为毛之爱徒而非忠仆，他不玩运动，也没整人，单凭干实事（当然外加机谋与手段），即获得全社会拥戴，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无论安享位高权重，还是自信雄才大略，邓此时，并没有什么“不胜寒”，虽然总须不时地或安抚、或打压各怀心机的壮心不已们，没完没了地左拽右攘、前推后撤……到了此时：改开十年后的1989，就开拓红色中国的新时代而言，总算布局完毕，得以充分展现自己了。

哈，“展现”，历来视野宏大、但不喜高蹈张扬的邓小平，虽然心里非常明白他将带领中国走出积弱积贫，继而富国强兵。嘴上说的，也就是“改革开放”——

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 这里特指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为毛所指定的华国锋后撤，将党主席和总理位子分给胡赵，邓自任中顾委主任和中央军委主席。以及1985年的全国党员代表会议——“老资格们”全部靠边，“政治局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党内排名第三位，但已近乎成为第一领袖；1981顾问委员会主任+军委主席；1986顾委会主任给陈云，1989退掉军委主席。

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邓小平年谱（1975 - 1997）》下卷）

望读史诸君特别注意这里的“贻误时机”——后边多少令人痛心乃至追悔的桩桩件件，都在这绝对“不要贻误”的不耐、焦虑、愤恨……中。

“布局”呢？这，可是说来话长，特别内中还有许多“说不得”。

十一届六中全会（1982）、全国党员代表会议（1985），解决了华家班和整批的“德高望重”，那应该算是开创改开大局之前的清场。

这是远事且不说。改开发轸之始，邓为自己选定了左膀右臂，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一线，由谁掌管？

在陈云家，以他八十分钟猛吸六支烟的拼劲，政治权争的对手，终于撮出胡之后日常工作的“五人工作小组”和挑选十三大一线干员的“七人人事小组”，尚称心的十三大班底终于到手，亮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及十三大之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力推进，“改革开放正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一路前行！

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是中国唯一出路，人心所向，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要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继续发展商品市场，还要发展要素市场；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即使先把绝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的幡子挑得高高，实行党政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完善人大职能，各种群众团体独立自主，坚持差额选举，保证选举人的选择权……

一连串颇中时弊的改革方针，足令闻者喜动颜色——虽然就在十三大政治报告当场，没灾没病的陈云，抬起腿提前退席。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倒胡的阴霾恍惚间似已消退。十三大闭幕式之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赵紫阳谈笑生风、挥洒自如，开明、开放的姿态，征服了在场记者和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改革开放的巨轮只是暂时靠岸，补充给养后又要启程。

作为邓小平精选的一线指挥（当然须听命于婆婆），1988，是赵紫阳在一线执政的唯一一个整年。虽然凶险四伏，他是镇定的，胸有成竹的，但也难免两头为难——这头儿是整个社会的活泛，那头儿是邓对“三权分立、轮流执政”之类西方民主杂碎绝不容忍；以及左倾卫道之毛法统，仍然甲仗鲜明。

整个八十年代，多少回合了啊。如何开拓，赵和他的同志，费尽心机，终于淘换出个既抵挡攻击、也还不算碍手碍脚的说法，以怗开时不时的当头棒击或斜刺里飞来的花枪，坚持前行。比如说这次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绝对急不得的“高级阶段”无限期拖后）。

允许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允许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原则长期存在，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正确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的批示，就五个字：

这个设计好！

然而在这里，邓赵二人完全心心相印吗？邓对于赵和他的团队的理念与理念，比如说对毛法统的彻底批判、对现代社会基本要素的心仪，有没有看透，看透几分？或者说两下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能说破？

毛殡天，毛时代结束了？

共产党建政近40年了，有谁斗胆在中土高呼：第一祸害中国的，什么？革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陈云、李先念，以及小平，包括“胡赵万”，都是革命起家、革命老手。“革命”有如病毒，在野时直接用枪：杀人抢地盘，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执政时间间接用枪：三大

改造、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怎么害苦了国家和国人，他们有几个认识到了？他们有谁会良心不安？

所谓“改革”，不就是退吗，退回到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退回到1940年承诺民主和自由经济的新民主主义；退回到国民政府尚未将自由资本主义和幼弱的公民社会蚕食净尽的1930年代；甚至退回到北洋政府时代：“积贫积弱”，但无党禁无报禁，言论与迁徙自由……一句话：从革命给中国造的孽里边退出来，从“全世界无产者”、从“祖国山河一片红”、从马列斯毛乌托邦……给中国造下的伤害、罪孽里退出来，抛弃革命派生出的体制、法理、规则，回到1928-1938民国政府最好的时段——那年头，尚可说藏富于民间吧？农民、市民、商民们，还没让当局勒索挤榨殆尽……

就恐怕是：“改也难”！革命体制的宿命在于，它是一个双向血腥筛选机，不论在朝的统治者还是在野的叛逆者，只有对生命漠然、对人权漠然的最血腥者才能胜出。

第二节 蓬勃的八十年代

革命体制的淤泥深深沉在塘底，表面的一池春水——整个民间社会，借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一个春天”的改开春风，活泛起来：各领域、各阶层。当然，每每作为社会变革大潮最先泛起的，是新闻界、学术界，还有大学。

不必说在这十年间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农民日报》……就连军报，全体无二致地享受有限精神自由的同时，蓬勃向上。

文革后归位、掌了点小权的“两头真”们心气也不亚于年轻人，王元化为首推出《新启蒙论丛》，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编辑《民主丛书》，于光远、冯兰瑞运作《马克思主义研究》（社科院马列所）。

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在1988年底（11月），居然与体制外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联合主办“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与会者：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三百多名。当年正逢蒋经国的政治改革出台，台湾报禁党禁取消——于是，在这次会上，主张去革命化、社会平稳转型的“开明权威”理论，由学人率先提出——完全没有官方干预，些许暗示都没有，完全出自学者们，在信息获得、学术自由的空间里，自主地探索研究^[3]。他们切切关注时局，自诩为“民间政改派”，已经有实力（包括政治空间），

[3] 对此，赵紫阳显然注意到了，并试探着与邓小平探讨：“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在此后的半年间（1988/11 - 1989/5），连续十多次主办“现代化”学术沙龙。

更有“八十年代整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的《走向未来丛书》。它的出生与成长都相当顺滑：挂靠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负责人是钟沛璋（前右派，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是当时的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喔。

另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因为邓朴方正担任着陈子明创意策划的《二十世纪文库》的主编（陈子明副）。文库编委无意仅仅把邓家大公子当作政治遮荫，他们尊敬他，认为他是具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的人。他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有意义的。“清污”风暴骤起，朴方坚持在发言中弘扬人道主义，直怼意识形态大主管胡乔木。而邓朴方也没有把陈子明等“四五”“西单民主墙”人士，看作潜在的什么什么。他和他们见面，共同讨论选题——这一姿态，是在台上的赵紫阳班子无论如何不敢做的。陈子明回忆：与他们在理念与目标上更加靠近的鲍彤，为避嫌，一直不允许政改办的人正式与我们接触。^[4]

但是，朴方与子明的携手，或许正是1980年代共产党宽容之亮色——在整个社会真正从底层、从精神、思想与创造力上真正活泛起来的同时，官民之间有机会实现和解？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面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4] 难以想象的是，这系列民间研讨会的操盘人陈子明，不到半年，就成了天安门“反革命暴乱”的“幕后黑手”，拘捕、判刑、监控直到他生命终结。

第三节 价格闯关起波澜

在经济领域，赵紫阳找到他认为最该做的：

推动沿海地区转上外向型经济轨道，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对此，邓小平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1988年1月间，为了研究和制订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赵紫阳主持中央常委、政治局及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了多次会议。此后，又召开了全国省长会议，进行部署。

当时经济形势也是几年来比较好的一段时间。不仅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而且出现了稳定协调发展的趋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除了农业以外，也比较好。农业当年也是丰收，当然有前几年农业的停顿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货币的发行没有超过计划，储蓄大量增加。这一年可以说，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有所进步。既没有宏观失去控制，也没有微观搞死。经济过热的问题、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情况开始有所缓解。要加强宏观控制，又要改善宏观控制，前几年在这方面经常发生些问题。从1987年的经验看，稳定经济和一定速度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是可以结合的。（赵紫阳《改革历程》）

物质丰富了，社会活泛起来，物价当然波动。加上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与不公……“国内零售物价总水平连续两年大幅度上涨”，不少地区开始出现商品抢购潮。本来，以价格调节掌控社会稳定，属世界难题，谁都可能主意，谁都无法保证这个或者那个举措会怎么走、怎么个结局。

这情景，对经济学没什么概念，但敏感务实、且时时关注改开走势的邓小平，对于物价问题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早有认识。早在几年前（1984、1985），他就正式说过^[5]。但是说了，谁接盘？怎么接？大家都在看。

3月间，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确认了关于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请求的决定。邓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赵领导。

这种“总书记管经济”的特异安排，体现邓的无奈和变通。赵紫阳谈到：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十三大筹备期间，邓小平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因为当时我不兼总理，李鹏当总理，许多人有顾虑，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我比较熟悉。而李鹏对经济改革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对他也不放心。所以邓小平专门确定一条，我不担任总理后，仍然要管经济工作，因而专门成立财经领导小组。财经小组实际上是使我继续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同上）

代理总书记的同时，继续主管经济工作，赵当然也在考虑如何稳定物价。但没有觉得这是当前的中心问题。在读了计委、财政、人行、物资局的联名的“采取措施稳定物价”报告之后，还说了“不要有了—个物价问题，就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这段时间的历次中央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还议到了廉政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改造、企业法修改、工会改革、做好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但从未涉及到“物价闯关”。中央原来确定的1988年的经济工作，还是继续执行“软着陆”的方针，没有出台大的价格改革的计划。

[5] 1984年11月9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负责人时说：“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赵紫阳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也曾直接指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

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吴伟）

倒是早在莫干山会议（1984年9月）一步步踏入决策层的青年精英，包括“红二”们，视野开阔，思想不拘一格。他们看到前兄弟东欧那边，还有自己这里，难免出现的价格泥潭，结合红色中国现实，认真思索、议论，承认该社会“惶然”和可能的对策：乘“老同志尚在，以权威”将此泥潭稳住。他们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应该趁着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把这最难过的一步迈过去（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3·2〈价格闯关的出台〉）。

1987年底，孔丹、秦晓等人约谈当时已是赵团队的唐欣^[6]，唐欣认为，第一朴方对邓赵合作抱有关切；^[7]第二觉得关键时刻、此等大事，必须对通过朴方向“老爷子”通气。唐向邓朴方转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论和抓紧时机“价格闯关”看法。朴方当时的反应是“知道。这个老爷子其实早就感到了”。

莫干山会议的价格组提出了双轨制，被赵紫阳接受。

从1985年开始实行生产资料的双轨制以来，对比原先僵化的大一统，既向市场价格迈进了一步，也滋生了腐败，引发社会不满。这个改革的过程也很漫长，除了一般日用品价格完全市场化了，很多重要产品、特别是要素市场，仍然是双轨制的。不过，学界基本认为价格双轨

[6]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副局长。

[7] 据零星记载，智睿、沉稳、与父亲同心同德，邓朴方在八十年代这最后几年，对政局十分关切。陈一谔说，十三大结束时，邓朴方让我转告赵紫阳，建议他“要注意和万里、李瑞环、江泽民、丁关根搞好关系。”……我直接向赵紫阳说了朴方的话，他非常感谢。

制用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成功的。斯蒂格利蒂认为与苏联经济改革对照，中国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是成功的“渐进式道路”代表。

1988年，5月5号，李鹏谒见，回答邓的询问，报告了七届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价格问题、双轨价格造成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的意见。邓小平对李鹏说了自己的担忧和判断，“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让他把这意思报告到政治局。事后，李鹏向政治局常委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得知邓小平发话了，赵必须做出反应。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资和物价问题时，赵紫阳开始明确谈到物价改革和“过关”问题：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几年内要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一大步，这一点事先我向邓小平谈过，他非常赞成。

后来，他公开讲过要闯价格关，要攻难点。还说，对我们以及国务院李鹏他们，怕的不是我们步子迈大了，而是怕我们动摇，遇到问题就犹豫、就退缩。（《改革历程》）

对“泥潭”也早有察觉且时时忧心的总书记，在常委会上使用了特别具有邓特色的说法：过关！过好这一关！赵表示，自己虽然不愿意贸然进行这场带有赌博性质的“价格闯关”，但他仍然必须听命于邓小平：

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映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同上）

赵紫阳的建议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赵责成姚依林负责，由国家计委具体研究实施方案。赵自己却在担忧：价格改革是否会引发社会动乱？

看到赵领导的中央动作起来，邓再催战鼓，他在会见外宾^[8]的时候，说得更鲜明了：

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还说：

对经济工作，赵紫阳同志比较熟，看来方针政策是对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将来出了差错主要责任是我的。（吴伟《1988年物价闯关高层决策》）

总书记再接再厉。5月底，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以霹雳手段收拾泥潭的工作，直接部署下去。从春到夏，此“再接再厉”一直延续到7、8月的北戴河会议。1988年夏季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了价改方案并予以通过后，准备于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开始实施。8月15-17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19日，《人民日报》“社论”高调推出《人民日报》发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与邓、赵，以及三个月来参与治理“泥潭”的领导们期待相反，仅仅是实行物价改革的传言，就已经在

[8] 1988年5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在谈话中，邓小平直接谈到了中国的物价改革问题。

社会上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抢购、挤兑、群体事件……在社会已经闻信而乱的情况下，此时《人民日报》抛出这个公报，如同火上浇油。

从7月之后，国务院也不再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账，架空紫阳，你开你的会，你提你的问题，不予讨论，更不执行。作为配套措施，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多次提出，尽快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以应对抢购与挤兑风潮。李姚呢，一拖再拖。

但除了小平以外的不少元老们，纷纷议论甚至谴责赵紫阳不务正业，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干涉经济太多。还有元老联名写信给小平告紫阳的状（吴伟）。还有人从北京给香港媒体“喂料”，说赵紫阳出了问题，已经不再管经济了。这谣言出口转内销，以至于小平当面问紫阳：“怎么香港报纸说你不再过问经济了？你怎么能不管经济呢？”

一心拥戴小平的赵，纷乱中悟出，对“婆婆”盲从而酿成祸患，谁都可以推脱，唯他这个一线指挥官（总书记），必须立即抉择。8月26日，赵紧急刹车。据吴伟记录：

赵紫阳说，当他对价格改革的步子该怎么走，要不要延缓进行有了新的想法之后，他事先给姚依林打电话说，考虑到当前形势，价格改革的方案是不是推迟出台，请姚考虑一下，先不和大家讲，免得动摇决心。姚依林说，是不是推到下半年搞。赵紫阳问推迟一年是不是可以？姚依林考虑了一天，同意推迟一年。然后赵紫阳找了安至文等几个人商议，又找李鹏、姚依林、张劲夫三人谈了一次。此后，赵紫阳找了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谈了他的想法，并请他们向小平汇报，商量的结果是大家都赞成，推迟钢铁价格的改革，整个价格改革的步子调小一些。（同上）

赵紫阳还在8月29日约王瑞林到办公室，比较详细地谈了那些新的想法，请他向小平报告，并且请他安排面见小平，和小平面谈这一重大决策的改变。邓小平回复说，同意这个部署，没有不同意见，不再谈了。这样才召开了暂停物价闯关的政治局会议：

1988年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会议指出：1989年和1990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即治理整顿）上来。治理整顿，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会议提出坚决抵制通货膨胀、深化改革的若干重要政策建议。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十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工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阐述“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

三个月的乱象，尽管邓曾说“一切责任在我”，但事到如今赵毫不犹豫地承担一切：

这件事如果讲责任问题，责任不在他身上（指邓小平），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改革历程》）

1988年12月26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生活会——仿佛批胡那次生活会的再现：

据《李鹏经济日记》，在会上，他们俩，总理和主管经济的姚依林，相当直率地挑头批评赵紫阳对国务院工作“过问太多”，弄得他这个总理很难当。他们还对赵一年多来主持的改革开放，一一提出质疑。姚依林甚至毫不掩饰地提到“攻价格关”，追问“什么意思？怎么出来的？”

赵紫阳没接话。

即使在监禁中，对这场面，赵也记忆犹新：

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

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

从1988年秋季以后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同上）

吴伟也记下当时的局势：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李鹏等人在保守派老人们的支持下，开始有恃无恐地抓权。他们“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试图把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

此后，他们借治理整顿开始大搞复旧，开改革的倒车。虽然赵紫阳带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提出对策，但李鹏、姚依林大都不予讨论，更不执行。（吴伟《物价闯关中止，北京刮“倒赵风”》）

临近1989，如果在这里引用赵紫阳后来软禁时候说的一段话：

1988年，酝酿倒赵。李先念在上海对下级公开骂我。李、王震、薄一波联名上书邓小平，弹劾我。有人警告过我。“六四”不是偶然的。

1988年是1989年的酝酿期、潜伏期，1989年整我明朗化、表面化。实际上，伏笔在1988年。……这些天，想了些，觉得1988年，远比我原想的复杂，微妙，值得深思。（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酝酿倒赵，意在邓公？对此，邓可有察觉？他将如何应对？

冬春时节

顶住挑拨 力保赵紫阳
紧锣密鼓 准备中苏会谈



第一节 君侧

从前边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1989年1月邓到上海之前，正是心绪相当忧烦之当口——从赵那里得知，借价格泥潭，他们（左倾卫道）正一步步过来，或许要重磅开打了。

就在上一年的年尾，1988年12月26日，政治局常委曾开了一次炮轰紫阳“生活会”。

到了1989。邓不得不发话了。据吴稼祥：

1989年元旦后，李鹏、姚依林等在政治局常委生活会上向赵发难后，邓很不高兴，召李鹏到家里来询问情况。李鹏做了解释和辩白。邓说，紫阳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李鹏从邓家出来，已是傍晚，饭也没吃，直奔赵紫阳家。（《泡面传奇：中国当代政坛的生死对决》）

赵家正在吃晚饭，一家人都围坐在餐桌。李鹏说：“刚从小平同志那里过来……”

在赵家，他大约待了10分钟，主要转述邓的两句话：一是总书记连任；一是“赵这人，有独立思考能力”。家里人记得李鹏还说：“这样就好了。放心了。”赵家人当时不大懂李为什么这么急，总的感觉是，虽然有价格闯关那一通闹，赵对李，没有什么“此人不可信”之类的感觉。

此次，邓面斥的是，是李和姚，但他何尝不知，这张狂，是背后有人。1956之后，邓与陈的“储君搏”（谁个最为毛属意？他们各自又最属意谁？）就没有停过，只是在随后残酷的风雨中，形势不时把他们捏到一个战壕——直到政敌一个个或亡或歼，最后剩下他俩互瞪。

这是邓的直觉。1988 价格闯关这泥潭，从搅动到翻腾，里边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但内中具体细节，以及——或许现在可以说了——此中明里暗里的谋划，在他对 XXX 他们口述的 2001 年^[9]，还真不知道（见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

因为，披露李鹏和姚依林怎么一从邓处出来，就赶紧到陈云那里报告；在陈云明确表示不同意之后，二人就是不向赵和政治局转达；以及，在价格“翻腾”过程中，在他们实际负责的领域，故意和决策人拧着（价格调整、银行利息）……

在 12 月 26 日的生活会上，李、姚不会不记得“价格闯关”怎么开场：那是在去年 5 月，邓曾分别亲口向他们提出的这一节——或许是邓想做？但老爷子为什么有了这么个想头、怎么那么急，是不是赵紫阳向他建议的……要是事情做坏了，是不是就可以……

是否这样：李鹏姚依林，他们什么都知道。不但知道，还很清楚：1988 年搅翻泥潭一役，自己这边可谓大获全胜。此刻，1989 年，到了乘胜追击的时候了——您赵紫阳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还想赖在总书记位子上？

这局面，邓会看不明白么？他与赵之间呢？

无论如何，在 1989 年新年这个节点上，邓支持赵、维持十三大以来的改革大局的决定是毫不动摇的。

据吴伟记载：元旦期间，赵紫阳把一段时间来的情况向小平做了汇报。邓很不高兴，发了一大段“坚持原有的大格局不变”的训令。今天读来，简直就像是直接朝陈云喊话：

改革开放，原来的方针、布局、战略都不动。动就乱。

议论很多，无非就是通胀。

我们没犯大错，虽然小错不断，这种情况以后还会有。

有人讲“早了”、“迟了”，应该说现在正是时候。

[9] “XXX 他们”，原文如此。

经济过热，降下来就是了嘛。十三大提出的理论、政策、沿海发展战略，都不能变，变就会乱。

现在已经有些乱了，要稳住阵脚。

现在，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变。我们已经提前两年翻了一番，不改革能做到吗？

十年来，我国经济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怎么还能去搞计划经济那一套？

我们没有理由改变十三大的路线和政策，沿海发展战略不能变。

现在机会很好，连台湾都有人提出要搞大中国经济圈，一放松，机会就没有了，不能后退。

两头在外有什么不好？包括对阿拉伯市场，也包括苏联、东欧、中亚、外蒙，我们都要积极发展。

总之从国内、国际局势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改变，否则会乱，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声誉。回到贫穷的社会主义，就要被开出球籍！

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变。

调整中要保持一定的速度。7%到8%的速度还是必要的。（《物价闯关中止，北京刮“倒赵风”》）

不能变！不能退！不能乱！

紧接着，据赵回忆：

1989年1月底，邓去上海过春节前（89年春节邓去上海前，赵去他家送行），当面向我谈过这个问题，话说得很恳切。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我来搞。他说，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过这样做，表明他的决心和对我的信任。他还说，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难，不好搞；通过他这样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当时我也很诚恳地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要这样做，你现在挂在这里，对我有好处。现在我们经济工作还有些问题，物价不稳定，有些波动，无论如何现在不要提这些问题。目前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的工作。

我向他建议，无论如何一年内你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我讲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一年内不再提这个问题。（《改革历程》）

弹压了李姚，安抚了赵，1月11日晚，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次日抵达上海。4日，在上海，他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见中，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还扼要地点明了：与几个月后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大体上讲些什么，怎么讲。

自1982年鲜明出台了邓记色彩的大手笔“高调吊唁”勃列日涅夫，同志们做了多少工作啊。对越边境战也打了、一次次带话让苏联遏制越南在东南亚称雄野心……大面上已然铺垫好，就差踏上最后一步。这一步……外交啊——考虑到1981年以来已不是面上的“党的一把手”，也不是戴帽穿靴的“国家、政府首脑”，但邓必须出面，以体现此举的力度与深度。

怎么出——苏联怎么想？世界怎么想？自己同志怎么想？

无论怎么想，他要说出他想说的，要让世人知道，自1917、1921、1928、1934，以及46、49、52、56……直到68、79以来^[10]，他，作为一路走过来的领袖，话，必须由他说，或者说，必须告诉世人，这一步，是他小平定下的；这局面，是他小平开创的。

他要让世人知道，中国，终于在他邓小平手上，实现了真正大国间的平起平坐。

几个月之后，小平同志见戈时的那篇运筹三年多、可谓成竹在胸的《五一六谈话》，正是这次见面的深化与扩展。

中苏这事基本妥帖。小平立即决定：此前，须面见老布什，向他交底。于是请老友在“刚巧”到日本出席2月26日的天皇葬礼之后，“顺

【10】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系列历史纠结点：1917俄国十月革命、1921第三国际建立中国支部、1928国共分家，在莫斯科重启、1934长征，以及46苏联指定国共再度合作、49夺得政权一边倒、52苏联156项帮助、56掰了……直到68中苏边境战争、79狠打苏联东南亚小兄弟。

路”到北京——当然这既非“顺路”也不是“碰巧”。此情，两边的官员、两边知道美中关系究竟有多重的明眼人，心里都有数。

邓要向新当选总统的老友布什保证，中苏间踢掉几块石头，不会影响中美。中苏“同志加兄弟”，那是历史了。而中国与美国，战略利益。

第二节 民间

方励之事件

就在这当口，1月6日，一封提名道姓写给邓小平的信，寄往“中共中央”。致信人，物理学家方励之。此时，他已经从科大副校长任上，调到北京天文馆。为什么特地在这一天要写这么一封信呢？据方自己说，他那时候刚刚完成一篇科普文章：向民众解说两年前爆发的一颗“超新星 87A”。方励之说，依据中国古训，每当客星出现时，负责占卜的官员一定要上奏皇帝，建议颁行“天下大赦”，以感动上苍，消灾灭祸，造福社稷——皇帝此时是不得不听从的。这，让他想到了魏京生。

他在信里写道：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第70年。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个节日的精神，诚恳地向您建议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

今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200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尊重。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以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该信邮寄的第二天，1月7日，按照方励之说，碰巧有两位客人到访，一是原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刘达（那时节是中顾委委员）。刘读后立刻表态愿意把信送到中央。另一位，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当时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代表)。林拿到信的“副本”，立即译成英文，“交给了外媒一些记者”。

1989年的1月6日，正是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发表40周年。但一众热血贲张，都爱说五四70年和建国50年，对“人权”二字，那时候似

乎还稍显陌生。但这一点不妨碍民众、民众中的知识人、以及他们里边的“两头真”——在全社会活泛的大潮里，率先突进，仗义发言。

到了月底，1月28日，前胡风分子、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来到北京，和前《人民日报》副总王若水一道，在北京一家叫做“都乐书屋”的私家书店，举办了一场“新启蒙丛书”^[11]首发式兼组稿座谈会。应邀与会嘉宾十分了得：李锐、童大林、秦川、胡绩伟、苏绍智、李洪林、于浩成、吴明瑜、张显扬、包遵信、李南友、严家其、金观涛、刘青峰……方励之夫妇没在受邀名单里，但他在最后一刻赶到——

于浩成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

1月28日应王元化、王若水、于燕莎的邀请参加在北京都乐书屋^[12]举办的《新启蒙》首次沙龙。王元化主持。会议开始不久，即由苏绍智介绍最近考察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晚八点左右，方励之来到会场，并即兴发言。方说，最近，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大赦，释放魏京生。方发言后散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一百多人……

相当客观兼克制。另一位当时参会者记述：

几位知识分子先后自由发言，均不同程度地涉及时政问题。但会议的高潮却是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出现：方励之的到来立即得到人们鼓掌欢迎。他大声介绍了前不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大赦政治犯的事情，表示必须坚持在中国提出人权问题。

[11] 1980年代，前“胡风分子”、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造成全民族的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邀约黎澍、于光远、王惠德、李慎之、胡绩伟、秦川、王若水、李洪林、李普和李锐等人组成“新启蒙丛书”编委会，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期创刊，由时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李冰封，将出版任务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到1989年4月，共出了四期。第五、六期已经编好，因“六四”风波，从第五期被勒令停刊。

[12] “都乐”二字缘于赵丹。一九七八年，赵丹到广西柳州都乐石洞壁画旅游，挥毫写下“天下都乐”四个大字。赵丹去世之后，黄宗英来到深圳“下海”，以此命名，可谓是对赵丹的最好纪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离开上海，前往深圳特区蛇口创办都乐文化公司，成立深圳的第一个独立书店“都乐书屋”。该书店是国内最早的集体制书店，接着，北京亦开设都乐书屋。22岁的于燕莎，接手开办。

他并且慷慨陈词道：“过去，我总是鼓励大家入党，在党内搞改革。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体制外行动。我们必须使用一切办法推动改革。”

方励之的即兴讲话超出了沙龙参加者的心理准备，会场一时鸦雀无声。主持人随即匆匆宣布会议结束。（“天安门对峙”网页）

陈小雅说：

举办者并未正式邀请方励之参加，但方随朋友到会，并介绍了“上书”的要点，“中心是要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在讲人权，就是中国不讲，谈不上人权，民主、自由都是空话。中国在人权宣言上是签了字的，但是国民党签的。因此，争取人权是个重要问题。”他还说，“当前是个非常好的时机，光发议论不行，最重要的是行动。今天的会、出版《新启蒙》也是行动，但还不够。”

当天上报中南海的《电话摘要》怎么说呢：

晚8:00左右，异议分子方励之来到会场，并即兴发言。方说，“……和共产党斗，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方式来进行，过去我想到在党内斗，所以我在科技大学就让研究所所有的人入党，现在看这种方式不行。现在我们要从党外、体制外进行斗争，要有更多的实际行动。”方的发言完后，没有人接着方的发言继续。约二十分钟后，散会。

第二天，方励之（评论头天会议）的言论也汇报了上去：

方励之说，昨天的会“火药味很浓，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现在当局根本就没招了。我觉得这种会连着开三次就要上街了”。（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方励之，身份虽然科学家，但在全社会面对的现代化变革中，无疑是公认且得到公众拥戴的勇敢、热诚、思路明晰的先行者。

没过几天，快到农历大年夜的时候（2月4日），名头相当响亮的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文化书院（背后由统战部操盘），在友谊宾馆举行一场“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与他的同行兼好友许良英出席，还转请了一位“生意与文化双挑”的青年才俊陈军。

陈军，何方神圣？三十多年了，这位思想敏锐，执行力上也闪着几分潘汉年风采的上海小开，一直在民运大潮的赞与贬之峰谷中簸扬。陈同学，复旦哲学系79级生，上海民间刊物《民主之声》首任主编（1978，头版头条即《论人权》）；他是海外《中国之春》特别记者、中国民联成员。这回回国，现在已经毋庸讳言，是有任务也有经费的——足够吓人？然而，若与1921年毛润之拿到“国际”经费并领受任务，实在是小小小巫了。

接受方励之转邀的时候，陈军31岁，正携一位英籍夫人在北京开一所小虽小、却十分火爆的“捷捷酒吧”（上海的那家名“可可树”），否则也不会那么容易联络文化名人与外媒。

联谊会上，方励之谈到致邓小平信；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人权

知识界应有一个形成自己的集团意识，要表明自己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要发表意见。中国知识界开始形成集团并形成对政府的压力。这并不是要打倒谁，而是要压着他们向好的方向去。

事先作了准备的陈军，带着自海外获得的见识，高屋建瓴地提出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检讨五四以来，尤其是四十年来自己的社会角色；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日子中，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为被压迫的人作一些事情：取消反革命罪；释放徐文立、魏京生、王希哲等人；取消秘密警察系统……

对这个“联谊会”，当局怎么看？陈希同在他“6/30总结——平暴报告”说：

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

到2月16日，诗人北岛领衔的公开信发出，向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在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签名者，冰心、萧乾、吴祖光、严文井、宗璞、张洁等1980年代最受读者爱戴的文化名人。这就是“三十三位著名作家上书”。

2月26日，陈军在“捷捷酒吧”召开了记者会。前来参会的，有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等世界各地的记者，陈军在会上传读了“公开信”和进一步的呼吁。

当时的北京，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尚未覆盖。陈军起手即建起“八九特赦”办公室：国际热线电话顺利安装，大陆动态及时传送到海外。“三十三人签名”很快得到海外“中国民联”、留学生、海外华人，还有台湾、香港等地的知识分子与著名人士的响应。一个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正在蓬勃兴起。

2月25日，此三十三人签名公开信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可以想象，接着如何在全国的各大院校扩展。

这同一天，由许良英发起的科学界“四十二名科学家联署”的公开信发出，要求释放政治犯、尊重人权。2月26日，张显扬、包遵信等社会科学家也出来了：四十三名……

到三月初，学生们已经走到最前——北大清华同时贴出《告人民书》大字报，要求“解除四项基本原则”；北大贴出《为中国人的悲哀》的大字报，号召“为自由而战”。

也是在这几天，2月25日，刚就职一个多月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开始了他对中国40个小时的工作访问。

2月下旬，应该说，他与邓小平二人，都感到必须及时面见。这是因为，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正推向一个新局面：邓在上海的时候，与苏外长基本已经敲定。对此，他要亲口对老朋友布什说明。

论者对于老布什把访问中国作为他履职后第一站，多解说为1970年代就在北京担任“联络处主任”的他，对这个国家有多么深的感情。此说不能算空穴来风，但政治家们放在情感之上的，应该还是理性与认知基础上的政局运作吧。

按照官方公布，2月26日上午，邓小平回顾了他们之间很难得的旧谊：

你在北京任联络处主任期间，就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作用。

我个人希望，在你总统任期内，中美关系能在一种新的格局下向前发展。我不是讲战略关系，我是讲两国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尽量减少我们之间的麻烦。（《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

所谓“麻烦”，有时候看上去，真是云山雾罩地冗杂纷繁。但从根本上说，也很简单。即使在美国本土，也是时不时会冲突起来的美国利益与美国价值；而中国呢，不就是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里边的“四个坚持、改革开放”么？

美国利益与改革开放，在1989年，看上去很是相得益彰；但美国价值与四个坚持呢？

邓当时说的是：

中美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到1989年十七年时间里，中美关系一直向前发展。尽管双方吵过架，也有争论，也有分歧，但总的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总的评价是，中美关系是稳定的。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大。我深信，两国领导人，包括美国两党，都希望中美关系在新的格局下，有更好的前景。（同上）

但进入1989年，中国知识界为争取国民基本权利与民主，潮起潮涌，一波接一波。对此，两人心知肚明。老布什出发前后，在戴维营专门为他预备的《中美关系简报》里，还有这样的特别叮嘱：会面时少提人权问题，尤其是不要提到令邓小平很恼火的方励之。（见鲍瑞嘉 [Richard Baum]：《中国观察者：一个北京窥探者的忏悔录》 [China Watcher: 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

而邓小平，并不打算回避：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同上）

邓小平或许已经感到，他对恩师毛泽东的维护，对红色中国之政治统的全面继承，是民间抗争的焦点，这也最容易获得国际认同。对此，他解释说：

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做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同上）

他没把布什当外人。对于自己怎么扛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披荆斩棘，和盘托出：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

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同上）

会谈之后，按照外事安排，就剩下老布什的答谢晚宴了——规模可大可小，气氛可正式、可轻松，完全看宴会主人风格。是不是想到当年邓小平访美，笑着接过牛仔帽，毫不犹豫地戴在头上，赢得全场一片掌声？美方这回的安排，是一场亲切欢乐的大啖德州牛排。多大场面？只要长城饭店的宴会厅装得下。

中方客人呢，请谁？

官方人士，循章依例就是；问题是官场之外——改开十年后邓时代的民间！

当时，1984年履职的驻华大使洛德夫妇还在任上（任期至1989年4月）。而在这些年里，他们看到的中国、接触到的中国人、他们亲自感受到的——改开与思想解放，怎么正把这个古老封闭的红色帝国带向世界……他们很希望布什的客人里边，有这些人：虽无官衔却实在是不能忽视的民间精英——总之，受邀客人名单里有了所谓“自由派”，包括方励之夫妇。

在这里，“美国价值”与“四个坚持”撞了车？

没想到，一个为“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大”锦上添花的余绪，变成载入史册的恼人外交事件。

没让天文台派车，26日晚，方励之夫妇搭林培瑞的便车，从中关村家里出发……快到长城饭店的时候，车子被警察以违反交通规则名义扣下。方一行改乘出租，途中又以违反交通规则的名义受阻。他们决定改乘公共汽车，汽车到站时，警察不让停车。四人步行很长的路到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前的中国警察不让进入……他们只好到加拿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员的家里。（杨继绳）

从这里，他们打电话给在家中的儿子方哲。方哲立即通知“全球的新闻界”——到香格里拉旅馆下面开了一个不正式的记者招待会。然后，第二天，全球的头条新闻——“方励之赴宴被拒”。（林培瑞）

第二天，方本人在北大也贴出了一个没能赴宴的经过陈述。（张伯笠、陈小雅）

紧接着宴会事件之后，1989年3月1日，北大、清华两校同时出现题为《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批评“党现已成弄权谋私的必备之物”，“共产党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权大于法”；主张“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基本原则”。

次日，清华大学等校出现《致广大青年的一封信》：“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是一个没民主的国家”，鼓动学生“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陈小雅）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2月28日，美国官方就方励之未出席布什的晚宴事发表谈话。3月1日，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官方这个谈话发表评论，对美方“不负责任的谈话”“感到惊讶并深表遗憾”。（陈小雅）

这算什么呢？受邀客人，不让去，有道理吗？非不让，早说啊——有这么较劲的么？当局的“不许”和受邀人非出席不可，两边全把此刻老布什前来北京的重大意义抛脑后了吧？

按照常理推测，美方的晚宴邀请名单，早在筹备阶段就报外交部了吧？未见来回冲折，也就是说，经手官员觉得没什么不妥。

于是，请柬，按照一般规矩，在宴会的前三天发出。2月23日，方励之收到邀请。依照规定，他将此“外事活动”报告了“单位”。科学院和天文台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2月26日傍晚。

时至今日，我们最想弄清楚的是：直到这时候，并不见当局高效致密的党政行政系统采取什么措施——就算到了方励之林培瑞他们从中关村出发的前几分钟，都可由天文台出面，劝说方励之，让他随便找个借口谢绝。^{【13】}

【13】陶斯亮《我当初如何统战方励之的》：“在谈到他参加布什总统宴会受阻一事时，他说：‘其实你们完全不必动用警察阻止我，你让我的老师严济慈来劝我，他一拍桌子我会听的。但（由）你们劝说（就是）不行，这是我一大弱点，可惜你们不掌握这个弱点。’”

事实是，什么动静都没有。突然在宴会开场前出动警察——目的当然是不许方励之到场。

“不许”之令，一定是仓促间下的。

谁会这样随意（恣意）下令？谁有这样的威望，能让这样一个不堪的“不许”令，畅行无阻地紧急启动？

警察拦截成功。全球出丑的，反倒是自己。如此“既劣且恶之小儿科”，大家都打掩护，无人追究。为什么？

军委主席与物理学家，有什么纠葛？

到了“六四”镇暴之后，在6月6日的会上，邓谈到“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在他心目里，这就是一回事。而他，作为无产阶级领袖，振兴经济、富国强民，与新生有产者可相安无事；但在精神与思想领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结仇——如果不说他在毛之麾下亲自出手对右派、右倾、以及“教条主义”的镇压，到了他亲自启动的改开/思想解放时代，他与方励之的磕碰，其实为他后来的暴怒与不回头，埋下深深的（深入到人格层次）的铺垫？比如他4月23日晚上听杨尚昆李鹏说几句，表现出的激愤已到离间者需要的程度？比如他5月16日听到街上标语（“垂帘”等等），就那么决绝？在他的脑海，或者说，在他的心底里，是不是都有方励之的影子？

此局势，似乎可谓党内保守势力与社会激进势力对改革派同时发起的两面夹击。邓与赵，或许都感到必须当面交换意见了。

于是，3月3日，在邓宅，有了下面一番谈话^[14]。据吴伟记载，先是赵紫阳向邓小平谈到了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倾向的问题，邓小平说：

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要采取过分措施。闹过头了再采取措施。触犯法律我们再采取措施，不然就是一种政见。（吴伟《民主一定要搞，但中国不能乱》）

【14】根据赵3月4日在政治局的传达，以及李鹏4月23日日记分析，这次到邓宅聆听的，只赵一人。

望读史人在这里特别注意邓此时的观念：“违法”与“政见不同”是有区别的，并由此细想4月24-25日，李鹏他们怎么在这两个概念里搅合。

对此陶斯亮也记得很清楚。她说，李树桥……让我看了份3月6日（应为3月3日）邓对赵的讲话记录，大意是对当前压力绝不让步，要赶快搞个办法，对方励之，不违法就不去管他，犯了法就抓起来。

邓强调：

在中国，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要给外国一个信号，在稳定的前提下，中国才会改革。中国人的事中国自己办，外国人要议论，让他们议论去。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

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

赵紫阳向小平反映，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新权威主义。邓小平说，

我就是这个主张，可以换个说法，把道理讲出来。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

台湾集中攻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文革的全面内乱就是教训。

邓曾经有过一个重要批示。而作为政体改革重要内容，赵也曾多方试探^{【15】}。他们这时再提起此话题：

民主党派参政，他们自己也要稳一点。民主党派成员参政，不是以党派的身份，而是非党人士的身份，不然就摆不

【15】 聂真，当时职务虽然只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但资格甚老，可谓紫阳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无论品格还是能力，赵对他是新任的。在1987-88年间，赵曾请聂真到民主党派“听听意见、摸摸情况”，看有没有可能让全国政协转变职能，担负起类似英国上院那样的功能。

平。对妨碍稳定问题不能放纵，不然会出乱子。在我国，会比东欧更严重。

赵紫阳说，有人说中国有言论罪，是不是划一个界限，违法与不违法，包括结社、出版。邓小平说：

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

邓最后说到他对这些日子来出现的一波波学潮的看法：

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抓”思想教育！难道教育等同于思想政治灌输么？公民教育进入小学课本了？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几个人读过？知识分子就社会问题发言，就因为自身待遇？邓公的局限性或盲点在于，他对于文明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认识，似乎永远停留在“马照跑、舞照跳”，对于思想的沟通碰撞，也只单向的“排排坐、听讲课”。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赵第二天就在政治局成员中做了传达——用语和情绪，不但与邓契合，用词之激烈，说“有过之而不及”可能都不算过分。完全不象他一贯的开明作风。怎么回事？

一个可能是两改（经改政改）压身，时局实在紧迫？再一个，1-3月里最活跃的“激进派领袖”，他看得很清楚，大道理没错，但实际面对的，正是逐步推进改革的一线官员。其动作，正与“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合流，弄得邓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方励之陈军等人的动作，在他心里，和后来上街悼念耀邦、疏泄内

心愤懑的学生，两样的么？或许，此时，他照着邓的意思做了，发现不奏效，于是才有了五月之后的改变？

赵对局势的总体分析：

当时宣扬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言论也出来了。一个叫陈军的在美留学生，回到国内串联知识界名人，要求释放魏京生。在美国也有人发起一个签名活动，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香港也有动作。1989年人代会期间，香港有一个代表团进来，要求人权，要求释放魏京生。国内校园也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沙龙、论坛，也有过激的言论。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识分子纷纷到大专院校发表煽动性讲话。方励之在国外还直接点名对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给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一个口实，拿这些事向老人们挑动，使邓和老人们神经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改革历程》）

对方励之，赵的看法是，作为党员，不可以在社会上公开批评自己的党，但作为公民是可以的。开除出党，不属于国家的镇压行为。

三峡新书发行会

民间政改的路径，并非只有从意识形态批判到街头抗议一种。在相对开放的气氛下，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努力践行从工具向公民的转换——三峡工程不同意见的提出，是一桩突出的例子。

2月28日，贵州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行一本篇幅不大、内容却着实沉重的小书：《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集》。

首都多家新闻记者打破只当喉舌的拘挛，联手采写并推出了自毛时代以来难得的知识人的独立见解：1988年底周培源、孙越崎等致中共中央的信；412位参加“工程可行性论证”时拒绝签字的12位的意见等。

这本书尽一切努力，冲破当局对出版的严控，快快推出，主要目的，是抢在即将召开的“两会”（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前，让代表和委员们知道对三峡工程不同意见的存在。

他们打出邓小平说的——

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

以及赵紫阳说的：

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发布会，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国内主要媒体都到场了。最有趣的是，居然一家外媒都未受邀——事实上，也没有一家外媒主动关注此事——后来，在美国《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曾有一篇文章，把这次发布会说成是国际传媒的“一大漏报”。足见那时候活跃在中国的一批进取（而非革命）者的心态——独立见识、负责进言。多么大的事情，都必须、也能够在国内自己讨论解决。

这样的与主流宣传唱反调的发布会，场面上应该有“探子”吧？窥探之后，肯定上报吧？事实是，发布会之后，这本小书，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两会会场。会议中间（4月3日），副总理姚依林就已经在国务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重申：

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是要经过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议现在这个问题不必继续讨论。（《人民日报》1989年4月3日）

算不算此项工程暂时停摆？而如此一路忽悠小平同志、轰隆隆推进的、具有伟大政治意义工程，居然能在1989年春停摆，说明了什么？

1980年，水利部就吧邓小平拉去考察三峡工程，以“万吨轮直驶重庆”忽悠他；到了1985年，对高坝低坝，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我赞成

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手做”，再次作为圣旨，抓在了主上派手里。^{【16】}到了1986年，在按照小平“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科委、建委、计委、科学院以及水利、电力等部门）专业会议”之后，赵紫阳向他汇报：

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1/3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邓小平与三峡工程》，载《炎黄春秋》，1994年第3期）

邓小平的回答是：“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这句话，从此成了三峡上马的尚方宝剑。（《邓小平与三峡工程》）

到了此刻，1989年春，姚依林代表国务院所做表态——此前不会没有问过（或者打探过）邓的意见吧？问了而暂时停摆，这情景，给赵留下什么印象呢？再联想上一年的“闯关”/“调整”，是不是说，“钢铁公司”的邓，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是板上钉钉、绝不打弯的。

这印象，对赵或许有影响：一个月之后，在对待明显有不足之处的（用赵原话）《4·26社论》、而且自己承担全部责任……邓是不是也可以……

赵在这里，是不是忘记他们当初怎么绞尽脑汁攒出“两个基本点”：小平同志决不让步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啊。

京丰宾馆会议

陶斯亮还记得那年早春时节的故事：

【16】在邓小平文选里没有这句话。邓小平逝世的时候，做三峡工程的人为把这一工程说死是小平同志支持的，就把这句话登到报纸上，但“我赞成低坝方案”这句话没有了，因为他们想建高坝。

由全国青联、青年经济学会及体改所，联合举办了一个“十年改革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我当时还是全国青联常委，故受邀参会。

会议在京丰宾馆举行，故而也称京丰宾馆会议。这个旨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经验的会议，议题之深、阵容之强，可说是万众瞩目。参会人数超过400人，汇集了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蜚声中外到初出茅庐的各路精英，还包括了诸如严家其、包遵信、戴晴、温元凯等有争议甚至参加过“33人签名”的一些学者。

党内的中青年干部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刘延东，作为会议组织者（也可视为日后再冉上升的政治精英）也悉数到会。赵紫阳派他的秘书李湘鲁，儿子赵二军也“潜伏”于会，认真旁听。（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

邓时代，约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邓胡赵十年，中共治下的中国，我们可以大致给出一个社会意识形态光谱，从“左”往右即是：

毛左卫道 | 陈计划 | 邓市场 | 开明官员 | 渐进改良 | 激进变革 | 革命
(对比清末的：太后亲贵 | 光绪、曾左李张 | 大批归国、实业家 | 康梁谭嗣同)

上文所说的研讨会，即是体制内改革派官员的运作。他们有意联络社会上有见识——哪怕自由化见识——的学人，也即我们给出的光谱里边居中一群，共议国是。

第三节 拉萨

就在这年春天，西藏那边出了点乱子，史称“拉萨骚乱”。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边陲，新闻播了——“出乱子了，已经解决了”。当时国内很少有人关注，也很少有人理解其重大意义。

先是1月28日，十世班禅在日喀则逝世，国务院宣布了治丧和转世的安排。2月13日起，分裂主义者多次上街游行，3月5日有数百人游行并打出雪山狮子旗。是日发生了“打砸抢烧”行为并有人向公安武警开枪射击。3月7日，国务院发布拉萨戒严的命令。

3月8日，当“骚乱”已经终结的时候，军报记者江林坐不住了。因为，据报道，这场“骚乱”的平息——是以正规军实施“戒严”的方式。

江林觉得有问题。建国40年，政权稳固。什么规模的骚乱，要出动对付外敌的正规军？她要求过去看看。

在3月8日到4月8日的一个月里，骚乱已经得到平息的拉萨，只接待了军方记者：新华社军事部成都站，《解放军报》，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录片室。

江林在拉萨，除了跑现场、采访调查涉事机构，采访当时的伤员、暴徒、寺庙住持等等，她还有两个别人没有的线索：一是她北大中文系同学、时任《西藏日报》主编；一个是她另一个同学的父亲、成都军区（此次受令前往戒严）前作战部长。

前者推荐她做广泛和深度阅读，使得她对西藏的了解，从宣教课本，进入到历史与世界的视野。后者则以第一批代表国家当局进藏的军事人员的身份，直接对她说，这年早春出现的“骚乱”，最主要的祸源，是当政者的腐败贪婪。

一个月的观察询问，江林终于弄清：

有没有“外部势力”？有。拉萨藏人近一半，天天听人在印度的达赖讲经；

住持最崇拜的，是1959年的“朱毛”——对他们的敬奉，超出活佛。但眼下已经不是这样。

代表了藏人主体文化与社情的僧人，有没有要恢复“雪山狮子国”？有。这样的政治诉求，如果正视其深层缘由，是可以协商，也是很容易控制的。

暴徒，打砸烧，有么？有。不是僧人，是八角街繁华地带的藏民：他们觉得藏人商业利益受到损害。当然大量的是无辜的居民和路人。

这点事，当地公安告诉她，太容易解决了；再说还有武警。但他们得到的命令却是：等上级决策，谁也不许动——最后竟然是（不许动作的）警察，在暴徒的攻打下，逃离自己的办公地。

对此“戒严”局面最难于接受的，是年轻时就响应号召“支援西藏建设”的内地专业人员。正在救治伤员的医生护士极为难过地说：……弄成这样。

一个月间，她把见闻与见识不断发回报社，无一篇见诸报端。

这次赴藏，江林和新华社军分社记者同住西藏军区招待所。她说，一个月来，未见这几位走出去，他们集中讨论的，是如何给“上边”写报告。他们的报告，对这次“以正规军戒严的方式解决拉萨平暴”大加赞颂，认为和1959年“死30万人，维持30年稳定”相比，功勋相当。

回到报社，她问内参编辑，为什么不发她的稿件。主管林冬说：地方的事情，军队不要干涉。

这是基层军人在这年初春的见解。

但是，为什么？在拉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发生规模不大且相当容易处置的事，最后酿成出动空军、成都部队……百里奔波，“戒严平骚”？

江林认为，凡“涉外”政治问题，哪怕是别有用心者或者推脱责任者楞把它拔高、楞把它说成的，其他人大多噤口，一声不敢吭；一级级往上推、揣摩领导心思、看领导脸色。

这回的拉萨骚乱，居然一直等中央军委命令，两个副主席都在等主席的命令。

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1954年起，就已经是全党全国最高和最后的决策。

现在看来，拉萨“平暴”，仿佛是几个月以后那场举世瞩目的“镇暴”的预演。事态发生之前，贪腐官员无人监督、惩处；官民隔绝，没有申诉、协商渠道；人民积怨已久、乘事而起，基层官员和警察，既无应对经验也无依法执政的指南；坐待事态恶化后，一切上交中央；中央即顶格处理，直接出动正规军（邓拍板），血洗骚乱现场。

国防军，陆海空乃至导弹部队，本是人民养育以对付外敌。但对他们而言，纸面上几个字而已。需要时候就用。否则干嘛养着？

这就是从毛到邓的逻辑——几近直觉。

然后“新闻战线的士兵”出动，不是报道真相、总结教训，而是掩饰、粉饰，不但把人民蒙在鼓里，连决策者、统治者也一齐蒙蔽在弥天大谎之中。

此逻辑、此经过，当局对此“骚乱”的处置，包括提出政治主张的僧侣与市场开打的平民，竟然在春夏之交的北京，再度搬演。

但当时有谁能想得到？！

春夏之交

危机四伏
四伏中
机遇游动
提升抑或沉沦

.....

古老中华的孽缘啊



第一节 耀邦辞世

北京，春暖花开的四月天。

4月15日，胡耀邦离世。赵紫阳亲赴米粮胡同向邓报告。

王瑞林事后说，小平同志一听到耀邦同志去世的消息，把正在抽的烟给灭了。十个手指无力地交叉在胸前，没有一句话。过一会，就又拿起烟，狠狠地抽起来。当紫阳来后，已经平静许多了。（张良《中国“六四”真相》）

他想到1986年底那不堪的“生活会”了？

本来，无论就哪个方面而言，1980年代的中国，都是共产党执政以来百姓所能感受到的最好的时光。当然，所谓好时光，不过相对于毛泽东时代而言——农民不再是只能听喝的“社员”；市民手里有了些许活钱；阶级成分划分一风吹；思想钳制稍许宽松……最关键的是：封闭的中国总算对外部世界开放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居住、迁徙、教育与医疗……以及：知情权、历史追诉权，还有：就国事发言的权利。

邓与胡的渊源，如果依照“红区”、“白区”、“洋房子”这类党内派系“归边儿”标准，或许没有。但是，在五十年代，都当着意气风发“总书记”（党与团）的二人，通过观察，应该说还是互相欣赏。否则，1976年秋，四人帮刚拿下，叶帅问计的时候，耀邦“隆中三对”的第一策，就是“停止批邓”——对此，邓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一节，不应该算做“不领情”（虽然这的确是邓小平的特质之一）。那时候啊，如此见识，不过全民大潮里边的一滴。

邓对耀邦十分欣赏么——“胸无城府、身无铠甲”？耀邦不“阴”，从来没想着借“老爷子”为自己谋什么。想想皇权社会，这不是哪个臣

子都不得沾上点的品性。连王震那种动不动抄家伙、许世友那种一脸憨态的，都不时“阴一下”？

这或许不错，但不阴不等于有见识，更不意味着与自己有共识——比如对毛；比如对冤假错案；比如对方励之那类可恶的“良心”。

认知不同，还不懂揣摩、不知迎合，不说魏忠贤、李莲英，您哪怕像东兴、尚昆他们那样懂点事？但这个耀邦，公正说，也不是“杠头”，必须遵从的时候，也勉力为之，比如“清污”，不也贯彻了二十多天么。

但他和邓，的确不是一样的人，本色、底线，不一样。胡对底层、对无助者真挚的同情——比如1980年在拉萨说的“西藏老百姓相当苦……”、对历次运动（包括反右）蒙冤者、对因为思想言论遭受打压被扣帽子、还有到老山“轮战”的士兵……

自打老邓听说了陆铿访谈的内容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胡换掉。这从老邓和杨尚昆的谈话中看出来——老邓对杨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

邓决定“换马”了。

耀邦出局的“生活会”开成很不堪的“党内逼宫”。热情，同时也相当温情（对战友啊家人啊）的耀邦，认头了。写了“检讨”，留在了啥事都不管的政治局委员位子上。

毛左卫道那边，大获全胜：耀邦总书记不但拿下、认栽，此刻，人也走了。

激进革命那边呢？

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卫道那边，简直从一开始，就想到利用激进革命而达到自己目标：赵紫阳，这回还弄不去么？

而小平同志，已经84岁。

胡耀邦去世。

死讯传来，刚刚经历过他的真诚、热情和宽谅、目睹了他的废黜，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同时，又满怀一腔郁愤的学生们，有话要说。

年轻人打起横幅、走上街头，希望越过“组织”系统的层层管制，把他们的感受告诉百姓，告诉当政。

他们激动、自信、有话直说、几乎没有得失与策略思考。冲上广场的主体是年轻的学生，也有不那么年轻的诗人——有人有出于自身经历对当政的不满，有人纯粹出于理想与情感（如小说家老鬼，他扎破左膊，流了满满一碗血，写下了“哭耀邦”的血书：难得的好领袖！为中国立了大功！！为耀邦同志鸣不平！！！怀念你啊，敬爱的耀邦！！！）。

此时，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生运动”。大喊几声，警醒社会的同时，心头郁闷抒发掉，然后——回去接着读书，最后毕业各奔东西。用当年“民国范儿”的语言：学生已尽了言责，应该重回书斋求学。1919的“五四”是这样，1926的“三一八”和1935的“一二九”，还有2014的台湾“太阳花”，大体也是这样。

除了火一样的激情，不惜以年轻的生命为理想抗争。他们之中，有的勇武、有的沉稳，背后（在四月下旬和五月初）尚没有居心叵测且老谋深算的政党与政客，即所谓“长胡子的黑手”——六月下旬，即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当局曾调动全部资源将一批人（赵团队和自由派）关进监狱直查到今天，并未见公示。走上街头的发动者、组织者，在此阶段，都是同学：临时料理游行行政与秩序。

他们最先说的是“民主先驱 开明公仆 耀邦同志 青年知己”——为这位爱护他们，从而也为他们所深爱的前总书记喊冤。不能说他们对党国的政治运作有什么样的了解、深思甚至构想，他们要的是情感与情绪的抒发。

民主先驱，社稷为先，千秋耀；开明公仆，天上为公，兴华邦
斯人虽逝，风范永存；民心如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耀邦同志你太惨了！中国太惨了！人民需要你！中国需要你！

死的太可怜了，那么快
 中国改革的功臣，没有他就没有日前改革的成果
 缺少法治，几个人可以把总书记搞掉
 继承耀邦遗志，推进民主进程
 民主魂、民主不死
 耀邦不死！打倒独裁！打倒专制！
 人民书记人民爱！人民书记爱人民！

讣告播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云云。1986年底“生活会”后被迫辞职一事，未提。

学生们呢？“怀念耀邦”、“中国魂”等标语拉出^[17]。以及，“小平84健在，耀邦73先死……”；“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北大“三角地”）

犯了错误，遭了贬黜，反倒抬得更高——如此之高。这就是说，耀邦没错，对他的处置，错了？

亲属在家里设了灵堂。卓琳朴方他们前往吊慰，邓本人没有去。

他没有去，他为什么不去？这不禁让人联想到1976年1月，总理重病期间，毛一直未去探望；周去世后，毛也不去医院遗体告别；周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也没有参加……这回，是“敬爱的耀邦同志”……人们的心悬着。

下边的问题：讣告、生平、悼词；还有，治丧规格。

治丧事宜，李昭向中央提出的要求有两项：

- 第一，将耀邦安葬在江西共青城；
- 第二，胡耀邦遗体开放两天，公开瞻仰遗容。

[17] 李承鹏：25年前的今天，我们正在寝室打麻将。80末的大学生是很特殊的人群，在思想解放大潮中争论着萨特和福柯，嘶吼着崔健的摇滚，反对官倒、抨击不公，热烈颓废，勇敢迷茫。当噩耗传来，整个校园的窗口挂满了悼词。我们写的是“心系苍生，肝胆昆仑，邦哥永垂不朽”。是的，邦哥。你就知道他在学生心中的地位。

（徐庆全《胡耀邦追悼会“十万人瞻仰遗容”一项为何被取消？》）

顺应家属意见，“治丧办公室”（乔石主持），与赵紫阳共同商量决定，耀邦治丧，比照叶帅规制（按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规格）办理。同时做出尽量顺应民意民心的决定：

- 允许各地学校、单位、企业的群众举行悼念活动，各学校可以设灵堂，团委和学生会等组织应积极参加；
- 4月20-21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遗容；
- 群众性的自发悼念活动作适当报道；
- 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上午在人大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

这样的处置，连外电都赞扬：美联社说，“中共对胡耀邦去世的处理颇为高明，在政治上给予其最高的评价，只字未提他的过失。此举无疑使人感到欣慰。”英国报纸也注意到这点，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时候维护团结的一种努力”。

李鹏呢？

4月16日，刚回北京，姚依林即找他，说北京的大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在藉机“攻击党中央”和邓小平。这，不过他日记里公示的。他们还嘀咕什么了——是不是已然察觉，对街面上发生的一切，邓已经很不高兴啦。

接着的几天，各校学生（少时数千、多时上万）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同学们静静地坐在广场，等着当局安排的“遗容瞻仰”。渐渐地，粗疏的、口号式的政治抗议（而非单纯悼念）出现。北大《七条要求》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国家领导人收公开、解除报禁……叙事宏大、正气凛然——呈交人大、国务院。学生们到中南海北门提交文件。出来接访的，规格过低，风头最劲者，涌向新华门。

对此“冲击中南海”行动，邓立即同意杨尚昆的建议：特别增加一个团警力（38军）^{【18】}。

这时候，以邓（包括杨尚昆）之心态，局势并没有到令他们感到恐惧或者不能容忍的底线：调点兵进京，特别局面下的重点保卫而已。但正规军非战时期进入都城，已从这天开始——无需经过法定程序、无需经过军委第一副主席。

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用共产党成功经营了40年的层层组织系统？为什么不用近在手边的北京警察、中央警卫局、北京卫戍区和驻京武警？装备拔尖的“王牌”38军，是好用，但再怎么讲，依照《宪法》，也是对付外敌的啊！

不过在此刻（包括直到6月2日之前）的决定里，有一项规定是明确的：对付闹事学生，军队的清场行动，不使用实弹。

按照常委分工，这天亲临一线具体处置的，是乔石。他坚持不扣帽子的强硬劝说，并调用公安清场。凑效。

18日上午九点，赵召集了常委会。

李鹏提出：学生追悼耀邦怎么办——显然指的是“治丧办”的决定：4月20到21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遗容。

李鹏此问，仅仅出自他自己，还是逼紫阳出口惹小平不高兴的话？作为政治局秘书（列席常委会）的鲍彤，对当时的场面记得很清楚。2013年，在差不多25年之后，他回忆说：

紫阳说，“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全党非常悲痛。我们自己在追悼，现在学生在追悼，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没有理由阻止学生追悼。”

【18】1966年文革初起，毛指示陈锡联王猛调38军秘密包围北京城；1971年9月12日，毛巡视回京，专列停在丰台站，指示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数小时后，回中南海。此刻调兵，尚属高层非常时刻安保措施常态。

紫阳这句话是在常委会上回答李鹏的。当时我在场，没有一个常委表示不同意。（采访鲍彤）

在会上，话是这么说的。但李鹏为什么就此提问？鲍彤分析：

学生追悼耀邦，什么意思？就是给邓小平脸上摸黑。

应该怎么办？邓小平自己不好说话，赵紫阳应该是压下去。

赵紫阳不压下去，还说“我们没有理由反对”。（采访鲍彤）

鲍彤说，4月18日的常委会，王瑞林就坐在那里。（开常委会，三老邓、陈云、李先念的秘书，没有不在的时候）赵的话，他当然立刻回去报告。

局面推到这里，赵没有感觉？但他的意见非常明确：

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

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行为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改革历程》）

但到了19日，“治丧办”的以上数条，竟遭否决，并立即传达下去。给出的借口——“治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传错了话”。

这是谁、为什么、又是如何做的决策？鲍彤说：

后来全部被某个人否定了。4月18日，三个主管政治意识形态及日常工作的常委，当时他们三个人决定十万人悼念，全国下半旗，还要写一篇文章。到了19日晚上的时候，全部变了。被某一个比常委权力大的人否决了，10万人悼念不行，文章不准发表。（《鲍彤：邓小平决定拿下赵紫阳后唯恐学生不乱》）

但举丧……

19日，中央政治局请示邓小平的意见：“是否出席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

邓小平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紫阳致悼词便可，我身体不好，就不便去了”。

到最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是，在卓琳的劝说下，邓告诉总书记，一定出席葬礼。

面对群情汹涌，明明可以宽缓，为什么偏要峻刻？在一波又一波的民众悼念中，他的盘算？

他肯定想到十三年前的“丙辰清明”。那时，他复出两年多，正大展宏图、旋即又遭批判的时候。身处巅峰的毛主席（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一下子就敏感到：

“矛头是对着我的”——以悼念总理为名；

“有人（党内对手）插手”——暗指的正是刚被“搞下去”的他。

如今，身处最高权位的，已经是自己——通过明明暗暗的博弈，最终接下红色衣钵的“第二代领袖”。

花圈、标语、如潮的人流……“矛头对着小平同志”！这，李鹏刚进入状况就替他说了。别的同志呢？这天晚上，在电话上，李鹏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闹事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了正面冲突”。

20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式会议上，两人“在处理学潮的方针上第三次意见分歧”。

20日上午和21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两次讨论胡耀邦的悼词和生平。悼词稿送邓审阅。

此刻的局面是：《讣告》发表以后，党内外许多人对评价中没有说耀邦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极为不满，要求在悼词中加上这样的评价。《悼词》稿送审，邓回了一句话：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谁都不够格，我也不够格。^[19]

[19] 香港《争鸣》杂志1999年9月号披露的毛泽东1976年讲话数则，来自新近从汪东兴宅中查获的秘密档案。毛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1976年1月12日）

赵遵从。和乔石一道做了折衷：遵照邓的意思，悼词的“定论”里边不加之定语。但在大段的具体评论中，用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

至此，对邓的意见，一线常委，努力遵奉；对于胡耀邦丧事之处置，包括悼词，全部搞掂。

他出席了胡的葬礼：年届 84 高龄、晚期帕金森病人。他坚持站立一小时。这是一个态度——当时的学界与学运界，没有人对此做出解说。

章立凡对现场的记载，是目前所见最详尽的了：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20】}（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当然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答应参加之后，又恨恨地说的那句话：“规格够高的了”。

他的这一纠结——遵从头脑的理性还是放任内心的好恶，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比如，1987年初，一举拿下胡耀邦大功告成，李鹏（自认把到圣脉）建议乘胜追击，提议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批判”，将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举全歼。邓当即喝止：他没犯什么错。淡化！（胡德华对著者转述）

【20】傅高义和杜导正都曾引述过的另一个场面：邓趋前，李昭此刻拒绝与邓握手，还说了一句“都是你们……”在家属和现场摄影章立凡的叙述里都未见。此处且存疑。

回到追悼会——

上午10时，广场上广播宣布追悼会开始，数万学生全部安静下来，自动肃立，跟着唱国歌，有的学生流着眼泪，气氛庄严肃穆。在西长安街两侧没能进入广场的学生，佩戴黑纱、白花，举着“耀邦，北大同学怀念您”、“政法大学致哀”等横幅。（吴仁华《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追悼会结束的当口，总书记、总理李、尚昆同志等，送小平离开大会堂。当着几位的面，赵向邓提出了处理学潮的三条原则性建议：

1. 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2. 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3. 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改革历程》）

邓认可。在场的其它人，未做补充，也无异议。

葬礼当天，徐勤先任军长的38军赴京维持秩序。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前，稍有骚动——

数万学生希望送胡耀邦最后一程，得知灵车早已离去，学生激动、愤怒，队伍开始涌向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有学生请愿，提出三点要求：一、请求灵柩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再送胡耀邦一程；二、请求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三、希望公开报导当天的学生悼念活动。（《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这一幕深深打动无数国人的心。这出中国传统戏剧中高频出现的逼宫戏码，按规矩下一个身段一定是被跪的上位扶起跪着的人，或应许，或安慰……然而，当日人大台阶上，学生期盼的领导并无一人现身。（后派三名人大代表出来接受了学生的请愿信）。

此刻，一切尚在掌控之中。

从葬礼现场，再转回到上层运作，紫阳出访前与邓小平的见面：

4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

一直到1989年4月份（4月19日），我访朝前到他家谈访朝问题时，他还向我说，等我访朝回来后，专门开会谈一下要我搞两届的问题，不仅现在格局不能动，而且下届总书记还要我搞，此事他同陈云、李先念谈过，他们同意了。（《改革历程》）

对这次会面，鲍彤有更为详尽的描述。那是在2014年，笔者直接向他讨教：

为什么赵紫阳那个时候非要访朝鲜？

鲍彤讲了以下这番话——这番赵紫阳直到最后都不愿再提起的邓的谋划：

邓小平要赵紫阳去，非去不可。

赵紫阳还去问邓小平，现在国内情况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我能不能不去？是不是可以不去？

邓小平说去，为什么不去。邓小平接着还说：你去，去了以后回来你当军委主席，我军委主席不当了，让你当。

邓小平还说，我已经有个名单，要开一个会，在会上来决定我辞职，你当军委主席。

赵紫阳生前没有讲过，生后也没讲过，别人跟我讲的。

赵紫阳不愿意把邓小平这句话说出来。但是，当时就知道情况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两个人跟我说同样的话。不能说（谁）。但是我可以负责的讲，这两个人讲的是真的。或者说三个人，不是两个人。

第一个人跟我说了以后，我就怀疑，然后我又得到两个证人，就是三个人都跟我说了，确实确实，赵紫阳是这样见邓小平、邓小平是这么跟他说的。

至于赵紫阳听了这些话以后，他的感觉如何，他的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他从来没说过。（采访鲍彤）

鲍彤认为：4月19日邓的“搞两届”、“军委主席给你”，明显用话稳住，让他安心外访，以便自己在北京布局——邓毕竟当过军人，兵不厌诈。于是，李鹏日记里的4月23日“看小平同志”，应是按照计划前往。鲍说，4月19日这样的话，毛对高岗、林彪、华国锋，都没有说过。

笔者相信鲍老所述二人见面经过。对于邓之阴谋布局的分析，不敢苟同。

不过从他的叙述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天下，第一要务，是军权在谁手里——军委主席于是变得最最当紧。在后边的故事里，读史人会看到，“军权”、“军委主席”怎么在邓的手里摩挲，比之项羽，还显得寡断……当然，1989年“一党当家”的中共所面对的权变，比项羽那点楚军，可是繁复得太多了……

笔者认为，4月19日这天，不应看作敷衍、甚至坑陷——邓这时候，是真诚的。物价闯关为自己兜底，紫阳压力够大的。但赵的另一面：一直潜伏着的对中国转型期政治经济改革的大蓝图，以及支撑这蓝图的开明、开放与理想主义底色（有别于王震的列宁式功利主义和陈云大一统计划经济下的统治意识），此刻尚未尽显。而到了五月，到了学生们呼喊出他和他的团队其实正在细细谋划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邓，还能接受？还敢把军权交他（哪怕形式上）？

也是在这天——4月19日，北京《新观察》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联手，召集在京开明高干、舆论领袖等，开了一个“祥和”（胡德平在会前会中一再说的）追思会。

这是1980年代以来，在一步步的实践中，逐渐实现的角色转换——由强权之“喉舌”转向民间自主发声。这两家报与刊，几年来，正受着自己掏钱订阅的读者衷心拥戴。虽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帽子高悬头顶，反倒越战越勇。而且，一俟追思会结束，场上发言立即见报之意图，也是明摆着的。

籍怀念他们半个世纪的战友、怀念他们蒙冤的总书记，与会者从思念慢慢转向对蒙昧、对霸道、对无视规则之专权的批判，其力度已经远大于学生们的呼喊：他们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后一系列失败的乃至罪孽的根源；踩到了“个人专权”与“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要命的痛脚。

他们代表的，是开始觉醒的民众对中共执政的全面反思——这本是公民基本权利，不幸自 1949 年之后，一直被当作异端。他们直接挑战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他们知道，而且直言：这种架构和机制本来就是不合法的。在这个意义上，1989 年天安门运动一开始，就聚焦到中国政治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和程序性上面来了。（吴国光）

这场追思会，一定立刻报到邓那里。……对此会，他最重的评语不过是“不像样子”，但在意念深处，是不是有了方励之、有了赵班子里很过头的那些政改言论？而对后来做出“断然”处置的江泽民，是否增加了好感？

动念。但深藏着。

藏得住么？是不是直接导致 4 月 23 日杨、李联袂到他家？

第二节 李鹏登场——文吓开锣

4月23日

形势急转。用当时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年的话说：

4·23 下午赵出访，4·24 李鹏就（召开常委会）听北京市汇报，4·25 给邓小平汇报，4·26 发表社论，三天之内就给学潮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动乱”的性。

于是有了一个多月之后的“一举镇压反革命暴乱”。

李鹏，怎么运作的？

早在二十年前，民间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到，把事态扩大的关键，是激怒邓小平，继而将邓的狠话放进社论。

总书记出访，一线指挥权交给李鹏。20年后，李鹏在《日记》中表示，当时他对此很是不爽：

赵紫阳已经把那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

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按照《李鹏“六四”日记》所说，赵出访那天早晨，形势紧迫，教委、北京市的几位，也是相当心焦：

11:00

铁映来电话，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他希望紫阳主持听汇报。

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

锡铭也给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

紫阳告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你们向他汇报吧。

李鹏倒是一点儿也没耽搁——起码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午饭后，把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校长或书记请来，让乔石、启立，外加李锡铭、李铁映等听汇报。

此时大家奉行的还是“赵三条”。自身的焦虑认知，与服从党的纪律，或许还有更深的“选边站”、野心等等，在李总理心上搅成一团。

下午，他到车站为赵紫阳送行，两人还小斗了几句嘴：

……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问：“还有什么交代”。赵明确回答：说“对于学潮，我还是那三条意见”，即小平已首肯的“三条建议”。

在场的乔石、田纪云等不但亲身见证，而且一致同意——在那时。李鹏说：

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即《中央、国务院特急电》中发[1989]4号）；

把此“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同上）

注意：此“特急电”的内容，是贯彻（邓首肯的）赵“三条”。

贯彻归贯彻，他的内心？按照他自己日记里所说：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于是，在晚饭后，八时半左右，他到了杨尚昆那里。两人说了什么？至今无资料披露。只在他的日记里给出：

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在日记里，他没有明文记载究竟去了还是没去，但写下了自己那天夜里回家之后：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

1989年4月，杨尚昆家在地安门后圆恩寺，距米粮库胡同邓宅不远。但就算邓立即同意见他们，二人驱车到达、常规寒暄，怎么说也有21:00过了吧？而李鹏见邓之后回自己万寿路住处，“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不断接……电话，电报”之后，按他说，是到了深夜24:00。这一大堆活儿，怎么也得一两个小时吧？也就是说，回到自己万寿路的家，是22:00之后，在邓那里，顶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在忙完了手头工作的深夜，李鹏——

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禁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李鹏“六四”日记》）

“费解”问题的第二个，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先不在这里说了。现在看看他的第一个“费解”：

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同上）

赵（经小平同意的）“三条”，在这里，变成了“反小平之道而行之”。那么，“小平之道”是什么呢？李鹏在这里，不提4月22日追悼会结束、不提4月23日车站送行，一下子跳到一个多月前，跳到3月4日赵向政治局传达的邓和他的谈话（即2月26日老布什晚宴时拦截方励之赴会弄巧成拙，邓余怒未消之下的谈话）。

“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

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

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同上）

时至4月23日午夜，情势急迫，李鹏在日记里单单记述邓50天之前的讲话，还字字句句清楚记得，怎么看都显得有些造作。

要么是样：在这晚他们二人到邓宅时，邓听过他们的报告，即中午李锡铭和大学校长们所谈（估计里边还有“团结学生会”、北大、方励之夫妇、世经导报追思会等等），把他自己过去讲过的，包括东欧局势以及刚发生的“拉萨骚乱”，再度重述？这几乎是所有老年人都有的特性。

从日记这部分内容里，显不出他从邓处得到“御旨”的紧张与兴奋——这里排除事后补写时候故意掩盖情绪——是不是那天晚上，他们去了，引出邓一番话——也就是说，在他们富于心计的汇报之后，仅仅揣摩到了邓的倾向——与“赵三条”不同的倾向。但仅仅倾向，还不足以让李鹏下决心、出手行动计划……

米鹤都^{【21】}不同意4月23日“李鹏看准机会”说。他认为，二人赴邓宅摸意向探风头，绝不是李鹏一个人所为。他的能力、威望，只够给人当枪。背后有一个势力，乃至团队。

4月24日

工作到午夜的李鹏，起床之后先听了美国之音，然后出发上班。因为昨天已经和乔石、启立一起听过汇报了，所以：

【21】米鹤都（1952-），著名口述历史作家。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本科。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等专项研讨。

上午，我分别找依林、万里、宋平谈了形势。他们都同意我们昨天电报采取的三条措施。万里同志找北京市做工作，让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工作。（《李鹏“六四”日记》）

他说的“昨天电报”，仍然是那份贯彻赵三条的《中央特急电》（“中央、国务院4月24日特急电”，编号为“中发[1989]4号”）。而万里当场表述要“找北京市做工作”，也是按照“三条”，“消除顾虑，大胆工作”。

下午3点，万老领导找北京市现任书记、市长，发现李锡铭、陈希同已经被4月23日以来的局势、特别是整个北京市大学都已经串联成功，成立“团结学生会”、“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吓坏了：

（4月24日）上午，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38所北京高校约6万学生开始罢课。一些学生在校内集会、静坐、游行、贴大小字报，呼喊“坚决罢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罢课、罢考、不罢学”等口号。

北大贴出署名“北大人”题为《给筹委会的几点建议》的大字报：建议重新拟定口号及行动纲领，以得到民众支持；口号应以反腐败、反官僚为主；行动必须在白天的闹市区进行，以便扩大影响；高校之间要统一行动；要准备长期斗争；要广泛联系知识界、民主界人士。（《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见万里找他们，且中央常委如此重视，为郑重详实向常委汇报，李锡铭于下午4时，紧急召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次学潮实际是经过两年酝酿、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

结果，本来去鼓励北京市“消除顾虑大胆工作”的万里：

下午17时，万打电话来，说北京市反映，形势非常严峻，对中央态度不明朗，很有意见。他建议开常委会。（《李鹏“六四”日记》）

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四点建议：

- 一、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明确表示态度。
- 二、中央报刊等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攻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 三、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只要中央全力支持，我们将继续站在第一线，做好争取绝大多数群众，孤立少数敌对分子的工作。
- 四、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

北京市委明确向中央请战：“只要中央给政策，我们是有办法解决的。”

当晚 20:00，李鹏召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碰头会”，列席的有杨尚昆、万里、书记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邓陈李三人大秘。

但是，依照惯例必须到场的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鲍彤，没有得到通知。这绝非疏忽。那么，为什么？

李志坚代表北京市做了“主体汇报”之后，呈上致中央政治局《关于北京市发生动乱的报告》。

李鹏《日记》是这样描述的：

晚 8 时，常委碰头会是关键的一次会议。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形势严峻，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针是首先稳住北京，进而稳住全国。北京市委表示，只要中央态度明朗，我们就能发动群众，挽回局势。

在讨论中，我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人民日报》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传达今天常委碰头会议的精神；二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全国各省市发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今天会议精神。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会议还通过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三位同志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负责在第一线处理学潮。

这里，望大家特别注意李鹏说到的“大家认为可先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因为，紧接着就有了那篇最著名的、以邓小平“4·25讲话”为蓝本的“4·26社论”。论者差不多把4月24日晚上委托胡启立根据此次会议起草社论的事忽略了。殊不知，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细节，揭示了在4月24日这次会上，即使李鹏，也没有料到第二天邓会讲那么一大番狠话。

李鹏没有提到的一个细节，后来由在监禁中的赵紫阳披露：

在我回国前，北京曾在常委碰头会上提出过实行戒严的问题，当时受到杨尚昆的严厉批评，说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待？（《改革历程》）

另一个李鹏没有提及的细节，是胡启立多年后回忆起的：

在那个会上，听到“党内有黑手”，当时直感到汗毛倒竖。（刘宏遵）

接着看《李鹏“六四”日记》：

散会时已是晚上11时半。

我接到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10时小平同志约我和尚昆到他家去谈话。

就时间轴而言，这里是不是有个破绽？

这个碰头会，王瑞林在场（列席）啊。此通电话，是散会后他回去报告、又请示了邓、之后打给李鹏，让他第二天过来——这意味着明早要见他们的小平同志，直至5月25日零时还在工作，没有可能吧？

或许，在会场上（20时左右），刚得到北京市《请战报告》，王瑞林即火速着人回家送到邓手上。邓在散会前就决定明天见他们二人了？

当然，从时间看，也可能是王瑞林未等散会，即从会场返回，向邓报告了情况，邓做出决定。但日记里没有记载。

4月23、25两天，李鹏和杨尚昆怎么去的邓宅，是揭示邓小平晚年绝不可忽略的细节。这是因为，它直接涉及到八九“六四”核心死结“4·26社论”之蓝本的“邓4·25讲话”是如何引出的——留待后世档案解禁吧。

4月25日

李鹏在《日记》里写道：

10时，去小平同志处。我和尚昆去的。

他听完我和尚昆同志关于昨天常委碰头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以及要采取的对策的汇报后，讲了一篇极有分量的话。

邓放出来的狠话是：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对有些人，要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不要卷进去，不要继续搞了。不要等事情发展起来了，怪我们没有打招呼。《科技日报》内部有争论，要支持内部的健康力量。

他的日记里还有邓对《世界经济导报》的点名批评：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搞得不像样子。报刊编辑要调离，负责人要解除职务，要坚决调离。必要时可以停刊，不要怕人家骂。

接着，邓讲了三个“不要怕”：

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

邓肯定了北京市的意见（万里功不可没），接受了杨尚昆的看法：治丧活动是好的，现在性质变了。还特别强调，“你们常委昨天的决定是对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他还要求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控制局面。

李鹏当场记录、“口授秘书”，最后整理出的“谈话要点”，成为号令政治局改弦更张的朱批御旨。

对此，《日记》有具体记载：

下午3时，我立即召开常委碰头会，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

尚昆同志在会上明确表示，李鹏同志传达邓的讲话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常委会一致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十分重要，应立即传达下去。决定首先在三大系统，即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副部级以上干部中传达，内容包括小平同志今天的谈话的记录稿和4月24日晚常委会纪要。

李鹏此时，是不是想到几年来，他这个弱势总理的憋屈，想到赵紫阳怎么一口一个“小平同志”……好啦，昨天，小平同志亲口说啦！此刻真是迎风举帆，志遂心喜。

有了他亲耳听到、外加尚昆同志当场见证的圣谕，“总书记出访期间代行职务”的常委第二号，行如滚雷霹雳……就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又接到了电话，一个他不写进日记就太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历史的细节：陈云大秘许永跃特打过来关照：

注意休息。

陈云同志！都理解啊……或者说，料事如神啊。当然，李鹏此时浮想联翩的，或许还有1987年，陈云怎么力荐他当了总理；1988年，怎么在“物价闯关”上密示。

从一开始，陈云就密切关注。终于到了可以借邓的言语、行动，遂行他陈云之志向的时刻。当然这时节，自己立刻站出来发号施令仍然是伤大体的。他站出来的姿态，只是谦恭地点一句：

支持小平同志！

其实，言语之外，他们已经动作起来。据邓力群：

参加耀邦的追悼会之后，我就去外地了……陈云收到了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他把这个文件给我看了。而陈在收到这个讲话的第二天就回北京了。……打电话让我快点回来。（邓立群《十二个春秋》）

党内第一笔杆子啊！十三大中央委员和顾委会差额选举，邓力群的中委中顾委一落选再落选。是陈云同志专门批示：邓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变。如今，关键时刻，陈挑开了上场门的门帘，集结号吹响了。

下午聆训而来的邓小平“4·25讲话”，当晚就在三大系统的传达完毕。

有意思的（或可细细揣摩的）是，因为“三大系统”负责此事的人，状态不同，所以如此重要的传达，竟然有A、B两个版本。

国务院系统，由李鹏办直接往下捅。“中央系统”，温家宝觉得“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李鹏为争取时间（赵紫阳回国前传达到位，造成定局），同意。于是有了B版；

北京市采用的是A版。传达时，主动扩大到区县局级干部。

无论A还是B版，邓这篇如此重要的讲话，竟然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出版）。为什么？

这次传达，鲍彤参加了——大局已定，他真的就是来“听传达”的。接着，怀着胜利的喜悦，李鹏日记里这样写：

由我签发，把24日常委会纪要和小平同志讲话记录稿密传到平壤，送给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

御旨在手，李鹏一刻也不耽误，立即让曾建徽（真理部副部长）执笔起草《人民日报》社论。为了忠实体现太上的讲话精神，直接拿他最后一句话“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做社论的标题。（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另外，社论中还原样照搬了太上讲话，比如这句：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社论立即于当晚 18:30 分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通告全国。

4月26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期目的是要搞撒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动乱”一词，在社论里出现六次。

至此，1989年政争导致权争之第一张牌，由小平吼向“不安定因素”的“文吓”，这纽结于1989春夏之交、纽结于溅血的广场……纽结于权力资本形成，直纽结到今天的“4·26社论”，出笼！

出笼之后呢，李鹏记述：

4·26社论在昨晚广播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各级领导和党团员振作起来了。北京市委下午开了万人大会，江泽民在上海上午就开了会。（《李鹏“六四”日记》）

陈小雅的观察：

社论播出之日，人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似曾相识”。读者和听众从这篇社论中嗅出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镇压前的空气，那段刚刚过去13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仍然记忆犹新。

从过程、思路到语言，都如此的相像。只不过上一次是用“一小撮”，这一次用的是“极少数”；上一次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这一次是以“社会主义法制”的名义；上一次是要保卫毛主席，这一次是要保卫邓主席；上一次是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这一次是要依靠广大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

这些细微的差别，多少表现了时代的进步，同时也表现了这个党在两个时期的社会基础的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都是蔑视人民的权利，压制不同意见，丝毫没有现代政治的气息（后者只是在利用现代政治的某些概念，而亵渎其精神和实质）；都是迷信武力，采取恶劣的高压，恫吓和“铁腕政策”；都是在企图用莫须有的罪名打倒自己的政敌……（《八九民运史》）

老共玩了几十年的“高压，恫吓和莫须有的罪名”，到了毛酋宾天、小平同志的改开都有十多年的1989，依旧那么血糊糊地吓人？

虽然社论的言辞声色俱厉，调子定得很高，但效果很差，实际上，社论播出不过十多分钟（18:30开播），18时45分许，人民大学三、四千名学生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声援罢课，并强烈抗议“4·26社论”。“社论颠倒是非”，“要继续干下去”。一些学生呼喊“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口号。21:40，游行队伍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出来后，原计划到北京师范学院，但遭到近800名警察拦截。23:00时，北高联发出通知：“27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抗议“4·26社论”。

细查今天能够找得到的所有文档，没有发现，在23、24和25日三天里，邓小平曾有“不惜一切代价”的打算；也没有人“期待广场血流成河”（柴玲原话）。事实上，无论是当晚，还是第二天，也未见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如何砸向这场“有计划的阴谋”，这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

遥想当年，“文吓”的初代高手、毛太祖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多少慷慨激昂、忠忱为国之士，陡然间变色——接着改变行径。恫吓——以政令、告示、组织谈话、大会小会、劳教劳改……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到文革，半个多世纪，共党治下平民，哪一次不是大帽子一举，无人不吓得噤若寒蝉。

但1989不是1957，中国变了，呼吸了十年自由空气（哪怕很稀薄的），“争论着萨特福柯、嘶吼崔健摇滚”（李承鹏语）的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还没学会在政治恫吓面前瑟瑟发抖。

同一天，根据邓小平讲话暨“4·26社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的精神，及中共中央的委托，北京市公安局已连续发布两个公告，禁止在公共场合演讲、募捐、集会、游行。当晚在电视台和电台进行了反复播出。为防紧急情况，驻扎外地的38军数万名野战军奉调进京。人们纷纷传言，医院已经腾出大量病床，并且临时进行了医治催泪瓦斯所致创伤的训练。（陈小雅）

4月27日

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浦志强，在自己的回忆中，描述了他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走出校门的艰难抉择：

当时学生在悲愤之余，受到了社论和整个态势的强大压力并感到手足无措确是事实。基于经验以及各自的渠道，爱护学生的老师和学校的各级领导，以及后来被认为是八九民运的黑手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陈小平等人，无一例外地对第二天的游行所可能面临的血肉横飞的悲剧性结局深信不疑，只不过是激

进的师生对于这样的定性实在无法接受而已，但是如何以具体行动以及以何种具体行动表达这种主张则实实在在地是举棋不定——没有人有资格和勇气敢于对如此重要的决策承担责任，并且，没有人对于在这种态势下自己的振臂一呼是否真的会应者云集充满信心——万一狼上狗不上，真的就完蛋了！

4月26日全天有上百名激愤的本科生涌到我的宿舍要求我第二天一定要带领大家冲出去，“我们愿意去死，只要能死在一块儿！”我只能对大家说：“只要有一位同学冲出去了，我保证我是和他在一起的！但是，一定要与各校统一行动。”因为做出这个决定的责任——包括对历史的责任——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十几位老师也不断地跟我讲一定要对自己和同学的生命负责，千万不能出去，因为政府已经红了眼……与此同时，我也不断地请求得到陈小平、吴仁华、刘苏里等老师的指点。记得当天我曾问陈小平到底第二天出不出去，他说：“看样子，明天出去肯定会流血，我操。”

.....

周勇军等临时学联的学生领袖所受到的压力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只有在做出选择的权力看起来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候才能真正意识到选择的艰难——他们决定取消原定的游行决定！

在4月27日早上我于8:00左右起床后，听到了政法大学学运负责人——85级本科生XXX——在校广播站播出周勇军的取消游行的决定。这份决定说将原定的到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改为在各校校园内游行。但是，心有不甘的同学们还是陆续聚集到政法大学的校门口，“四二二”时用过的宪法标语牌和其他的横幅、校旗、系旗一应俱全。阳光明媚的早春天气，祖先留下的土地已经作好了孕育生命的准备，但此时此刻他的子孙却正在打算着为未来而奉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天空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

但此刻，深为广大同学敬重的校长——江平先生，正拖着自己的一条假腿，坐在校门口，坐在同学们的脚下，声泪俱下地说着，挡住了同学们往外冲的路。

江平先生的大意是，“你们是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你们的父母把你们交给我，我就有责任保证你们的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去就意味着流血，我们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后果。我请求你们，不要出去。只要是在校内，就没有人会来伤害你们。学校将为你们在校内的游行和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一切方便，只是千万不要出去。”空气像死一样沉寂，欲哭无泪，在每一张表情严峻的面孔上——周勇军的决定依然在广播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送着。

我当时讲了话，但是我仍然下不了决心。我说今天的形势，严峻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走出了这一步，就意味着准备接受流血牺牲的后果，这样的后果将不是他的领袖打破自己的头就能避免的（“四二二”中午悲愤至极的我用手中的喇叭打破了自己的头，血流满面）。这次讲话辞不达意，我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想说明什么意思。周勇军的决定还在播。此时，扛着宪法标语牌的本科生 XX 抓过来一个喇叭，抬眼望天，语调嘶哑，带着哭腔吼道：“我们已经忍了这么久，难道我们就只能永远这么忍下去吗？！”我感觉我遭受了雷击，血液顿时涌遍全身，一哈腰就搀起了我们的校长：豁出去了！拼了！不足一百人的队伍冲出了校门！

此时大约有 9:00 光景。（《八九民运史》）

绝不认可“4·26 社论”！15000 名学生们举着小平语录：“创造民主气氛”“三不打”（当时流传的“上边精神”：不骂、不打、不抓），乃至“拥护共产党”，在百万市民的夹道呵护瞻顾下，以平和而坚定的商讨，通过一道又一道北京警察、武警、包括军队的警戒线。

整个“四二七大游行”秩序井然。过了南长街口，现场军人理性克制，游行队伍主动不进入天安门广场，只沿着金水桥一路向东走过去。注意：在 4 月 25 日深夜高自联的“游行通知”里，原计划为“27 日，全市统一游行，到天安门汇合”。

这本是八九风波里最可播扬的亮点——无论民众还是官方；无论组织者还是军令发布者。

4月27日大游行，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真正的大学生运动。从1949到1989，四十年了，这是学生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上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4·27大游行，其实标识了毛泽东时代严格思想禁锢退位，标识了邓小平时代思想解放之曙光。

对此，他自己觉悟到了？

与之相比，1989年春天方励之等的“进言”（激进派的上书呐喊）比不上啦。

据赵紫阳《改革历程》回忆：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

李鹏得到准确的报告：

北京闹事的学生游行队伍今天终于出来了。从早上8时开始，由学生队伍带头，沿途也夹杂一些北京的市民和外地来京的流动人员，汇集成一支游行队伍，冲过公安和武警设立的层层防线，于下午4时到达天安门广场。今天游行学生的口号变了，再也没有为胡耀邦平反、为反自由化平反一类政治性的口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拥护共产党，打倒腐败，打倒官倒”。

我一直在中南海办公室注视游行队伍的动向，原来估计游行队伍会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下午4点半，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后，并没有停留，一直向东长安街去，到达建国门后开始分散，晚上11时左右，各路游行队伍陆续返回学校。（《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对北京警方的处置甚是不满：

警察和武警赤手空拳，甚至连非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带，如何阻挡得住游行？

他对如何平息学潮、民愤的认识，还不如民国时候的段祺瑞。他在日记里写：

游行结束后，各方反映不一：参加游行的学生认为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些老同志、老党员认为政府手太软，制止不力；学校和党政机关里拥护党的骨干分子觉得大窝囊；一些老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没有抓一个人，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外电也说中国当局对游行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日本时事社说，中国一批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运动的集团。学生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标语也是遵照这个集团的指示。后来才知道，发现这个指示就是方励之、李淑贤，他们给学生头头王丹带话，“明天游行口号要变。”美国《华尔街日报》说，学生是把悼念胡耀邦作为政治民主化的借口而已。

总的来看，由于《人民日报》“4·26社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全国形势基本上已向稳定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长期自由化思想影响，要把事态一下平息下来也是不可能的。

从今天的游行，也可以看出，闹事学生背后一定有黑手，在操纵和指挥。

这情景，想来，邓也知道了。李鹏写道：

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态度明朗”，这意味着，邓依旧坚持：政治上必须强硬。“处理是好的”，没有流血。他是不是只看见游行队伍里的“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还有他自己的语录；而真正表达游行意图的“反腐败、反官倒”、“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以及“打倒邓小平”——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装不知道。

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不少对邓的议论和批评。邓家人对此很有意见，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

据说，“邓办”人员还发出通知，要求收回邓小平“4·25讲话”。动作较慢的省市，只传达到厅局级。（陈小雅）这是不是说，让人家用了一把，自己有了感觉？

赵后来也回忆起：

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改革历程》）

他的家人担心：老爷子对两个人的讲话，引出三大系统的传达，又引出杀气腾腾社论，北大的年轻人，还会打出“小平您好”么？

据柴玲回忆，当她加入这一天的游行队伍之前，一个声称邓小平女儿邓林的朋友的人找到了她：

他告诉我说：“邓小平和老一代的领导很喜欢年轻人，但是他们现在有困难，他们希望学生们能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不要把运动深化，免得给大家都带来危害。”（《八九民运史》）

这位“邓林的联系人”还说：

家人非常担心老头子的身体健康问题，希望问你们学生到底要求什么，不要造成更大的误会。（1991年7月17到24日，在巴黎举行的“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

可惜正义的、以学生为先导的常规抗争，没有在这里打住。开明的执政者与理性的学生领袖，在中国这个千年专制、外加毛酋“马克思+秦始皇”治下的烂泥潭里，十分孤单。

此时，《社论》的始作俑者邓小平，高兴还是不高兴？抑或，看到“文吓”失效，要另打主意了？

把《社论》利器交到革命者手中的策划者呢？

4月28日

据说，邓在追悼会后，身体已非常疲惫。在家人的劝说下，当天去了北戴河。（高瑜）

从这一天，到5月11日，整整13天，不见邓的踪影。

4月29日

左倾卫道（保守）与理性渐进（改革）两边，同时按照自己价值判断运作——

为缓解社会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李鹏让鲍彤写了“四二九社论”，并安排袁木、何东昌与学生对话。从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太多小动作：坚持“4·26”准则的“答学官问双簧”、“变相新闻发布会”——即所谓“刺激”。

结果是：学潮再加码。

但阎明复他们则觉得，这实在是中国政坛上的新气象啊。这算是意识形态光谱上，体制内开明派官员，与民间的理性渐进派之间的共识么？

4月29日，统战部知识分子局和北京市海淀区委联手，请知识分子们喝下午茶。

六局（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主持。她开门见山第一句话：

27日平平安安过去了。

孩子们——我们的青年学生太可爱了。我们党也经受了一次民主的考验。

大家先是怔了一下，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党国官员和自由派一起为她的评语鼓掌。

对此，邓知不知道？4月27-29，北京街头双赢局面（杨继绳语），胡启立、阎明复有没有上报？他们不报，也不见有人堂堂正正地议论，是不是担心此“双赢”，会被极左卫道们反说成邓的“文吓”失效？

这回还有一个小花絮：那天，本著者刚踏进统战部茶会的门，即碰上与邓家比较熟络的王南宁。即前面提到的4月15日对著者和台湾《天下》总策划说的“小平同志将从宪法中拿掉四个坚持”的汪锋之女。

“南宁，怎么回事啊？”我一见她就问。

“谁他妈的跑老爷子那儿胡嚼……”她说。

今天想来，这难道是她（或许还有邓家人）对杨、李两次汇报的“粗评”？

她的判断，和赵紫阳的分析是一致的。赵认为：

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

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改革历程》）

后来，看看当局仅止于苦口相劝，看看民众（包括香港、台湾、海外）百般爱惜（包括源源流入的捐赠），看看传媒相争追捧（全世界啊！），主角换了人（或者人虽没换，本来内心潜伏着的、超出一般性学生抗议的政治性格浮出）。他们攥住普世原则和当时民意敏感点：民主、法治、官倒等等，要求对话、高层对话、现场直播；他们坚决反对复课，意图采取激烈行动使事态升级。

樊立勤对他们的描述是精当的：形右实左。

赵紫阳对此，尚无认识。仅仅“气还没有完全出够”么？向邓做如是汇报，意欲何在？

第三节 紫阳回京

4月30日

赵紫阳访朝归来。

赵是在出访第二天接到电报的。他当时就表态：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

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改革历程》）

列车途经沈阳，赵听了当地领导人的汇报，得知省委都在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邓“4·25讲话”传达以后，很多人骂他。^{【22】}

当天上午，赵到达北京，李鹏接站。

【22】李树桥回忆说：“回程的列车到了丹东，全树仁、李长春、刘精松上了火车，和紫阳在那里谈话，我就在旁边听着。赵紫阳首先跟他们说，关于这次学潮小平同志有个谈话。全树仁说，我们都知道。紫阳很惊讶，问你们怎么知道的？回答说是已经传达，社论在大喇叭里面都广播了。紫阳问，广播了以后什么反映啊？回答说都在骂。紫阳问，都骂一些什么话？哎呀，他说那可是很难听了，什么不该死了死了，该死的没有死。那些话确实非常难听。”（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

我4月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要我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同上）

对有人可能抢在他前面，李鹏很在意：

今天赵紫阳回国。上午10时，我去北京车站接他，并请他安排时间，忙听取我汇报这几天国内发生的情况，商量今后的对策。他答应，下午4时在他家见面。

下午4时，我如约去赵紫阳住处。赵紫阳住在中南海四号院，会客室在四合院的东厢房。我到的时候，室内空无一人，但充满烟气，烟缸里留下不少烟头。这证明他已经开过会了，是哪些人参加的会，不得而知。

5分钟后他来到会客室，我们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同意明天开常委会研究“学潮”。通过这次谈话，我感觉到他的总趋向仍然是主张对“学潮”采取缓和的方针，这显然与邓小平同志坚决制止动乱的方针不符合，也与他4月26日从平壤回电“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做出的决策”的表态大相径庭。（《李鹏“六四”日记》）

从这段记载看，李鹏急忙来这一趟，起码摸到了赵的基本态度——并非如平壤发回电报所言“完全同意小平同志”，而是依旧在搞他自己的一套。他怎么想，是不是“得赶快告诉他们……”

李鹏说赶在他前头紫阳最先见的，是乔石。

赵和乔石怎么谈的？未见只字记载。乔不提，赵在监禁中多次敞开心扉、纵论成败，也不提。著者揣测：心思缜密、价值判断清晰的这位“常委排名第三”，起码会把4月24、25连续两天（充斥着试探与诡谲）的“常委碰头会”细细向赵谈了。

接着，鲍彤赶到，带着他为赵起草的“五四讲话”和“四中全会报告提纲”。鲍彤应该也对他说了“四二九社论”。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赵在第二天的常委会上表扬（而没有严厉批评）李鹏。

其实赵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求见小平。

邓家大秘王瑞林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23]，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王说的，紫阳理解：第一身体状况；第二心思全在见戈。有没有第三呢——谁都不提的四二七大游行：文吓失效、心情抑郁？

医学界早已注意到：一个人精神极度沮丧，是会直接影响身体的。有小平恩师伟大领袖为证：经历了1971年林彪出逃和1976年丙辰清明，太祖身体大损。比当年的毛又长了几岁的邓，此时状况：耗神、沮丧、悬心？

据周边人员观察，有时候，邓会很主动地介入一线工作，如国防工办设立、洋浦开发……多次说：“我来”、“我要讲话”、“我替你办”、“我不当逃兵”……在这样的时刻，紫阳的态度往往是：“还是我们来办吧”。但赵实际上也多次观察到，小平同志口上这么说着，实在真已耄耋倦勤。（引自紫阳生前身边人说，2019年3月18日）

这些，都是一个身体日渐衰弱但依旧雄心万丈的老人的常态。

5月1日

赵召开常委碰头会。

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的调子），有很远的距离。……当时强调要按照4·29社论的口径作新的解释。“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这样实际上就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改革历程》）

他当然也清楚地认识到：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听李鹏汇报，看

[23] 樊立勤在他的《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也提到，朴方对他说“……在此之前邓小平大病了一场，……”

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如果邓一点不改口，那我也就没办法让李鹏、姚依林这两个死硬派分子改变态度。而他们不改变态度，常委就难以贯彻疏导、对话的方针。

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同上）

5月2日

赵继续努力，想间接地向邓进言：

5月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同上）

5月3日

5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

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相机）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同上）

应该说，这是非常明确的回复了。但怎么淡化？怎么慢慢转弯子？弯子转了，始作俑者——两边的，即死咬住“反革命动乱”和“就不是就不是”的——岂肯善罢甘休？

接着，或主动或被邀，总书记又接触了很多人：北大和北师大校长；民主党派负责人……分析学潮的情况，听他们的看法。真正敞开心扉交流的，是许家屯和万里。

这天，在中南海住所，紫阳和家屯同志谈了两个多小时——香港工委书记接到总书记返京的电话即匆匆赶过来。何谓“弯子”？怎么个“转”法。许家屯后来做了细述：

赵紫阳一开始就问我在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讲：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许家屯说，自他5月2日到北京之后，从他结交的圈子看，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党政机关干部。其中最积极的，有两种，一是个体户，一是企业经过改革后的主管们，他们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担心政策改变，走回头路。

许家屯认为“4·26社论”称学生“动乱”、将矛盾激化，极为不智。大家震惊之余，都在骂邓小平。许家屯说：

也有人讲，邓小平又上了李鹏、陈希同、李锡铭的当。

据说李锡铭、陈希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报告说，学生要暴动。

陈希同甚至讲，给他五万军队，可以马上镇压下去。看来邓小平听信了他们。（同上）

此处，许听说的，或许就是4月24日当场，杨尚昆断喝的“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待？”。

作为改革派要员，许家屯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再犯错误了。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搞垮了，出现了“三信”危机。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现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同上）

赵紫阳同感。直到此时，到1989年5月初的时候，他的理性判断依旧难于抹去内心里对小平同志的敬与爱惜。他明确提出自己担责

事实上，《人民日报》“4·26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给了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改革历程》）

他们接着又谈了廉政，反贪，惩治“官倒”，反对特权等等。赵紫阳甚至已经有了具体考虑：比如反特权，如何从中央做起，先取消中央常委的“特供”，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以及高干子弟特权。

赵讲：“我准备写一封信，向中央表示，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

他还表示，要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来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措施。（指给予中央副总理以上干部廉价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岁数大的老人，可以考虑缓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专用火车）、警卫制度，几位老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建议，长远来说，要考虑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银行利息，提倡储蓄，多吸收社会游资。

我们还议论到“学自联”和“工自联”的问题，即在传统的工会、学生团体之外，现在有了学生、工人的自发组织，应如何看待？

赵紫阳表示，我们不要怕这些自发组织，可以让他们活动，参加选举。只要我们的群众组织能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担心有人竞争。（《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这是二人谈心，毫无哗众取宠之意。但是，为“抗日救国”而“参加革命”的紫阳同学知道么，这可是最动不得的！人家打天下为的是甚？虽然招幌都是光鲜明灿：抗击日本法西斯、拯救普天下劳苦大众……

据许家屯记述，赵说，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要征求常委们的意见，改变决议。

并且请许家屯“帮助一下”，再一次想找到与邓通气的通道：

你和尚昆比较谈得来，请你把我们今天谈的意见，特别是把外界的反应和你的看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如果他同意，再请他去小平同志那里，争取小平同志改变对运动的定性”。（同上）

话说到这里，“淡化”、“转弯子”，变成“改变对运动的定性”。

意思没大不同。但是，您二位心里清楚么，一次次上街的抗议者，提出的“民主诉求”多么空疏与情绪化；民主的达成，没有一毫米一毫米的协商而逐步推进，有可能吗？与最容易为政客所用的情绪宣泄，有什么不同？

您二位想到了没有：事涉共产党让权的“改进”，每往前挪一点，或者说每次推小平再退一点，都是左倾卫道们新机遇：又有缝子“下小话”了。

这天，赵紫阳还到了万里家。二人谈对学潮的看法；谈现在一些领导人依旧“阶级斗争为纲”；谈时代变了，要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万里对紫阳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特别说到李瑞环，说“他错了”。

一直未见论者对他俩的这次会面认真分析。

万里，笃诚君子，但不可以如此粗疏啊。北京的那帮子，与天津的小木匠，虽然都说“中央态度软”，内涵并不一样。北京硬在阶级斗争大帽子往下压；天津呢？李瑞环的态度是：你同学们政治目标再高尚、为理想献身精神再真诚，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也不许随意破坏。

乔石其实也是这样的：4月18日处理新华门那回。甚至可以说，4月25日小平讲话之前，上海市委（曾庆红、汪道涵、江泽民）处置《导报》事件，大致脉络也如此。他们的务实，以及从不大而无当地玩西方概念，恰是小平在此阶段改开最欣赏的。

对于繁杂、致密、处处冲突与陷阱的现代化转型，思想致密但心地单纯的赵，是不是过于理想、过于心急、过于轻信顶层设计，而未如小木匠那样，深黯社会与人性痼疾，宁愿藏起内心柔情（如果有的话）而板起面孔出手？万里呢，居然认为“他错了”。

痛惜！

不断的约谈，赵紫阳对他出访以来这一周里北京形势，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五四”临近。当局必须有声音，而且早已在筹备中。赵与要害人物密集谈话时，鲍彤已经将紫阳的五四讲话稿，打印送常委讨论。

这里边的一个故事：杨尚昆、李鹏都提出，在讲话中要有“反自由化”。紫阳说，我们已经正面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必要从反面来讲了。杨尚昆跟李鹏也没有再说话。稿子送邓家。邓榕特地给鲍彤打来电话。对于无只字提及“反自由化”问题，她也没说什么，反而希望在这个讲话中加上邓小平爱护青年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在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希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5月4日

这天，当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五四宣言》的时候，赵紫阳会见了到北京开会的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及高级官员，发表了后来被批为中央“第二种声音”的那篇讲话。

这里，有一桩被论者忽略的事——相当重头，充斥着诡谲。

会见境外金融业人士，原属改开日常事务。赵会见，更属于乘便见个面，意思意思，没什么重大议题协商。但碰巧（或曰不幸）遇上了北京入春以来的特别情形。赵紫阳觉得，如何对外人解说，是不是该……

上午刚上班，赵紫阳突然找鲍彤，说下午1:30与亚行代表会见，虽然规模不大级别不高，但正处在这个时间点，必须慎重。他需要讲

稿，要鲍彤为他准备。但上午日程已经排定：到北京医院探望李先念，赵须立即出发。鲍彤只好坐进车里，在前往医院途中，听赵口述他的想法。

鲍彤后来说，这篇讲话：

思想、内容、提法，以至许多重要的语言，都是紫阳亲自口授。我回办公室后做的是文字整理工作。中午12时半交稿，紫阳又在稿子上亲自做出了两处修改。

对秘书说来一蹴而就，但对口授者来说，其实是多少天以来心中反复揣摩琢磨的披肝沥胆之论——

口授之后，赵按计划前往医院看望李先念。

他们的会面，据常识揣测：赵到病房，一阵寒暄之后，李当然会问起“情况怎么样啊？下午见亚银啊”之类的话。在那样的情形下，也许还带着口授后的兴奋，赵把他早晨突然起念，和刚才在车里凝聚成的想法，随口对敬爱的老同志说了几句。

言者不仅“无意”，简直一点城府都没有；听者，也不仅“有心”，实在是有心机了！

怀有“心机”的，听着赵的叙述，强忍着心头的兴奋。他刚离开，据现场护士说：先念同志不知怎么了，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在房间里一个劲转^[24]。

对于邓小平翻脸后一个劲提“亚行讲话”，著者一直摸不着头脑——直到听到这个故事。赵自以为抓住了亚行会见的机会；而一心找机会抓赵的李先念，实实在在抓住了赵抓机会的机会！这是他们上门挑拨的重头——他说“不会出现动乱”；他要“改变定性”。（《邓小平年谱》）

【24】 转述人的姑父（李先念五师战友）也在住院。护士见到先念不正常举动，跑过来对他们说。

5月5日

赵紫阳事后回忆：

我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数。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改革历程》）

“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正是在中国当前境况下，解决社会突发事件，防止进一步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

这条途径，一反中共历来处理政治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如最近的典型表现：“4·26社论”），闪烁着改革开放的执政理念，标志了以民主和法制治国的全新的政治思维。（吴伟）

这些闪光点，经手的鲍彤一定在完稿当时就意识到了：这正是他们政体改革天天思索的啊。他不曾明言，但一定觉得，这样的明智坦荡温和声音，是不是应该更加广泛传布社会？他动作起来。一是告诉新华社，发全文，不要删节；二是告诉《人民日报》，用新华社稿，在显著地位登出；三是告诉广播电视部，用新华社稿当晚播出，并请他们安排重播。

紫阳亚行讲话引起良好反响。

《人民日报》：标题“首都高校昨起陆续复课，赵紫阳讲话引起积极反响”，副题：“希望党和政府切实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增加透明度”。

几家知名外国媒体对“亚行讲话”的报道。

《世界报》的评论文章称：

赵的讲话表明了一个最明显的迹象：他回到北京以后亲手控制住了事态。……这位党的首脑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

路透社的评论文章称：

赵的讲话重新确立了他的权威，并采取行动使正在逐步升级的民主运动失去势头。……赵的讲话采取了一种十分同情的态度，讲话的调子，比较积极，也比较有个人特色。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鲜明对照。

时至这天中午，常委们已经认为：学潮暂时告一段落了。

赵紫阳后来记述：

5月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下。（《改革历程》）

鲍彤出手，绝非孤军突进。紫阳启立，已经着手将政改办他们酝酿有时的新闻改革，迎着民众和新闻工作者期盼（包括参加进学潮的实际行动），一步步实施了。

5月6日

赵紫阳说：

我看这几天的新闻，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导。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嘛。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中国“六四”真相》）

胡启立动作起来，给《人民日报》的钱里仁打电话，落实“新闻改革”的相关事宜。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就新闻工作进行了讨论。

赵紫阳：

这几天听了不少反映，看了不少报告，我觉得新闻改革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要向首都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讲清楚，新闻报导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能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报导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同上）

胡启立：

据新华社反映，这几天首都新闻界正在发起一场新闻记者签名活动，要求与我们对话。（同上）

赵紫阳：

我们欢迎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与新闻记者进行对话，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助于我们的新闻改革。当然，我们对一些过激的言论要提出忠告和批评。今后，在处理一些敏感的新闻事件时，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千万不能匆忙、草率地简单下结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搞得我们很被动，原因就在这里，要引以为鉴。（同上）

这里的“被动”，指的是上海市委出手之后，整个新闻界的反弹。或许可以这样说：他们几位，与陆超祺、李大同……等不甘为喉舌的新闻界人士，从观念到情感，都是相通的。主管意识形态，愿意携手共进。

他们忘了邓对“思想自由”的厌恶；忘了毛左卫道正等着他们在这里开罪小平。

芮杏文说：

新闻要讲真话，老百姓才会相信。现在，我们的记者就不相信自己，还打出标语“不要逼我们造谣”。看来，我们的新闻体制的确需要尽快改革。（同上）

事实上，在紫阳访问归来之后，自“五四”讲话之后直至5月10日，中国新闻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局面。其“宽松”的程度，不仅远远超过“毛时代”，也超过了改开之后的十年。

陈小雅说：

笔者到大西南山沟里去采访。一位农村教师得知笔者曾供职首都新闻界时说，只有1989年5月的几天内，中国有真正的新闻。

李鹏可不这么看。对此，他的评述是：

今天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了会，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宣部、广电部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到会，由胡启立传达赵紫阳的指示。……这两天新闻报道本来就向动乱分子一边倒，赵紫阳还嫌不足，还要新闻界把动乱之火再次煽动起来。（《李鹏“六四”日记》）

李先念怎么说：

这次事件闹得这么大，跟我们的新闻宣传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天来，报纸、电视、电台不仅不做正确的引导，反而连篇累牍地宣传鼓动，推波助澜，好像上街游行的都是爱国者，不上街游行就是不爱国的。还有，赵紫阳的一篇讲话比“4·26”社论的社会效果要大，反映要好，真是不可思议……（同上）

从“点眼药”、“下小话”之战术角度，这局面有点过于宽泛。他们须找出“最痛点”。

这里可以进呈于读史人的一个小细节是，5月4日上午，赵到了北京医院、见到病房里的“先念同志”。可以想象，李一定会问起“这几天怎么样”之类；而赵，以他刚刚口授文稿之后的心绪，自然会说下午见亚银要讲什么什么。

当时，一位李先念原“新四军五师战友”，恰恰与他在一个病区疗养。他说护士告诉他，赵探病刚离开，先念同志“光着脚就从床上跳下来，在病房里转圈”——极度兴奋。兴奋什么——如何激怒小平，找着痛点了？

杨继绳后来写道：其实，早在5月4日，李先念听了“亚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亚行讲话”。

面对亚行讲话后已经缓和的形势（七所大学复课），教委主任何东昌放话：“赵的讲话，跟“4·26社论”不一致，不代表中央。”

姚依林提的问题更尖锐：

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这场动乱是不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李鹏“六四”日记》）

此刻——到了1989年初夏——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光谱，从左至右，一干国人，如何动作？

- 毛左卫道：张扬赵紫阳“功高盖主”；寻隙破坏邓最看重的“稳定”局面；
- 陈计划：静待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
- 小平：自4月28日之后，还没有露面。他不是没有信息。他在判断、掂量；
- 体制内开明派：为将抗议转化为政改推进所鼓舞；对继续前行怀有期待；
- 渐进改良（包括学潮中的“对话团”）：对局势感到欣慰，本分地期待将成果砸实；
- 激进变革：自我感觉非常好，钦佩自己在理论与言论上的贡献；
- 革命领袖：这就完了么？绝不甘心。

5月8日

赵知道，新的局面下，党内须统一意见。意见统一，才能继续前行。这一天，他按照常规召开政治局扩大会。

上午先开常委会（可看作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参会者常委有五人，另外，杨尚昆、薄一波和几个元老列席。

会议由赵紫阳主持。

给人的感觉是赵紫阳认为学潮这一页，大致可以翻过去了，会议集中讨论的，应该是学潮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正面意义。

按照议程，会议最先听取北京市关于近期学潮情况的汇报：北京市提交七文件。其一即是《关于坚持“4·26”社论精神》的。这个文件逐条批驳了赵紫阳的“五四讲话”。

赵如若不闻。北京市汇报完之后，直接跳回自己原来的思路，请大家就“新闻改革”和“廉政建设”发表意见。

赵的发言，应该说，相当高屋建瓴：

这次学潮的发生，实际上是近年来国内外多种因素积累和演化的结果，它的社会背景十分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由于近年社会中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现象，使少数人暴富，这中间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干部子弟。这一现实，使不少人对现行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怀疑。
- 二，由于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使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信任程度大为降低。
- 三，通货膨胀直接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引起人民群众广泛的不满。（《中国“六四”真相》）

赵认为，及时有效地平息学潮，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实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

他说自己的基本想法，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

他给出自己的初步想法：

- 国务院尽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清理整顿公司的情况；
- 公布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
- 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同上）

这些，不要说随着几天之后他的懵然中枪，全都不了了之，直到30年后，他说的这些，依旧是民众最关切、而“坐天下”者最护着不许碰的。有意思的是，在杨尚昆接着的发言里，提到的（小平同志很生气的）“革命关系图”和任人唯亲的“太子党现象”。怎么说呢……时至今日，2019，从村到镇到县到市到中共政权的无论哪一级，不全是盘根错节地亲情血脉利益输送？而今如果有人再绘制这样的图，亿次计算机、大数据或许能拿得下来？

姚依林发言，拒绝跟随赵紫阳思路。他只字不提“反腐”和“政改”，只说学生：

我没有别的意见。我想补充一点，这次学潮还没有完。这几天虽然太平一点，但学生们又在酝酿下一步的动作，又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在为学生出主意。我们是执政党，好的意见我们接受。不好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反驳。

这次学潮已经牵扯了我们太多的精力。学生现在在采取“拖”的策略，我们不能“拖”，我们“拖”不起。该强硬的就一定要强硬起来，决不能因为学潮而打乱我们正常的工作部署。（同上）

这番话，赵很难听进去吧？包括姚近乎一语成谶的“又在酝酿下一步的动作，又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在为学生出主意”。但不露面的邓小平已从他的“特别渠道”^[25]获知。三天后（5月11日），在他终于回京，接见尚昆的时候，特地说到姚依林：

我看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同上）

[25] 陈希同说：邓有他自己的信息渠道。他认为，认为邓小平辨不清真假，不了解情况。实际上，他有很多耳目，他可以掌握北京市都不了解的情况。（《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

5月10日

除去近随，在对几乎所有人——包括赵紫阳——保密的情况下，邓回到北京。此前一天，正在京等候见邓的伊朗总统曾大闹。李鹏到钓鱼台安抚，告诉他“邓小平遵照医生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了，请原谅”（张锡金《晚年邓小平》）。

读史人或许已经注意到：4月28日之后，邓没再露面，直到5月11日见杨尚昆。

依据《李鹏日记》，吴国光曾做出一个猜测：军委主席南巡布置兵力。

下边，为读史人提供著者对当年军方人士的采访，供思索探究：

以你的军事常识，邓当时如果有意，会不会和毛一样，南巡调兵——几个军区转转？或者到哪个军种兵种……怎么操作呢？

答：没有可能。

第一，邓处事，和毛不一样。邓的思想是流动、不断变化的：说来就来、说定就定，做事很绝。亲自到下边布军——既不符合邓的性格和习惯，也不符合邓的身份。他要干，身边几个人一说就布置下去了，用不着像毛那样。毛是另外的意思——下去做思想工作：都要拥护我啊。

第二，和当时的环境也对不上。真说要“戒严”，已经是在见戈尔巴乔夫之后，是高层出现了要邓把赵给拿下的局面之后，他才打这主意。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七上将写信的时候（5月20日），就说到“不动部队”。邓如果此前到下面部署，他们不可能毫无所闻。

第三，很重要的一条，5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在南沙搞南海演习呢（南海—八九）——总参各部都去了。大家知道天安门是有事，很小，很快就会平了，根本没当回事。顶多有点担心：“部队别搅合进去啊”。

那次演习，各大军区都到现场参观。总参各部都去了：作战部部长，带着七八个人……根本没想到军队会掺乎这事。

至于一位大律师对邓武汉布军的叙述，唐若昕对著者说：邓朴方5月上旬的确在武汉，是出席残联的一个活动，并非陪伴父亲。

那么，4月28日之后，邓到哪里去了？

一个说法：4月22日追悼会之后，他已非常疲倦。

4月27日，柴玲碰见的那个“邓林的联系人”，说的就是：邓林非常担心老头子的身体健康问题，希望问你们学生到底要求什么，不要造成更大的误会。（在巴黎举行的“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1991年7月17-24日）

4月28日，据高瑜：邓小平在家人的劝说下去了北戴河。（《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载《镜报》月刊，1989年6月号）

5月初，无论是《李鹏日记》、樊立勤见邓朴方、保姆回复陈一谔、王瑞林回复杨尚昆……都说到“邓此时身体不好”。小平甚至亲口对紫阳说过：“耳鸣胸闷。这么大的事，要看我的身体……”对此，赵也有清醒估计。他当时的回答是：我们的改革，能否走出来，取决于你的身体。一定坚持四年。邓：没问题。^{【26】}

当时，悬在他心头最大的事——5月16日见戈尔巴乔夫。

而重中之重：身体！

5月10日同一天，赵紫阳主持“政治局会议”。

这是耀邦逝世以来，第一次开政治局全会。外地三委员江泽民、李瑞环、杨汝岱到会。

大家在会上做了不错的讨论。特别李瑞环。杨尚昆全面支持总书记：

紫阳讲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解决问题，这个办法有利于平息学潮。在目前情况下是可行的。（《中国“六四”真相》）

赵紫阳提出“五条建议”，加上“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个总纲，形成了赵紫阳的“新政六条”：

【26】对赵家亲属的采访。这里的四年，估计两人指的是必须撑到开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

- 尽快公布审查国务院直属的四大部级公司的结果；
- 取消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特殊供应，但75岁以上的老同志仍然保留。公布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的经历和财产；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专门受理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及其子弟违法乱纪的案件；
- 尽快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
- 司法独立审判，不能再搞联合办案；
- 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八九民运史》）

此刻，赵一心想着的，全是如何与民间诉求相呼应——以为政治体制改革日臻成熟？或许是受到“亚行谈话”后学潮消退的鼓励？他以为抓紧时机进一步推进改革，学潮自会消退？他似乎即没有重视保守派的反弹，也没有预计到学生可能会不断加码。

他思绪丰富、心灵单纯，缺少京官经历。回京之后这十天的努力，究竟是以自己的开明与诚挚赢得了民心、打开了局面，还是犯了古老中华之大忌——在皇权（和红色极权）社会里，凡钻营者，全都心知肚明的大忌？

康熙的胤礽、乾隆的嘉庆、慈禧的光绪，以及毛泽东手下的刘、周、邓子恢……只要太上还有口气，谁敢亮出自己的理念，干的风生水起不说，还欣然接受喝彩？

本来，“毛左卫道”与“形右实左”之对峙，也就是：或坚持马列毛法统，或打着普适旗号把它掀翻。到了1989年，架势已经公然摆开：就在一线开明派官员应对已然直接妨碍国家要务的“学潮”时，后者的“绝无商议、就不妥协”，已经变成前者权斗的利器。

芦笛认为，应对当时学潮，其实有上、中、下三策，即协商共赢、依法处置、镇压（芦笛《“六四”功罪》）。

赵以他的理想主义、以他对政体改革的迫切且过于乐观、以他基本不以恶意揣度对方，一直朝“上策”努力。而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特别是邓与他价值观不同，没有可能。

“中策”，其实就是乔石、李瑞环、曾庆红他们的办法。赵竟然没有在意。“下策”，镇压。最终在北京实施——真是古老中华无尽孽缘使然。

5月11日

杨尚昆获准前往汇报并聆训。由此，邓得知赵在亚行的讲话；得知讲话之后上上下下的反应——包括李鹏在内的常委们、官员们和知识分子们，都认为讲得“很好”【27】。

邓得知街面平静许多，但局面依然胶着。得知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建议人大常委在六月下旬的会议上对此次学运做专题研究。

这一天的谈话，神隐14天的邓小平，对于当前局势是什么判断？杨尚昆是邓回后第一个觐见的高层领导，他们谈些什么？对于这次会见，《邓小平年谱》甚至没有提及。其他资料来源也一概阙如。倒是《中国“六四”真相》有详尽的记录——应该说，太详尽了，过于详尽了！通篇读下来，事后编辑的痕迹相当重。只是目前可见的资料是如此之少，这里（还有以上及以下的很多地方），我们目前暂时不得不依赖《真相》来了解这次重要谈话的情形：

杨尚昆：

这次学潮，与两年前的那次很不相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学校教师、新闻记者包括一些机关干部都有。学生所提的口号，也有很多方面是老百姓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所以，这次学潮有市场。

现在，全国一些大学开始出现一些所谓的学生自治组织，北京还成立了一个叫高自联的组织，公开来策划这次学潮。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次学潮，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分子也正在积极利用这次学潮，还有西方反华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革命组织的介入。

【27】在北京的许家屯曾写条子给赵：“杨尚昆对这个讲话极为赞同”。

邓小平：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提出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来激动人心，使我们在采取策略上犹豫不决。我看，现在是学生在逼我们。

杨尚昆：

这次学潮之所以闹大，还持续不散，原因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人民渴望反腐败的心理。

邓小平：

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现在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只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从邓这段话来看，他对学运的定性，已经上升到“敌我矛盾”，而不仅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情况下，别人很难让邓改变“动乱”的定性。

杨尚昆：

对于这次学潮的处理，常委已经开过多次会议。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下解决学潮问题，政治局已建议六月份的人大常委会议专题研究这次学生提出的，人民群众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

邓小平：

你怎么看待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杨尚昆：

紫阳的亚行讲话，调子比较温和，但与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调不一致。紫阳讲话后，各地情况反映较好，北京罢课的一些学生也开始复课了，但也有一些省市对紫阳讲话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北京和上海认为紫阳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动乱”，只从正面讲“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与“4·26社论”定性的调子不一样。“4·26社论”明确肯定有黑手在

幕后策划，而紫阳讲话中只说“当然难免”，也让人不好理解。王震同志对我说，“赵紫阳本事真大，他的一篇讲话就可以把学潮解决了？”我认为紫阳讲话对缓解学潮有一定好处，但学潮并没有到此为止，只是间歇。

邓小平：

读紫阳亚行讲话后，先念同志就打电话对我说，现在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同志也捎话来，要我看看赵紫阳的这篇讲话。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讲话有说服力，能打动人。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哪一种处理办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读史人记得5月4日赵紫阳探病之后，北京医院病房里边的李先念有多兴奋吧？从小平这段话看，那时间轴，可能是：兴奋的李，把“赵将在外人面前公开与邓的分歧”及时告诉了陈。陈李二人，在第二天报纸高调评述之后，立即或直接、或“捎话”给邓——此时应该是5月5日至8日之间。

保守派元老极力游说，但一向务实的邓，着眼点仍然放在“解决问题”上。

杨尚昆：

前几天，赵紫阳就跟我谈了他的一些想法，要我把他的想法向您报告一下。赵紫阳认为，“4·26社论”在对学潮的提法上欠斟酌，定性高了。他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象，不能把他的形象给损坏了”。赵紫阳主张，对这次学潮，要疏导、分化，争取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4·26社论”的定性作一些改变。

邓小平：

常委中别人的意见呢？

杨尚昆：

他的这些看法只是私下里对我说，还没有在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过。依赵紫阳的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

邓小平：

我看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学潮。

证明5月8日、10日的会，他都知道。邓小平，消息来源及时、密集、且具有特别倾向。赵对此，本应有基本估计。

杨尚昆：

戈尔巴乔夫过几天就来了。为了确保这次会晤的圆满，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很详尽的接待方案，常委们都已传阅。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与您的最高级别会晤，我已特别叮嘱吴学谦一定要外交部精心安排，不能有疏忽。

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期间，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糟糟，会成什么体统？

杨尚昆：

天安门是我们的脸面，我们尤其不能在戈尔巴乔夫来华这几天把天安门搞得乌烟瘴气。我会再向他们，赵紫阳、李鹏强调的。

邓小平：

你怎么看京、津、沪三地对这次学潮的处理？

杨尚昆：

处理这次学潮，态度最坚决的是北京，李锡铭、陈希同几乎整天把两眼都盯在学潮上，生怕北京出现大的乱子，担当不起。陈希同就感叹说：“现在才真正体会到首都市长的难当。”

我看最近他们是高度的神经紧张，也难怪他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过于严重。

邓小平：

要做到处乱不惊并不是容易的。

杨尚昆：

天津的局面控制得最好。李瑞环的态度很明确，你要对话可以，但你得遵守法律；你要游行不阻止，但你不能破坏社会秩序。李瑞环强调一点，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实事求是。所以，天津总的社会秩序较好。我认为李瑞环蛮有思想。

邓小平：

李瑞环他懂哲学，能辩证地看问题。

杨尚昆：

上海的旗帜最鲜明。江泽民处理《世界经济导报》很干脆，我看了上海关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报告，市委没有分歧意见。但这个事件的确在国内外，特别是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上海的压力不轻。我个人认为，上海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可以更策略一些。

邓小平：

江泽民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后，陈云同志对我说：“处理学潮就应该像江泽民一样有决断”。先念说：“江泽民既坚持四项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政治敏锐，党性强，有大局观”。他完全支持江泽民的做法。

杨尚昆：

江泽民在处理学潮上有一套。记得上次学潮，江泽民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学生对话并演讲，还用英文背诵马克思著作。当时，先念就指示中直机关党委，组织中央各单位收看江泽民与学生对话的录像。我印象很深。

邓小平：

部队思想状况怎么样？

这是邓小平紧攥着的底牌。

杨尚昆：

学潮发生以来，总政治部已经连续发出四个通知，要求各大军区认真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介入地方政府处理学潮的事务。对于涉及严重影响地方社会安定的打砸抢事件，地方政府需要军队出面维持秩序的，必须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现在，军队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一些军区还开展了官兵对话活动，针对性很强，有效果。七大军区和三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精神面貌很好，没有不团结现象。

最后邓小平说：

赵紫阳、你、我，我们三人认真谈一谈。（以上对话，《中国“六四”真相》）

就在这天下午2时许，北大校园内三角地，已有一份《紧急建议》贴出，署名：“46楼部分研究生”：

鉴于目前的严峻形势，我们建议破釜沉舟，采取如下紧急措施：

A、集体绝食。具体时间、地点可商量。

B、竭尽北京高校之全力，于戈氏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作最后拼搏。

成败在此一举。（《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形右实左啊！芦笛认为，这是“以轻率的政治保险+无耻的情感绑架，所作高风险投资”。他认为，“以诸位领袖30年之后所享之安全荣誉富贵，正是1989‘国际国内大小气候’下的完美回报。”

据《李鹏“六四”日记》，这天上午他就接到了王瑞林的电话。这通电话，是为“传达小平的意见”：

没有4月26日社论，就没有今天形势的缓和。

据王瑞林说，小平要李鹏坚决顶住来自内外的压力。

不错，昨天的政治局会议，王瑞林，还有李先念的秘书徐桂宝、陈云的秘书许永跃，都列席了。最后关于“坚决顶住”一句，是原装的邓听汇报之后的反应，还是李鹏捡自己要的往日记里写？

5月12日

这天，北高联宣布了他们“13日中午12时集合去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决定，并在数所高校征集签名，内容依旧是宏大的新闻自由、对话、促进民主化进程等。激进领袖柴玲正式登场。

5月13日

总书记终于得以前往觐见这位军委主席——杨尚昆陪伴。而几乎同时，趋于和缓（间或拉锯）的局面，也在这天突破——激进领袖率学生进占天安门广场：只知开场、不管如何收场的大规模绝食开始了。

此时聚积在邓心中的，除却对乱局的恼怒，更多的，或许是焦急？中苏最高级会晤在即。两党两国能突破毛的任性而走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一步，邓小平运筹擘画十载，可谓内心巨大骄傲。一生成就之高峰揭幕在即，遭逢如此尴尬。很难不使人想起慈禧老佛爷的那句话：谁让我不痛快……

元老们（陈云、李先念、还有从头至尾一以贯之主张将“犯上作乱之众”击为齑粉的王震）再度施压：“党内思想混乱”、“出现两种声音”等等。到这时候，对赵，并未见他严厉责备，只要求“尽快拿出办法”。当然没有忘记强调“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

赵能拿出办法么——当邓大人坚持视国民为子民的中共法统，无视民意诉求，坚持不从“4·26”退步，坚持“坏人挑事”说；而“坏人”的界定——“一批造反派、大量社会渣滓、极少数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当然少不了永远挂在嘴边的万用药膏“境外反动势力”。

赵竟然没有拿出办法。

改革离不开邓的专权，对此，赵紫阳比谁都清楚。将他从四川调入北京，担任副总理、总理、总书记，哪一步离得开邓？意识形态领域掀起的一次接一次风浪，没有邓的一言九鼎，顶得住么？

面对坚持与坚持反对“4·26社论”，他能拿出什么办法？即将揭幕的“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盛事，竟无法尊严而光彩地在自家天安门广场完成，不正彰显他一线指挥失败的运作？

邓赵杨三人碰面，是在这天的下午。

然而赵，在学生已经宣布绝食、学潮趋于激进变异的情况下，在这难得的与邓小平直接交流的谈话中，仍然固执地重复他的民主法制建设方针。

赵紫阳：

小平同志，我先向您汇报一下学潮和动乱以来我的一些思想。

四月中旬以来，学潮愈闹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

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

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

邓小平并不同意“肯定主流”：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显，是极少数人挑动了大多数人。把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都激发起来了。

赵紫阳：

所以，我主张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开展多层

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

邓小平：

对话，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

这次学潮已经拖得太久了，将近一个月了。老同志们，心都焦急着呢。陈云、彭真、先念、王震还有邓大姐，包括我，心里都急着呢。要有决断力。

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要力争有个稳定的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乱糟糟的局面，怎么发展？

杨尚昆：

戈尔巴乔夫后天就来了。听说学生今天要宣布绝食，这是有意想把事情闹大，造成重大国际影响。

邓小平：

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期间，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糟糟，会成什么体统？

杨尚昆：

这次学潮尚未完全平息，又听说要搞绝食。我很担心这次重大的国事活动受到干扰。国家之间领导人的互访是一项重要的国事活动。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每项日程都事先经双方协商做好安排。为确保访问按照计划顺利进行，要求学生和北京市民加以配合，这是稍有爱国心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不知这次欢迎仪式能否顺利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

赵紫阳：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欢迎戈尔巴乔夫是最基本的礼仪，事关国家荣誉，我相信广大青年学生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不会在欢迎戈尔巴乔夫仪式上节外生枝，相信这个大道理，这帮青

年学生应该是懂得的。北京市和教委已经向各大院校学生讲了这个道理。

事实上完全不是。“广大青年学生识大体顾大局”，这是赵认识的误区：他有没有弄清何谓“广大”？何谓“学生”？。他为什么如此固执？对于赵紫阳这份“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的迂腐，邓也是无可奈何。

邓小平说：

学生情绪一旦偏激，可顾不了这么多。

邓居然认为是“偏激”！

杨尚昆：

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

赵紫阳：

对于戈尔巴乔夫访问一事，下午我透过新闻界再强调一下。

邓在这里，直接点出学生绝不简单：

我说过，这次事情的发生不简单。对方不只是一些青年学生，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更有极少数竭力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这些人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小撮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群众中间。是有很大工作难度。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是单纯的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赵紫阳完全没有被点醒，继续按自己的思路支招：

政治局的一致意见是，当前要疏导、分化，积极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这次学潮。为了把工作做在前头，政治局成员已分头与社会各界群众展开对话。今天上午，李鹏去首钢，下午我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胡启立他们这几天正与新闻界进行对话，还有……

紫阳同志，你接过“少数反共、搞破坏”这种话头，只证明自己并没有跳出“阶级斗争”思维。怎么“孤立起来”？怎么对话？你的办法是在拾你政敌的余唾，能不失败么？

邓小平打断：

现在社会各界心态怎样？

赵紫阳：

这次学潮波及面虽广，但只在全国一些有高校的城市。农村不受影响，农民是稳定的。城市工人是稳定的，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发发牢骚，同情这次学潮，但照常上班，没有罢工、游行和串联的事情发生。

杨尚昆插话：

部队官兵的思想是统一的，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这次学潮对部队官兵的思想不会有大的影响。

邓小平：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过去。

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很少，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失误。这些天我总在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同时，党也必须解决民主的问题，解决党和国家机关滋生的腐败现象的问题。

赵紫阳：

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您一直强调要加强政治生活

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实行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有些“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杨尚昆：

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利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划开来。我们决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扬民主。

赵紫阳的全盘计划是：

高举民主和法制的旗帜深得民心，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记得小平同志在1984年就曾经说过，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体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我觉得，我们要利用当前这一时机，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邓小平则循着共产党运动式解决问题的老套，认为为了夺回民心：

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最近我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搞不通，大概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不能迟。

这次事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是他们的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激动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坚持原则。当然，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以上对话，《中国“六四”真相》）

从以上的对话里，赵怎么得出了“都同意”的结论？邓小平最和缓的意见，也就是“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

傍晚，各校绝食团已陆续抵达广场（超过一千人，包括绝食者、救护队、纠察队、宣传队）。《绝食誓言》标语牌：彻底平反，不是动乱；要求对话，反对拖延。（以及绝食者们的遗书）接着，领袖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西侧台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赵领导下的中共高层拿出什么办法了？他们商议决定的，竟然是：

- 一、晚上先由阎明复代表中共中央与高校教师和绝食学生座谈。
- 二、如果座谈没有大的效果，则由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回校。
- 三、为防止事态扩大，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临时改在首都机场举行。（同上）

至此，赵紫阳“以民主法制建设促学潮解决”的路线已经彻底破产。他既看错了人，由此也完全误判了形势。他对于邓小平对“四个坚持”的坚持，对于西方民主法制的抵触估计不足，也完全不了解到学生激进分子的意图和行为模式。

一位共产党打天下时代的老人（聂真）曾评价说，赵根本就不是政治家的料，而是大公司 CEO 的料，更适合于当总理而不是总书记（实际上邓也是军中无人的情况下无奈中把他这个总书记当总理使的）。

政治家——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极权政治下——的本事，第一要会搞宣传，即操纵舆论；第二要会拉帮结派。反观赵，他上来就搞什么新闻改革，放纵学运里边激进民主派发声，而从没想到过把话语权抓到自己手中，利用舆论孤立、打击学潮，连劝带吓甚至连蒙带骗先把学生弄回学校再说。

他不拉帮结派。上对邓，是君子之交，互相隔膜，危难时连传话的通道都没有；下对官员，不用私人，不但在政争中孤立无援，就是那些他依职务派到位置上办事的人，真的能想方设法又快又好地执行他的方针、达到他的目的吗？试看袁木何东昌李鹏这一串学潮中派去沟通协商的官员有多招人恨就知道了。

1989，春夏之交，总书记位置上坐的是这样一个人，开明、正派、天真、一心一意办实事，就是在泥沙俱下的乱局中，完全搞不定各方神灵妖魔！

时也乎？命也乎？

随着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益临近，北京掀起新闻战热浪，各国记者云集北京。据透露，戈氏抵京当天，外国记者人数将超过九百名。美国四大电视公司 ABC、NBC、CBS、CNN 派出了七、八十人的强大阵容，并自带地面卫星站，已到了北京。

第四节 会见戈尔巴乔夫

5月16日

这天，终于到了！这场会见，在邓心里占着怎样的位置！

按照外事安排，中国最高领导人第几次会见戈尔巴乔夫：杨（15日，机场）、邓（16日上午，人大大会堂）、李（下午，钓鱼台）、赵（晚，钓鱼台）。

中联部与外交部相当紧张：实际最高领导人不具最高头衔，讲究规格仪礼的外事活动，怎么个处理？

尽管中联部已经照会苏方：与邓小平的见面，是这次重大邦交恢复之最重头，对方还是没有弄明白——最后排序：他在先（中饭），赵在后（晚宴）。外交部很紧张，只好定出“淡化处理，既不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

这些，对邓而言，区区小节啦。但这天的见面，依照其自我评估，是自己对中国和世界做的最大的事之一。正如傅高义所言：这是邓小平一生成就的顶峰之一。为了这次胜利，他准备做一个热情的东道主，欢迎世界各地的记者前来共襄盛事。

戈氏如期抵达。

由于广场状况，这场筹划经年、紧锣密鼓地安排了近一年、必将引动世界关注的大事，连最基本的仪礼都无法举行。不知出于隐忍还是淡定，第二天上午出场，1963年批苏《九评》主持人，看上去兴致很高、谈锋甚健。

邓先到达人大大会堂。现场翻译清楚记得，在人大大会堂东大厅，他说的第一句话：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9:45，苏联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邓听现场人员的报告，兴致很高：

噢，出钓鱼台啦，好！

噢，过西单啦，好！

（李景贤《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

之前，小平同志曾经做过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中方也把这一提醒通过苏联驻华使馆，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两边都明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对照小平访美时候，与卡特的那张照片，这回的“特别交代”，清楚意味着：中苏两党两国，“同志加兄弟”（结盟“抱团”）亲密关系的终结，即将开启的是与中美关系同等的正常外交关系。

10点正，贵宾到达。两人见面握手。握的时间相当长，整整35秒钟。85岁老人的现场表现令翻译震惊。他回忆当时情景：

我把小平同志的谈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连个语气词都不落下。会见后，我立即又逐字逐句地将其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

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人物、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小平同志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同上）

对于当年震撼世界的洋洋《九评》（毛泽东策划、邓小平负责、康生主持撰写），会谈时候，只轻松甩出一句：我们当时都说了很多空话。举重若轻，快刀斩乱麻。除了邓小平，还有谁能这么干脆利落！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会见现场直播。据一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会谈接近结束时，插入了一段与国际关系无关、却直指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路径取向的对话，苏方翻译欧福钦^{【28】}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

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邓小平却回答道：

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路转向另一条路呢？（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43期）

戈专注于政治改革，邓不但限于经济改革而且方向盘必须抓在党手里！这简直可以说是下一个十年中苏两国改革路径的预告。

餐桌上，戈尔巴乔夫对他发出访苏邀请^{【29】}。邓说：

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

【28】 欧福钦，俄国中国问题专家，50年代《真理报》驻华记者。

【29】 这里的“邀请”和“使命完成”，其实有一个不算短的故事，即1985、1987，邓两次托齐奥塞斯库带口讯：如果苏联愿意谈让越南撤出柬埔寨，他可为此访苏。戈访华，意味着此案已了结。

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

最后，在客人既没见到总理也没见到总书记的情况下，他握住对方的手：“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

随即，他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谁见算是“会见”、谁算“会晤”、谁来“会谈”……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完成于谁手，折腾多久了？其实，除了他自己，没人在意呀。已然位居峰顶，难道还要慕虚荣、在乎名头？

可见，在其个性深处，对“功名”、对“立业”的执拗。总的说来，油腻腻的名利场上，邓还算是清高洒脱的：不大见他在小地方、小花活上争抢，而是极有见解、有耐性地等到那关键的一刻。一旦准备停当，绝对当仁不让。

大约下午 14:00，午宴毕。在极度兴奋下，邓小平，完成了久蓄心中的千秋功业。

想来此时，中联部、外交部那些拘泥仪礼文牍小官儿们，在邓大人如此豪迈的表现之后，准是大松了一口气——哇！两国、两党关系恢复，既不必正式会谈，也不用文本推敲、协议签订……敬爱的小平同志三句两句，解决了！

下午，总理李鹏的节目。之后，总书记出场。此时已是晚霞满天。而最终影响到中国命运的历史悲剧，竟然……即刻开场。

这天上午，甚至更早一点的 5 月 15 日，为应对与戈的见面，赵紫阳在忙什么？

第一，他心里非常清楚：

在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

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改革历程》）

在这样的局面下，他如何动作呢？

外交部原来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这局面）既不能回避，也（就）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只须）我在会见戈（的时候）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同上）

注意：外交部的方案：“两党总书记”！而苏联外交部那边的迷惘就更深了：

几天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罗高寿找到我驻苏大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说戈尔巴乔夫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会谈是中苏两党的最高级会晤？据我们所知，邓小平同志在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没有任何职务。现在担任总书记的是赵紫阳同志。

赵的这个认识和决断，绝对有所本，因为邓已然明说：

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外交部原来的方案不同。（同上）

更何況，据陈一谔：

在赵紫阳下午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邓办曾通知赵办：希望赵紫阳说明，上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就标志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因为苏联与中国两国不同，苏联老一代领导人退位后就只能代表自己，现任领导人才能代表组织，而中国则还由老一代在左右局面。^[30]（《陈一谔回忆录》）

【30】这是吴伟都没有提到的一条孤证。本著者也感觉有些唐突。暂且放在这里供读者判断。

这局面，他如何处置呢？

其实这时候，赵想到的，已不仅仅这次外事活动。世界各国（西方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甚至中国从官场到民间社会各阶层，对小平同志在国家重大决策中的位置与角色，或不甚明了，或有疑惑、有误读，以至于怀着巨大的反感。

到了这年5月16日前后，到了必须在全世界传媒面前捅破窗户纸，给出我们自己的立场与方式——他觉得，到时候了，该向全世界、全社会讲明了——

吴伟在《台前幕后》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决策细节：

5月15日那天，赵紫阳又交给鲍彤一项任务，这就是为紫阳修改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讲话稿。这个稿子，最初是由中联部朱良那里组织起草的。紫阳看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不很合适，就让鲍彤为他修改。

按照这一年多来与外国党的领导人会谈时的惯例，也即向他们如实通报十三届一中全会关于邓小平在中国党内地位与作用，鲍彤明白，这次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也必须如此。

5月16日，上午见过邓、下午见过李鹏，到晚上，戈与赵见面。

应该说，5月16日这天的李戈、赵戈会面，遵循外事惯例而已，并不是党国大事的重点。赵本人对此，也没有特别的期待——他被放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外交方面必做如是安排。而且，30年之后我们回头说，对于遭受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包括全民所有计划经济捆绑约束几十年的中苏两党两国，作为开路的领袖，戈和他也都没有充分的准备，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探索，也没有觉得他俩的这次见面，会开创出什么来。

赵紫阳心头之最重，是让全世界理解“小平同志”在中国无可替代的角色、位置与意义：

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

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改革历程》）

他明确强调——

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小平同志。最后的决策人是小平同志。（同上）

这样处置之后——

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

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

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同上）

为让读史人对如此当紧且朦胧的历史大事有一个扎实且形象的了解，这里补充一个历史细节：此“决定”，在十三届一中全会当场，是怎么通过来的。

一般性的公开叙述，大致这样：

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在谈及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表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元老虽然已经退下来，但“他们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今后“重大问题仍然要请小平同志掌舵”。赵紫阳这一讲话作为一项议案，经全场鼓掌通过，邓小平仍然是中共最终决策人。

“经全场鼓掌通过”！具体细节，在场的鲍彤有清楚记忆：

1987年，“十三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是下午开会。

上午，紫阳跟我说，有一件事一直没跟你交代，今天下午要开中央全会，要讲小平同志地位不变的话。这个问题比较严肃，比较郑重，不是随口能说的，要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我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了。他看了，下午开会他就照读：“这次小平同志全退了，但是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变，因为他的政治经验，他的政治智慧，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因此以后我们遇到复杂困难的问题，我们仍然向他请教，他有权召集我们政治局常委会开会。”

接着，紫阳又补了这样一句：

“国外看中国是不是稳定，就看小平同志的地位变不变。”

这句话是谁讲的？是紫阳讲的。谁要紫阳讲的？薄一波让紫阳讲的。薄一波让紫阳讲的时候，边上坐着邓小平。讲完了以后，邓小平下面还补充了一句话：

“我在党内的地位，国外把它看成党的稳定的标志。”

其实，除了“党内地位”，还有更具中国特色的：

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改革历程》）

好啦，历史典故捋完。咱们接着说5月16日：外事，算是顺畅搞掂；国内呢——也该理理顺吧。

吴伟回忆：5月14日晚上，赵紫阳就找到鲍彤，说：

群众当中有些话说得很难听，把小平同志说成是垂帘听政。……学生和群众的说法，是不清楚、不了解实际情况。（《台前幕后》）

他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他认为“只有我们能说清楚这件事，我们要爱护小平同志的形象。”他对鲍彤说，准备这两天开一个首都新闻界和宣传口的会议，把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那个决议的情况通报一下。要鲍给他准备一篇讲话稿。他说：

学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们请求小平同志在重大问题上出来掌舵的。小平同志是一贯支持我们的。在我的记忆当中，不论常委讨论什么事情，还没有哪一件事情小平同志是否定的。只要我们提什么，小平同志都赞成。（同上）

他还说：

要讲清楚，在几个历史关头，小平同志起了多少重要作用。同时也要讲清楚，学生不是要民主吗？不是要反腐败吗？小平就是要民主，就是要反腐败的。要跟学生讲清楚，小平同志是最支持学生、最爱护学生的。（同上）

说这番话，是在5月14日晚上。吴伟记得，5月15一早，老鲍就要他找群林他们几个局级干部“在小范围内组织几个人为紫阳起草这篇对新闻界的讲话稿”。

会上，老鲍向陈群林、何家成、高山、陈小鲁等详细讲了紫阳的意图和他自己的想法，把初稿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他们。领受任务后，这几个人迅即开始了起草工作。到16日下午，群林已经把稿子统了出来。晚上，老鲍亲自改过，准备第二天报给紫阳。

稿子指出，邓小平一贯支持常委的工作。“4·26社论”措辞不妥的责任，应该由常委会承担，首先是我（指赵紫阳本人）的责任，“因为我是总书记，而不能加到小平同志身上。”

稿子强调……“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我认为应当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小平同志所支持的希望和意图尽快实现，而不应当有意无意把小平同志推到第一线（这里指4/25讲话A、B版——著者）。这是党的利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起码道德准则。”

稿子最后说：

我例举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想再一次强调，今後，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信赖和尊重小平同志，把他的支持看成全党、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对常委会的支持。一切误解小平同

志的议论要澄清，一切无中生有的传闻要制止，而一切工作中的这样那样的问题，责任由我们来负，问题由我们来解决。（同上。此讲话稿全文，见此书附录。）

这篇《赵对新闻界讲话》初步完稿，是在5月16日晚间——那时赵正在宴请戈。鲍彤觉得事关重大：

写完以后，我没有马上送紫阳，而是和陈小鲁说：你帮我给邓毛毛打个电话。或者我去，或者她来，我有篇东西要请她看一看。

我是想把这篇东西先征求邓家的意见，看这样讲是不是合适，然后再送紫阳。

陈小鲁跟邓毛毛从小就熟，他们俩的家，文革前在中南海一个住在三院，一个住在四院。后来，陈小鲁跟我说：我给毛毛打电话，毛毛说这两天忙得很，就不看了。我只得作罢。（同上）

望读史人注意，此时，邓榕的口气是平和的：“这两天忙的很”——她，或者老爷子所忙，其重要与紧迫，已超过此《说明》？

这时，已是5月16日晚间……令所有人都未料到的是，这个说明发布出去之后，在邓家、在社会上，反响都异常地强烈！

其实，那天上午，举世瞩目的邓戈会同时，正发着高烧的阎明复向赵紫阳汇报了两天来与学生代表的对话情况：

通过与学生的对话，我深深地感到现在学生的情绪特别容易波动，很多学生的心理素质脆弱，高自联、对话团、绝食团这些学生自治组织的意见统一不起来，这些学生组织没有一个能够把已经参加绝食的学生劝说回来，一些学者、教授去广场劝说也没有效果。在广场绝食的学生被推到前台去了，想退也下不来，这些绝食学生现在真的是被放在火上烤呵。（《中国“六四”真相》）

所以，他建议，为尽快平息事态、停止绝食，中央必须尽快拿出措施，最好是由赵紫阳和李鹏出面见一下学生。赵紫阳答应，晚上常委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六四”真相》）

宴请结束。广场局面依旧。

赵紫阳立即赴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常委紧急会议（五常委+杨尚昆、薄一波）。这时，已是晚上22:00。

局面如何疏解，双方依旧纠结在“小平同志发话的《4·26社论》”。

会上，没有一个人提出总书记在见戈的当场，说到关于小平同志在党内地位，即“十三届一中全会特别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没有人认为，此说此做有任何不妥。他们最关注的，还是广场绝食。

紫阳回忆：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31]。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

【31】 关于这篇讲话，还有这样一个插曲：《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们，很为局势着急，七嘴八舌会上——

有一位同志建议，用记者访问赵紫阳的方式，给赵一个表态的机会。大家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座谈会后，编委留下继续商量，做出两条决定：一是设法与赵紫阳取得联系，二是派记者访问一些在学生中有影响的名人，请他们发表谈话，既肯定学生运动，又不超出阐明复讲的界限，同时又对学生、对党、对政府提出要求。

说巧也巧，下班以后，6:00多钟，杨尚昆同志的儿子杨绍明送他拍的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照片来报社。老钱与他谈我们的想法，请他说服杨尚昆同志出来推动促成赵紫阳发表谈话——既尽量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又不伤害小平同志。他回去一说，尚昆同志果然同意，要求我们赶快拟一个讲话稿交晚上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8:00多钟，我们把拟好的稿子送给启立同志。这个稿对学生运动基本上是重申赵紫阳“五四”讲话精神，但有两点新意。一是强调是中央常委一致意见（针对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向基层散布“五四”讲话不代表中央）；二是秋后不算账。讲话共500多字，题目是《赵紫阳总书记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八九民运史》）

这基本就是5月17日凌晨《五常委广场讲话》的蓝本。从杨氏父子此刻的动作，也可看出他们当时的基本态度。

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

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其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社论”是按4月2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委集体承担。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改革历程》）

据李鹏当天的日记，为和缓，赵已经提出：“文吓”的失措与失效，完全由他来担责。然而这样的态度与措置，都行不通。李鹏写道：

常委会开得十分激烈。大家一致要求赵出面代表中央向学生发表讲话，阐明中央的态度。但对这篇讲话内容，则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张只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党和政府保证不对学生‘秋后算账’。赵紫阳则坚持要肯定学生的‘爱国行动’。……尚昆同志

说，若肯定学生是‘爱国行动’，那就与小平同志讲的，这是一场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动乱相违背了。

.....

赵在临散会时，又提一个问题，要大家思考。赵说，出路在于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完全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保护邓小平。我当即发言，社论准确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决策，事态的发展也完全符合他的预料，想歪曲是办不到的。

我说，我们都是诚实的共产党人，不应该玩弄这种拙劣的资产阶级政客政治手腕，这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讲完后，赵也就不再提“保邓否认”的事了。（《李鹏“六四”日记》）

这天的会，直开到凌晨2点。艰难地、几经拉锯地定下——赵紫阳须立即向邓“全面汇报，听取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意见”；以及“赵代表常委，对广场学生发表《停止绝食书面谈话》”。

这篇“谈话”极不寻常地——郑重列出五名常委的名字，有爱惜与期待，“4·26社论”里边意图阻吓之明枪暗箭，已不见踪影——这是赵做了多么艰苦的努力才争取到的！

广场上亢奋的抗议者毫无反应。芦笛把他们称作“过河卒子”：只能往前冲而不可后退。他说，这是“一个民族在松绑过程中自然发作的痉挛”。

此时已是5月17日清晨。

5月17日

上午，依照前一天常委会的决定，赵紫阳联络见邓——

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改革历程》）

“个别面谈”遭拒绝。事情“不好”了。有多么“不好”？

“向小平同志说明这次学潮真相”——最后的机会了。他或许希望谈得更深一点，比如李昌、李锐、许家屯、万里他们的意见，还有知识界、民主党派的看法；比如每每事态和缓、复课在即，怎么总有激烈举措再度激怒学生；比如李先念的内心纠结和伺机掣肘；比如陈云同志，是不是嫉恨他只听小平的而无心对他毕恭毕敬……想来，他有话要说，而且只能对小平一人说；想来，他怀有或许能说服小平的把握……十三大以来的政治经济局面，不都因为邓小平最后把舵？这，他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九年以来（赵1980年4月调入北京），稳扎稳打、而且特别顾及“意识形态脸面”地，他只谈经济体制改革——邓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地、没有保留地、最有力量地支持”（鲍彤《改革历程·导言》）；对于政治改革，邓有自己的意见和底线，对此，他不仅清楚^[32]，也不曾掉以轻心。这样的局面，太难得了。失去，太可惜了。

但他的求见遭到拒绝。似乎是，通过自己的特别渠道^[33]，邓小平已经被“下了小话”，已经没有了单独见他的必要。

下了什么小话？

5月16日晚间，彭真曾来电话。丁关根后来对李鹏说，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李鹏“六四”日记》）

除了“小话”呢？

另一边，据吴伟回忆：

【32】“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之前，我曾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决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

【33】据姚监复对陈希同的访谈，（4月25/26日决绝发话）“是邓小平对于当时形势的独立判断，而不是北京市的情况报告，导致了对于群众示威的‘动乱’定性”。陈希同还说，“邓有他自己的信息渠道。”这渠道无疑包括他的近侍、牌友，特别——他的家人。

上午一上班，赵紫阳就接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的电话。邓楠在电话中大骂，说赵紫阳你不讲良心！我们家老头子对你的工作从来都是很支持的，你怎么能这样做！说完就撂了电话。（《台前幕后》）

这则“大骂”，在赵自己的回忆里边没有。此外，这天上午赵致电邓宅说希望见面，是在此“大骂”之前还是之后？吴伟的描述是“紫阳当时对外面的反应还并不十分了解，对邓楠这个电话，并没有看得很严重”。

到中午时分，广场的情势几近沸腾。

《五一七声明》出台——“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起草者：曾任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曾在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的严家其^[34]。很快地，该《声明》送到了广场，在各界游行队伍出现。游行队伍直接打出“邓小平下台”标语。（大约在10:00）

吴伟记得：

小鲁和阎军把外面传说的情况向老鲍作了汇报。老鲍很着急，想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12点左右，他要阎军和小鲁给邓榕打个电话，说老鲍想和她谈几句话。阎军原是《法制日报》的记者，和邓榕很熟悉。

打通以后，邓榕正在家里。阎军俱道原委。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阎军和小鲁向老鲍汇报

[34] 1986-87年，严曾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一年。对于胡耀邦蒙冤、赵代理总书记时候推进经济、政治两项改革之艰难、十三届一中全会如何“一致认为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应该有不同于常人的认识。为什么在改革派最艰难的时刻重戳伤痛，如今尚未见到他自己的解说。

了这个情况。老鲍面色平静地说：“既然是这样，那就算了，谢谢你们。”（同上）

比这早一些，在5月16日晚间，或许赵还没有从宴会上回到勤政殿，有朋友听彭真家人说，5月16日晚上，邓小平在看了赵紫阳接见戈尔巴乔夫的电视新闻后，十分恼火，他一边打牌，一边气呼呼地说“随他去，不管他了”。

此情景或许彭真所亲见——那时他亲自到了邓家？

现在知道的是，彭真说了一句重话——“这样下去，咱们事业就完了”。

邓朴方说，5月16日下午以后，看到电视直播中赵对戈的关于“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的一番讲话。老爷子怒斥“叛徒”，狠狠地拍了桌子^{【35】}。

晚间电视新闻？

有没有这个可能——邓看电视新闻，原本期待看到自己见戈的场面。他不知道的是，他见戈，电视直播是在中午（或下午）。晚间新闻第一条，已是成了下午李赵与戈的会面。

显然，邓小平此刻心境，已经不是中午宴请戈氏之后。他生气了——气到家中这人那人都有了察觉；气到超乎陈李他们的预期……

从5月16日晚到5月17日早晨，这十多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小平同志生了气、并接着做出新的决断？

这里，我们引一则毛泽东的逸事，看看地位相类的红色领袖，怎么发起形态相类的帝王脾气。1950年代末吧，空政舞蹈演员陈惠敏（陈露文）她们小姑娘，在给派到中南海陪舞陪睡之后——

……我们也不懂政治，跟着发牢骚。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席，说毛像皇帝，三宫六苑，我们算什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什么都没有——这话

【35】与邓朴方接近的人告诉著者（2018）。但5月16日那天，邓朴方还在武汉出席残联活动。此情，或许是他对别人所见的转述。

被文工团的头头刘素媛听到，刘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反对毛主席。（金钟《毛泽东情人自白录》）

文工团员没有造谣；赵紫阳也没有背叛。“造谣”！“叛徒”！不爽了，随性随嘴就来？

但气恼，乃至愤怒，是有累积、有层次的。如果把这几天的情形综合一下，或许可理出如下缘由：

第一，这气，不是突然冒出，而是压抑多时的爆发：如此重大的国事活动，从5月11日、5月13日刚一回京就亲口对杨、赵说，也得到他们的保证，最后怎么样？客人天安门广场都进不了，会见时候，流氓冲人民大会堂东门北门，还砸玻璃。

第二，如此重大历史时刻，全世界主要传媒到场，外国记者的注意力都给吸引到哪里去了？我们自己的呢？晚间新闻联播头条……

第三，街上出现的标语，有心的毛左卫道们，一定已经挑拣着^[36]报给了他：

邓大？党大？

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下台就是好猫

听小平的？听人民的？小平下台，人民做主；

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

小平，我们的孩子在挨饿，你们的孩子在干什么？

……

军队也出来了：

[36] 游行口号并非条条直指邓小平。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一份“五一七全市游行口号”，共列18条：

(1) 声援学生绝食斗争；(2) 坚持改革，反对倒退；(3) 学潮不是动乱；(4) 推倒“4·26社论”；(5) 政府必须公开承认“4·26社论”错误；(6) 我们要民主，不要独裁；(7) 我们要法制，不要人治；(8)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9) 维护宪法，维护人权；(10) 捍卫新闻自由；(11)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12) 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13) 欢迎子弟兵和人民站在一起；(14) 大学生万岁；(15) 人民万岁；(16) 打倒官倒，反对腐败；(17) 提高警惕，保持秩序，防止坏人趁机捣乱；(18) 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我们不是邓家军，也不是杨家将，更不是镇压人民的宪兵——几十名年轻军官。

决不当独裁者的禁卫军；打倒中国的秦始皇；把军队还给人民——部分军官。

邓小平滚下台；

……

第四，昨天开到半夜的紧急常委会，一定已经报给他。赵回国，两周了，局面越弄越坏。今天早晨的《五常委紧急信》，按你的办法，已经退让到底了吧？怎么样，理都不理你。还敢把事情交给你做？

十三大以来，包括你的“五一三”讲话、包括价格闯关、包括……那边攻你，攻得多厉害，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里一直替你兜着，而你竟然把事情做成这样……《五一七宣言》（“……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执笔，鲍彤属下吧？

第五，至于“小平最后决策”，挑这样的场合公布，你没看见掀起什么？你要保邓，导致的，倒！

为这生气，有道理么？

也许是，非显得“生赵紫阳之气”不可了——意味着退一步。赵，不能再一味回护了。

赵见戈，说了错话？是大意了，抑或有意？

本著者认为，5月16日见面，赵对戈说的那段“党内决定”——无论从规矩、程序、用心，以及当场的表现和后来的真正的（而非对手挑拨成功的）效果——可以说，一丁点错误都没有。不但没有错，自4月30日他回到北京开始接手处置，此期间彰显出的，反而是（以他之位置）最优秀的品格：

- 明知邓的“做两届、军委主席”等设想，他绝不以窥探、顺从、邀好……等等数千年皇权专制留下的“为臣模式”，来保自己位置；

- 他内心涌动着的，是一个正直的务实派政治家天生具有、积年养成的家国情怀。
- 这里边不排除他和他的团队历时一年多来，悉心探究中国社会，而一点一滴地获得的社会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得。
- 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他没有丝毫的在军中扩展势力的动作，念头都没有。
- 他用人，只为工作，从不拉关系，也从不以应允前程安置亲信。
- 他当然知道何谓邓内心的“稳定”——共产党（邓自己）大权不可旁落；赵坚持他认识到的“稳定”——逐步转变经济政治体制，为家国和百姓造福……

无奈摄像机前这么一说，竟然酿成中国政局大翻盘——“改革已死”。

中国，自1992年之后，疾步走上“权贵资本主义”！

但，这一切，怎么回事呀——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冷静地、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当时场景。我们可以说，就在这天，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兀地（在不过数小时时间）呈现：

这个已经实施了一年半的党内“决定”，在外事场合公示之后，被“邓胡赵改革”两端的敌手，同时当作到手利器，快意砍将过来：

毛左卫道们高叫：“泄露机密”、“将责任加于小平同志”——对他们而言，打赵就是打邓，通过打他的一线实施，打他的经济包括政治（行政）改革！

挑拨，在此节点上，成功！

“形右”激进革命们高喊——打倒“极权”、“独裁”、“垂帘听政”。这是大道理，是建立民国之后，已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冲折百年现代化理想。在1989年，在刚刚开始走出“秦始皇+马克思”不过十年的初初初阶段，打邓（包括打他的垂帘、打他的独断）就是打他的一线先锋，没有小平的支持，赵紫阳无法工作。

眼下，冒出这么一个“紫阳抛出小平”的局面，再加上已经整整延续了一个月的“广场成垃圾场”，“年轻的生命”……毛左卫道们看到新阶段（1988年的物价闯关之后借“学潮”离间邓赵）的胜利，摩拳擦掌准备再攻坚；形右实左的小政客们，感到革命高潮的临近，激发起在更大范围和阶层、再度发动群众的激情；赵紫阳等一整批体制内开明派（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失去了党内运作的资格。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将看到，他们或者寻求新的权力领域，比如人大；或者分裂出去，加入了激进派。

至于民间渐进理性的一批，只痛感自己的软弱无力。

至此，是不是可以说，小平同志终于承认“文吓”失败（虽然依旧不明说也不说明），决心上“武吓”了。赵紫阳，你就不要再管了。他将亲自下场布局。

时至5月17日中午，赵紫阳得到通知，下午到邓宅……

第五节 小平出手——武吓登堂

5月17日（续前节）

这天下午 4:00，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邓宅召开。五常委加二列席：杨尚昆、薄一波。王瑞林担任记录。没有通知鲍彤参加。

第一议题是广场局面。《李鹏“六四”日记》：

赵讲，目前惟一办法是否定4月26日社论，与学生妥协，缓和下来。

我讲，26日社论是正确的，本来形势已逐步好转，但紫阳同志5月4日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惟一办法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乔石认为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

依林说，这场动乱是赵的错误造成，他完全赞成李的意见。

胡对局势感到忧虑。他说，我们想的与广大群众想的差得太远。

杨尚昆认为不能从《社论》中后退，现在目标是邓，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诸常委焦虑地一一议论之后，邓给出结论：

转折点是赵紫阳5月4日的那篇讲话……学生就闹得更激烈了……（《李鹏“六四”日记》）

接着，他对“学潮”下了远超过“4·26社论”的判词：

这次事情不一样……一些同志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止那

些学生，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六四”真相》）

上纲上线先放一边，邓这里说的，“亚行讲话”，相当突兀。查会议记录，先是李鹏提出，姚依林随后跟进。而在前一天（5月16日）晚上，在常委专门研究广场局势的时候，谁都无一字涉及。

而就事实而言，这也是不确的——“五四”及亚行讲话^[37]，起到的是平息学潮的作用：5月4日，“高自联”宣布复课。5月5日，除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大学及学院都已经复课，局面明显趋于缓解。再“闹起来”，是5月13日的绝食。

但是，李、姚上来就这么说，而邓也不顾事实接过他们的话头往赵头上栽……我们已经知道，这天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让赵下台”（丁关根对李鹏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如1988年的价格闯关那样，商量之后拿着剧本按提示出场？

但邓接了。他不再听赵的解释。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这边退一步，先熄火好不好？局面稳定下来再说。

李鹏发言，再次点鲍彤的名，说赵的亚行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对5月4日上午北京医院探病中途的“车内口授”，他已经知道了？联想到16日晚超乎寻常地不许鲍依惯例列席赵召集的常委会^[38]；联想到邓在讲话的最后、发出“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之后“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十天之后，鲍彤即以诬指的“泄密”遭捕。

[37] 赵的亚行讲话，在资料严格甄选的《邓小平年谱》中，作为八九“六四”风波中最重大事件，特别给出注释。可见他，以及中共官方，对“内外有别”超乎寻常的重视，包括拎出来作为棒子打击对手——而这一党内规则的反面，恰是社会转型绝不可少的公开性与透明度。

[38] 4月24日（赵出访时），李鹏召集的会议，也不许鲍彤列席。著者倾向于此时，鲍在李心目中不过“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已，尚未锁定必须加诸罪名于他。

此刻，是不是在他们之间，“4·26”所指的“后台、黑手”终于锁定？

赵会见戈，“把小平同志推出来……”，由姚依林在这次会上率先提出。

他的解说：“无异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是十三届一中全会的一致认定。此后不仅是中共全党的共识，之后，也数次在兄弟党和来访国家首脑间公示。这次会见之前，赵还专门请示过邓^{【39】}，四月中以来，在会见工人和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的时候，都曾专门讲过。为什么到了17日的会上，一句不仅全党皆知、而且正在践行着的事实，竟变得如此大恶不赦，变成了“赤裸裸把矛头对准敬爱的小平同志的反革命宣言”？

对愈演愈烈的局势，邓给出结论：当局不能再退。他“郑重地向常委会提出”：

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同上）

邓小平，毛之爱徒啊——在重大内部政争一步步逼近权争的关节点，一定调兵：比如庐山会议；比如文革初起；比如71年9月12日察觉林立果异动。

说是向常委“提出”，在场的没有人认为这不是最后拍板。总书记当场表示“对此难于执行”，只能“服从党的组织纪律”。

赵的这句话，据《李鹏“六四”日记》，是指在邓小平说“政治局常委会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做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常委一致，政治局一致才是根本的保证。大家统一行动，说话一个口径，错了大家共同负责，这是关键所在”之后，表态组织服从。

【39】 赵的请示是在5月13日。据《陈一谔回忆录》：会见前，即5月15日，邓办再通知赵，见面时候须会知对方，“与邓的见面已经是最高领导人之间”。待证实。

因赵不同意戒严，甚至要求辞职，邓小平“指定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改革历程》）

可以看出，到了此时——即所谓栽赃之上的苛责之后——邓对赵，还没有完全放弃、打算在他忍辱低头之后，继续用他推进自己的改革。

到最后，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

“上次”？说的是4月25日么？那回，李鹏一千人前往邓宅“向小平同志汇报”。邓听过之后同他们讲的，应该算是内部交底吧，而李鹏的做法是：当天夜里就向各级干部传达，并立刻改写成社论发表。

把老爷子这杆大旗拉出来做虎皮；借小平之威让总书记难堪？不是第一回，也不会是最后一招吧？赵紫阳记得，李鹏闻言后连连说：不会！不会！（《改革历程》）

可事实上，兴奋之情难于压抑——李鹏嘴上说着“不会”，一转身，就在他主持的工作会上，透露“会请解放军出来”^[40]。（《中国“六四”真相》）

实施戒严，至此，算是有了邓的明确“提议”。如何具体部署？

晚上，常委们到中南海勤政殿继续开会——意见依旧难于统一。到了最后，对戒严与否，就算邓已经发话，五人意见依旧一致不起来：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

至此，毛当权之后屡试不爽的红色君臣模式，已无法重演。

总书记请求辞职——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职权行使，事实上已经画上了句号。党与国家命运的决策，即使在形式上，也无可掩饰地转到邓小平（外加元老）手中。原以为可以比照恩师，“转个小指头”，下属即乖乖叩首领旨，这回，年届84的“老爷子”，不得不亲自走上一线。

[40] 参会人：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陈希同、罗干、袁木、何东昌等。

他是否知道，为了改革能在老人政治中向前推进，赵一直“靠小平同志的威望”、左推右挡勉力前行。此刻，能否对平民动用武力，已经触到了这名因为国家民族（而非利益分配）而“参加革命”的理想家的底线。有些理念，比如内心深处对自由与正义的坚守，是不能拿来交易或者敷衍的。也就是说，赵不能做到像“柔中寓刚”的邓同志在林彪坠机后，给毛写输忠信那样^{【41】}：口头绝对服软，至于以后，那就再说了。

他等着赵的告饶。没等到。

一手亲选的人，“局中局”，看不懂么？居然不紧跟……对邓说来，是不是有些意外？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还没等他们晚上开会，老爷子已经自己动作起来。

常委们议论未定，老爷子已经自己动作起来。当天晚上，他从家里亲自致电“三大佬”——陈云、李先念、彭真；秘书们也立即通知军委委员们外加王震、邓颖超：次日上午召集中顾委和军委委员开会，通报政治局常委的戒严部署——此刻，“政治局常委”可还僵持着，未能随着他的命令做出部署呐。邓自己部署自己通报，亲自上阵了。^{【42】}（《中国“六四”真相》）

5月18日

这天上午，李鹏等在人大大会堂见王丹、吾尔开希（该同学放言广场不绝食同学99.9%须服从绝食0.1%）等学生代表。记得著者当时从电视看现场实播，一则以气、一则以悲：这本是一个多月来，一波波抗议与当局“文吓”两造切盼的啊。怎么双方全是一副义薄云天的派头，没有

【41】 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在听中央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中央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

【42】 在张良的记载里，八老和军委三常委之外，还有李鹏和乔石、姚依林、胡启立四人的发言。5月18日上午的这个会，仅见张良的记载。《李鹏“六四”日记》里边没有。他上午11点与学生代表对话直播，似乎没有时间参加此会。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改革的台前幕后》没有记载。《陈一谔回忆录》里，间接谈到高山与何维凌（朴方）对他说的“决定戒严”。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等待正式史料解密。

丝毫以国家、以结束事态为重的商议态度。可见“人民共和”建政历40年，无论“为人民服务”的党，还是“当家作主”的百姓（或者再加上“公知”），就现代社会民主协商的素质而言，还差着几百年修为呢。但今天回看这场景，就有了另一番意义：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要协商！有了昨天小平同志“提议”（武吓）垫底，李鹏不如此反倒不正常。而毛式革命熏陶出来的小将，还以为自己得逞了吧？

邓呢？有没有动作——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

毛泽东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将规章玩弄于股掌。从他终于立足且开始攀升的1938年，直玩到弥留。党内外种种组织、机构、名号、小会大会、书记处工作会、政治局扩大或者不扩大的会议……不过人家“秦（始皇）加马（克思）”专权的行头：或撮或撇，完全根据情势需要。

这回，到了邓时代。

多少大事，外交、内政、新领域开拓、旧制度革新……等着他推进实施啊。稳定！稳定！年初就说。然而，由他选定的常委班子，在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允许他按照自己设想实施，面对几个娃娃，却窝囊到如此地步。

但绝不妥协的，是经典意义上的学生娃们吗？街面上显现出来的“不稳定”，仅因紫阳、启立他们的软弱、窝囊？

他不得不再度出手。而常委会，竟然依旧拒绝紧跟他的“戒严”决定，太意外了。但决心已定，话也放出去了，邓小平决定效法恩师，一招不成换一招：常委会决议做不成是么？召集政治局扩大会加顾问委员会，换个方式通过。

这天上午，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那所四合院——邓时代真正的权力支点——召开25年来很少有人提到的决定实施戒严“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台大佬——中国真正的权力核心——走上前台。

出席者：“八老”、军委委员、常委，不包括赵。

如果说 17 号那次“常委决定戒严”尚属“提议”，晚上开常委会，“表决”（其实是独立表态）——未能达到多数。这回则是“八老”亲自部署了。

依照中共党内历来“宁左勿右”的传统，夹杂着对“事态终于酿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们终于赶尽杀绝”的期待，无视事实的凶狠套话，从参会大佬口中无顾忌抛出：“党内两个司令部”、“否定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战争成千上万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垮台”……。

表态完毕、依小平建议，“部署”做出：戒严命令将于 5 月 19 日内布宣布、21 日凌晨实施。杨尚昆负责具体规划。

最后，邓小平签署命令：三大军区及武装警察约十八万人于 5 月 19、20 日，进驻北京地区有关目的地。^{【43】}

虽然他很清楚、自己也亲口说过：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44】}，说是“戒严第二天宣布，21 日实施”——事实上，没等他们决策，三名军委委员（刘华清、洪学智、秦基伟）也还没有表态，政治局仍然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杨尚昆（包括下午参加“戒严工作会议”的李鹏、乔石），在总政、总参都没有介入的情况下，已经动作起来。^{【45】}

杨尚昆上午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拟定出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的进军命令。邓签署后，常务主席指示总参谋长迟浩田立即与三大军区司令员最后确定“每一个集团军的有关师团进京名单、进军具体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间、戒严主要事项等实施细则”。

【43】 据目前可看到的文件，哪次签署、调多少人……混乱且不一致。或可取杨尚昆最后的布局。

【44】 见陈小鲁：邓 1979 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上的讲话。

【45】 《李鹏“六四”日记》：杨尚昆同志在上午还举行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常委关于戒严的决定。下午 3 时，在中南海召开戒严工作会议，我和乔石，尚昆同志参加。尚昆向我们通报了调动兵力情况。为了协调整个戒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戒严指挥部，由北京市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正、副指挥。总参总政未粘手，见著者对前军报记者江林、前总参某局参谋 YS 的采访。

这里特别提醒读史人注意的是，此日下午的“布军命令”里，真正动用的，仅三万正规军：北京军区三万人、沈阳军区的两万只是“命令预下”。

这，应该是邓小平对由解放军戒严之局势的预估吧？或者说，他是不是觉得，不会流血、也不必杀人，三万正规铁甲开上长安街，什么人敢不老老实实的？

“武吓”开场。

命令发布。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

接到军委命令（是否应该由总参作战部下达？），北京军区于当天在驻首都的军区大院，以“作战会议”的规格，传达军委命令。

“一个野战军、一个野战军地来”，每个战斗单位“多少人，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北京，指挥所设在什么地方，带什么武器，带什么装备”——任务部署明确具体。

面对执行传达命令的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38军军长徐勤先说：“你们亲自给军里边传达去，我不管。”周说，你是军长，你怎么能不管？徐说：“军队是党领导的，没有我还有别人呢。”

多年后，徐勤先追述：

局面僵持着。他说，你还是传达吧。我沉默了一会，我说你给我个文字命令。但是他也把我堵了，他说打仗的时候先口头的，完了以后再给你补文字命令。这个他说的也对，军队有一个口述战斗命令（的军规），而且口述战斗命令在前，就是我布置任务口述的，任务部署完了，这时候根本没有文字的，文字的是后下的，可能仗打完了打差不多了，才下去。所以，他这个说的也对。我朝他要文字命令也对，他驳的我也对。僵持了好长时间。

最后，我还是到作战室用保密机子把命令传回去了（按：从北京传到保定38总部）。传达完了命令我表了态，我说我不同意。我都跟他们讲了：我不同意，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

“抗命”之后，徐勤先被送到军区 85 楼招待所。在那里：

我想，我在这儿呆着还干什么呢？我就给刘志华同志打了个电话。我说政委，命令我传达完了，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我回总院住院去。刘政委还说，好吧，你安心养病吧。我就走了。

这就是徐勤先的“抗命”。

他不知道如此行事的后果么？当然不是。因为，在与周司令员的僵持中，他已经说“你上级命令我当军长，你可以撤我嘛！”但他同时又是一名中共党员，清楚记得 1980 年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其中有一条，无条件执行的条件——除非是会立即引起的严重后果的情况，必须无条件的执行。这就是说，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你都应该是下级服从上级。但是什么东西可以例外呢？就是立即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对于这次的军令部署，徐勤先认为：

这个事和打仗不一样，这是个政治性的事件，政治性的事件不能这么办。

他如此认识，并非空穴来风。从学潮一开始，38 军就在北京执勤，5 月 16 日之后碰巧他又因突发性肾结石在北京住院。对北京市内的情况，他是了解的：

矛盾很激烈。这样的话，非发生冲突不可。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明显当时的状况不适合用激烈的办法解决，还是用谈判对话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政治问题。

若依照军令武装强行推进：

这样的话，非出事不可，就是军队和群众发生冲突。发生冲突无非就是流血。因为他已经明确带枪带子弹。带枪带子弹肯定要出问题。

带枪带子弹就是为了要镇压，因为邓在这之前有好多讲话，“我们有300万军队”；“不要怕流血”；“不要怕名声不好”——他的狠招儿已经出去了。

在命令传达的当场，徐勤先就明确讲出他的意见：

我说最好收回成命，好好研究研究，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国务院，好好研究研究，这问题不能这么解决。（以上，徐勤先与友人谈话录音，2010）

当晚，此情报告到中央军委。杨尚昆命令周衣冰立即到保定38军驻地，以保障该军党委成员坚决执行军委命令。

邓小平当然随后即得知。他只原则上说了“军纪严，军心齐”，让杨尚昆去处置。自知理亏？还是年届八十四，没有精力发飙了？想来都不是。无论多少恐慌与忌恨，邓全都能表面淡定地藏肚子里。

军长“抗命”，是邓小平自学潮以来，遭受到的第三个“当头棒”。

第一个，4月26日之后的“四二七”大游行；第二个，他明确发令之后的常委会表态：多数拒绝紧跟；这是第三个：王牌军军长抗命。

三个当头棒：民心、党心、军心啊！

他或许已经从中感到某些异样、某些大不同？大不同——与毛泽东时代相比。

他，还有杨尚昆，还敢于相信，北京军区、还有别的军区、军兵种，那么好调？

或许可以说，作为毛之爱徒而非忠仆，邓小平开启了他不同于毛之镇反、三五反、大跃进、文化革命的“邓时代”。邓时代，仅是一个开端：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之终结的开端？

这天，赵再次致信邓，向他反应不少人的意见——其中包括李一氓，这可是邓长征时候谈天说地、半夜高歌，“徒步吹牛皮”朋友。（《邓小平与长征》，载于《广西日报》）

邓依旧没有理会——他等的，不是这个。

5月19日

19日凌晨，赵紫阳终于冲破“一再阻止”，依照中办安排，由温家宝陪同，到广场和绝食七天的学生们见了最后一面。

在避雨的公共汽车里，总书记含泪，用手提扩音器作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

如何理解“晚”？5月17日五常委《书面讲话》太晚了吗？如果这篇几乎满足了抗议者全部要求的五常委签名文件，发布在4月27、5月4、5月14……会有作用么？赵对“形右实左”们如此容谅——出于心胸与本性，还是普适下的“政治正确”？

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

……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

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赵紫阳事后回忆：

我当时讲这些话，无非是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还年轻，要爱惜生命。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老的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的。（《改革历程》）

他是不是想说，从5月13日你们决策绝食时候就该明白，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统治者，

所以觉得年轻学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当时年轻学生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一篇讲话，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同上）

他还想说，党内老人们，包括邓，没人会在乎你们。他当然也没有提“形右实左”的广场领袖——他们在意追随者的生命么？

然而苦口婆心、良言相劝，并没有多少人听得进去，更遑论别有用心、听见也当没听见者。赌上政治生命、劝学生回家的最后一次努力被解读为政治告别演说！

赵大约没有研究过大规模广场运动的操作手段（希特勒深谙此道），几个煽情的口号远胜有理有据的说理。大众永难忘怀的只有那花白的头发、苍老面容上的泪水、和颤抖的河南腔：“我已经老了，你们还年轻！”这可不是胡之后又一个在政治斗争被老人政治杀下马来来的改革牺牲者吗？！

从广场回去，赵紫阳给政治局和常委写了病假条：

我头痛加剧，急需治疗和卧床休息。

在此期间，常委和政治局工作，建议李鹏同志主持。（《李鹏“六四”日记》）

总书记自我放逐。小平同志新任命的一线班子呢？如果说前三天，就“戒严”而言，是提出与决策，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实施。

19日下午，赵紫阳接到“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以及不知何人起草的、与他的意见完全相左的党最高领导人讲话稿。他拒绝出席。他后来回忆：

邓在他家里召集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开了一个会。当然没有通知我参加，也没有通知胡启立，他也没能参加。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还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改革历程》）

据李鹏日记，这个会是上午10点在邓宅“开会”的，会议连一个正式的名目都没有，因为甚至无法纳入中共聊胜于无的正式体制。参会者：三名实权元老（陈、李、杨）、三名政治局常委、三名军委常委，外加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

这，可算是邓大人当时执掌政权的支柱了——我们在这里权称“十三太保”。

据李鹏“当时的记录”，邓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

1. 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

他为什么这么讲？生了赵的大气，走极端、说绝话？还是坚持自己一开头即出手“文吓”，原则上是对的？按《真相》所载，“两个司令部”的说法，最早语出李先念；李鹏在5月17日会上的提法，是“中央两个声音”。

2. 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本来“4·26社论”发表后，情况已好转，学生已决定复课。赵紫阳

5月4日讲话是一个转折点，学生闹得更凶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邓这段讲话，与17日下午那次比，更加不顾事实地咄上加咄。难道他身边围着一群专事指鹿为马的当代赵高？“4·26社论”后复课了？那数十万学生的“四二七”抗议大游行怎么回事？

3. 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这段是武吓核心。但鲍彤的名字那么顺畅地从他嘴里蹦出，怎么回事？是否为抬捧“4·26”，必坐实“黑手”说；而“黑手”之身份与作用……赵能逃得开干系？

在这里，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言之凿凿，根据什么？但邓立纳其言：

对头，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于是有了对学生领袖的通缉；于是有了鲍彤、高山、吴稼祥……乃至包遵信、陈子明、刘晓波等的逮捕、审讯、定刑，事后看来，几乎无一条站得住。可知他在这天之前，得到的都是些什么情报啊——只为激怒他？但他为什么那么容易给激怒呢？或者无所谓激怒，觉得你不顺遂了，安个“阶级敌人”或者“自由派”，随手。

毋庸讳言，对“大权不可旁落”的执着，对赵的“政治改革”（绝对权力须加限制），他从心底腻烦。此时，已与王震“抄家伙”没什么两样。

4. 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参加的人范围小一点，人少一点好。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鹏、乔石、宋平负责，参加会议的名单也由他们提出。

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妥。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图穷匕首见——终于提到换马。

5. 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46]

6. 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以上，《李鹏“六四”日记》）

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虽然邓记“钢铁公司”铮铮之貌毕现，但这样一口气讲出六点，并且把“李鹏继续当总理，江泽民当总书记”轻俏地夹中间，似乎不可信。文革后复出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李先念、王震、

^[46]《李鹏“六四”日记》这里，像是补记的得有点乱了，因为这是两天之后5月21日“八老定盘”里边最重头的内容。

邓力群)，对于邓小平一下子当了头目，拢起自己人马，胡赵万，外加鲍彤“小舰队”，号令全局，一肚子的不甘。成功闹掉胡耀邦之后，对赵紫阳——套句红楼梦的话——那斗鸡眼从来没闭过。

总书记换马——这天就提到了？那可是艰难布局之后重头大戏！

四月中，学潮起，形右实左与一线开明派对着干，决不妥协——对这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卫道们怎不心中暗喜。学生上街，共产党什么时候怕过？最怕的，反倒是还没闹到他们换马目标尚未达成就住手吧。40天来，台上台下不停捣鼓，终于把“大乱子赵酿成”作实——只差逼邓小平出演最后一场：组织解决（即赵紫阳胡后立出常）！接着，自然就该他们一个个大义凛然地拎出自己亲信排座次了。

这，就是这次“动乱—暴乱”重中之重啊。如此重头戏，不会在“六点讲话”里一带而过吧？

这天下午，广场人头汹涌，“来京声援学生已达六万余众……‘戒严’、‘军队进城’的传说纷至沓来”（张万舒《历史大爆炸》）。

到了晚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向邓小平、杨尚昆报告：基本达到预定目的地。

枪杆子到位，笔杆子自然也要跟上。据《李鹏“六四”日记》，下午：

依照邓特别叮嘱，成立中央宣传小组（丁关根、王忍之、袁木、何东昌、曾建徽、王维澄）。

总政治部主任竟然没有纳入？杨白冰立刻动作，总政特别组建了“戒严部队新闻处”。（采访江林）

也在这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常委的报告送达中办：

鉴于当前严峻局势，建议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虽然是党组的报告，人大十一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一致赞同。（《李鹏“六四”日记》）

他们不知道么，5月上旬，在戈氏到访前夕，邓特派万里去北美，是为向美加官员当面解释：与苏方会谈，不会损害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此行还包括了特别面见老布什。这可是老邓的国际战略布局。插杠子打搅，很让他烦吧？

属于被外界认为“总书记智囊”（即体制内改革精英）的三所一会，在这天，打破一直努力自律不介入的规范，也在下午动作起来，发布《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

尚可称作具有独立意见和运筹能力的体制外“公知”们（陈子明、王军涛、周舵等），此刻也站到了第一线：在蓟门饭店成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

戒严的消息，通过无数小道乱飞。

到了晚上九点，广场的一个委员会先宣布“停止绝食”。不久，王丹气愤于李鹏还在坚持“动乱”说，先宣布“二十万人绝食”再度恢复——最后，一通争论之后，又改为静坐。

晚10点，党中央、国务院在总后礼堂召开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即宣布重大的“政治局常委戒严决定”之大会。偌大北京，地方都不好找了，最后定到总后礼堂。

简单的主席台，一排七把椅子，坐了六个人：第七张空着——总书记赵紫阳“身体不适，请假”。^{〔47〕}

王震醒目地坐在台上。

召集方“中共中央、国务院”，与他顶着的“国家副主席”官衔无牵扯呀，况且已有“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台上。若说中国当时最高权力机构“中顾委”，正牌的主任陈云、常务副主任薄一波都没上去。执行戒严的中央军委和戒严部队，也没他什么事。但人家端坐台上——

〔47〕 采访赵家属：5月18日晚，老爸剧烈头痛。家里保健医小蔡觉得情况严重，专门请301门诊部主任一同会诊，带着心电图仪到家里。状况的确不好。有人说“病了，也能参加嘛”。获得报告的杨尚昆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对赵的病状予以证实。

究竟是没人能拦得住他，还是觉得（杀人不眨眼的）王震将军在此一种精神震慑？

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王震将军”，读者诸君想来已经相当熟悉：贫苦出身，几乎没读过书，从小兵到司令员，一路打杀到延安，40年代南泥湾垦荒（种的什么！？）；50年代“杀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个反革命”；70年代末大骂游行的人大学生；80年代获邓特别青睐；90年代越级越界运作，“救”了已被搁置的三峡工程……

1989年这回武力清场之后，自恃功劳厥伟，率子孙亲随，在“无产阶级当家”的中国谋官揽利、红白通吃，坐拥银子天上掉的超大“国企”……已是有目共睹。容有机会细述。

乔石宣布开会。与前番原则性的空洞恫吓不同，在这次会上，北京最高领导人（市委书记李锡铭）点了一串“幕后黑手”的名字：方励之夫妇、海外的谁谁谁……

李鹏的“主报告”，内容一如既往。其中一个亮点，是在尚未点名的批判中，将总书记的罪错锁定在亚行讲话的“分裂党”。照稿高声念出一串宣教谰言的同时，总理先生挥臂提嗓，外带一脸的泄愤和气急败坏——

种种情况表明，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广大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就面临严重的威胁！

老天！哪怕一个三流小政客，此刻都知道该装装沉痛啦。表演？还是大捷在望，激情已难于克制？

下边本应总书记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讲话……台上只有空椅子。“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他当时已经这样想、并且这样做了（《改革历程》）……小平同志的联络员尚昆同志，不得不上前脱稿做即席发言。他焦急地，或许心怀揣揣，讲到

北京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回调兵的“不得已”，以及“绝不是对付学生”。

那是要对付谁呢？——数万正规王牌野战军！李锡铭点出的“幕后黑手”多在境外啊！

邓小平的这步棋，谁看得透？在他5月21日的日记里，李鹏写道：

王瑞林电告——邓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更有把握。

散会。

与会者离开的时候，“从东南西北各路进京的军车，在各个重要路口，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堵截”。（《历史大爆炸》）

5月20日

这天凌晨，李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陈希同说，多年之后，看了《李鹏日记》的影印本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在此之前，包括在1989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过他这个重要任命。陈希同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1989年去指挥戒严”；“这个指挥部的具体地点，我这个正指挥也不知道”（《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可见，李鹏做此宣布的时候，多么仓促、拼凑。

也是在这天凌晨，“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以传单和现场播音的方式，出现在北京的住宅区和闹市，当然还有天安门广场。著者本人住在北大西门附近一个小区，这一日天还没大亮，就被楼间空地上的“播音”惊醒：

我们以极为悲痛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的权力已被剥夺……军管迫在眉睫……。

对于这则发自体制内部、真实署名、有意部署并尽可能广为传播的声明，若说邓没有及时得到报告，是不可能的。他什么感受？他如何动作？注意，此时，赵还顶着总书记名头，处于“请病假三天”的状态。

广场那边呢——基于这样的政治形势？

凌晨，北高联、对话团、外高联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出：鉴于目前形势，“将绝食改为静坐。如果绝食的同学继续绝食，我们将继续声援。我们的斗争目标绝不放弃。”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呼吁各界人士配合北京高校学生维持秩序。（《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形右实左”们有点不知下边该怎么玩了，开始分发保命钱。用张伯笠的话说“那帮孙子口号喊得震天响，跑的比谁都快……”。

小平同志真是急脾气：依照外事安排，戈尔巴乔夫要到5月19日上午才离开北京。而他指定（即“按照指挥部计划”）的大军，依照李鹏在日记里记载，5月20日早晨，就该到达天安门广场了。（《李鹏“六四”日记》）

有文件披露，执行戒严令的部队：

19日晨，各路已经开进。

实施戒严时间：本定于21日零时，后改为20日上午10时。

五万军人快速行动^[48]，依照杨尚昆5月18日的部署，向目标开进。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机械化正规军，竟然无法进入预定目的地：

[48] 也许是三万。上述这些执行戒严任务的师、旅并不是投入全部的兵力，有的只投入了几个团或营的力量。这些部队，连同武警北京总队、北京卫戍区，共同承担了执行北京戒严的任务。

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主力被困在八宝山，南面被围在南苑，东面困在通县，北面困在太平庄。唯一成功的是由沙河到达北京车站，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包围。（《李鹏“六四”日记》）

怎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市民拦截？为什么居然拦得住？

记得30年前，著者伫立北京街头，看到疲惫、兴奋的学生和市民，匆匆赶赴不管哪个方向的堵军车现场，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觉：共产党执政40年，可谓“得罪天下”，哪怕与政治斗争最无干系的升斗小民，也难找到没有遭受过它荼毒的。

但在毛时代，谁敢？到了邓时代，农民与市民（或许不包括作为“领导阶级”的国营工厂老大哥），已及学子们，全是改开十年的获益者啊。这或许是……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毕竟是单纯的学生，毕竟是五代故都的北京（北平）人，“仗义执言”，在他们生命里，还是有分量的。

再有，读史人在这里或许会留个心眼儿：此刻是5月18至20日，而非6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或曰人民子弟兵，还没有接到绝决的不惜一切代价之类的命令，也还没有放出或惩戒、或立功受奖之诱饵——虽然就在这天早晨，尚不知自己已经被停职的胡启立，正焦急地给中央常委写信，希望强调杨尚昆在19日大会上所讲——解放军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不发生流血事件。

此信，姚依林批示，居然是：

要尽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动武，
那将束缚自己的手足。（同上）

“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您姚依林1935年领导一二九运动时候也这样想？对正规部队出动，须经过怎样的程序，有没有丝毫的基本常识？

一位当年正在军队服役的朋友Y说：

总参作战部根本没有介入，全是总政一帮在那下令。仓促集合起来的这个“戒严指挥部”，到底打算怎么运作？

当年住在总政黄寺大院的前军报记者江林也说：

总政的人都调过去帮忙，院子都空了。

作战部队由总政（而非总参作战部）布局！不错，军委下达命令，军队是要服从的。但为什么如此布局——邓小平太急？迟浩田在强令下的忡怔？或者，杨白冰过于亢奋？

不应忽视的一个技术原因是，心急之外，邓、杨、还有周依冰、张工他们，也过于轻“敌”了吧？

“敌”，谁呢？大兵调集，无法进入，谁在拦他们？

这里引一段当事人回忆——叙述人某某和他的女友，当时分别是北大物理系助教和在读博士——生动展现了邓小平的“武吓”是怎么失效的：

5月19早晨，赵紫阳说“同学们……”，那种态度，大家立刻就缓和了。戒严令一出来，又翻过来了。一个又一个翻盘……就是平息不了。

戒严令出来以后，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觉得非常严峻，就到北大清华之间一个弯道上把守。还有很多市民，有人在那儿堆砖头。军车肯定要拦，大家都是自发的，我想全北京都是一样。我记得，就在我们成府路跟蓝旗营转弯那个交口上，碰上很多老大妈，她们从家里出来，搬着个小板凳，说“孩子们，你们去睡觉吧，我们晚上就坐在这儿。你们放心，有我们在这儿，军队是绝对进不去的。”还有一个老太太说，“当年进北京，我欢迎他们。今年甭想进。”

我们俩在那儿盯了一夜。到了早晨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来了一辆像小皮卡的车，开车的是个年轻人。那车一下子停在了我身边，问：你是北大的？我说是。他说：“你们要去哪儿，我今天可以带你们去。”

我们熬了一整夜。那时候是早晨六、七点钟。我坐进了他的驾驶室，我女朋友钻进车厢，我们就回北大了。我们把车带到28楼前。“高自联”就在那里，已经围了很多同学。我跟大家说：这辆车可以带我们出去看一看，看看北京到底怎么样

了。话音未落，就上来了二十多个同学。很多同学上去之前就遗书交给底下同学了。有的就几个字：“妈妈，我走了”。

我想，或许还应该有个手续，就去28楼拿了一个高自联的通行证。然后，我们这辆车就从北大南门开出去了。

这个时候，马路上是鸦雀无声的。对比前面三天的大游行，北京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了，整个城市都没声儿了。但马路上到处都是路障，垃圾筒也推到了路中间，还有隔离桩，马路上到处都是，车要不断地拐弯，或者人下去把路障挪开。

车在马路行驶，路上非常安静，没有人。后来有一个女同学拍驾驶楼的顶子，我探出头问她什么事，她说太沉寂了，我们喊点什么吧。我说你喊吧。她就喊出四句：“北大纠察，开赴丰台，拦截坦克，反对独裁”。

为什么定了丰台呢？说是要看六里桥。没有什么信息，就是有传说，我们就去看。

她喊了这样四句，车上的同学就跟着她喊。马路边上的老百姓看着我们，有的在哭，有的鼓掌。

当时马路上空无一车，我们这辆车就像是大海上的一艘小船，一路是两边百姓鼓掌——那种很悲壮的气氛。

我们是先绕到了六部口，顺着长安街就往西走。

走到六部口那一带就害怕了，因为那地方没有老百姓……再顺着长安街走，军用直升飞机就过来了，压得非常低，不是一架，像是两架还是三架，就像压到我们的车顶上，沿着长安街从东往西飞。

我们的车就调头往西开，走的是二环——最后怎么到的六里桥，我记不太清了。

记得我们是从东往西看见的六里桥的。在六里桥桥洞底下，停着一个运沙土的挂车，带拖斗的，上边站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面旗子在那儿晃，上面写着“兰州大学”。我们冲他们开过去。他们一看北大的同学到，就抱在一起哭了，说你们终于来了。他们说，半夜发现有军车车队进北京，他们就过来堵在这个地方——横在这儿了。

从运沙土这辆车往西看，是一望无际（被堵在路上）的军车。那个时候的军车没有篷子，都是敞篷的。看不到坦克，全是军车，士兵坐在车厢里，我们从底下看，只能看两边齐刷刷的大檐帽，他们是脸对着脸坐在车厢里边的。驾驶室的玻璃都是摇上去的。

边上也有很多老百姓。一听北大的人来了，大家特别高兴。

到了那里，我们觉得该做军人的工作——就给他们念报纸。但报纸只有一份，我站到一辆军车驾驶舱的踏板上，还有几个同学分别站在别的几个汽车，我念一句，周围的同学就跟着重复一句。

记得有《人民日报》的《共和国的一夜》；还有《科技日报》几篇稍微有了一点自主权的文章。

对。就给他们念，念完一段就换一个车，这样念了几辆。

这时候，有一辆军车驾驶室的玻璃摇了下来，里面有一个军官。他跟我说，我们是65军的，昨天晚上从张家口过来。说过之后，就把玻璃摇上去了。据说是65集团军193师。

念报纸的时候，军人根本不理，帽子都不带动一动的。这样念过了几辆车，我们就把念改成对老百姓讲：“我们眼前这支部队是65军的，昨天晚上刚从张家口过来。”“他们也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绝对不会把枪口指向人民。谁让他们把枪口指向人民，他们就把枪口指向谁！”

后边这句是我后加，但番号和行军路线是他们自己说的。对他们来讲，这算违纪么？

这么一喊，车厢里边的军人坐不住了，大家就开始扭头往下看。

后来，我们觉得还是这样有效：念报纸，他们理都不理你的，你跟他们没有办法沟通，现在说到他们，总算把他们呼唤了。就这么往下说。每过一辆军车，老百姓就鼓掌，那个车也就有了动静——尤其在讲65军昨天晚上从张家口过来……。

几辆车以后，出现了一个两道杠的军官。他在两个车缝中间招手，说“你过来一下”。大家不让我去，怕出事，我觉得也

没什么，因为周边都是老百姓，还有两个同学陪着。我们三个过去了。

过去之后，这个军官就说：你不要再这样说了，你这么说，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做了。

他说：你要知道，我们要是真想进去，早就进去了。但是你们也别走，要保证在我车前有人。我跟你保证：车前边若有人，我绝不开车。

听他这么说，我们也挺感动。他说：“你们不要走！车前有人，绝对不会开车！”

后来他又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做一做周围百姓的工作？能不能让我们战士上个厕所？

因为从这里往南去，越过农田就是一个村庄。当时农民正拎着铁锹在那儿看着：学生跟老百姓是可以去，但是农民不让军人上厕所。

我说“可以”。因为他也有承诺。我们举着北大证件就过去讲，那边的村民同意了。刚一转过头，就看到几乎所有的战士，同时翻身从车厢下来，坐到汽车底下的马路牙子上，每个汽车底下都坐了一片。

这下子不得了了——老百姓，男的女的，抱小孩的，就围过去跟他们说……士兵上厕所，市民、学生陪着他们来，一路就跟他们讲、上厕所也跟他们讲、出来也跟他们讲……就讲北京这几天……就做工作。

在厕所里面，大兵问，离北京还有多远？我说：多远？这已经是北京了，都已经到六里桥了。他们有的说“我伯伯在北京”；有的说“我姐姐还在北京，我都没脸……”

军人整个儿跟百姓融合了。战士们坐在马路边上，老百姓还给他们买冰棍。后来有一个年轻战士说，你以为我们愿意来呀？到现在没水喝，没吃的，你们还围着我们，还骂我们，还教育我们……你以为我们愿意在这儿呢？

我突然觉得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听他说完，我哭了，说“我给你鞠个躬吧”。我一鞠躬，周围的百姓也哭了，我看见那士兵也要哭，边上的老兵就拿胳膊碰他，不让他再说话。

第二天，我们又到了六里桥。这回见到的是：军人都在农田里，那边有个空场，他们都坐在那儿，周围有一圈战士，手挽着手，脸冲里，不让大家进去。战士可以出来上厕所。

他们就说，幸亏你们昨天在这儿。昨天晚上上级是有命令的，让我们步行进去，就是走路进城。但是叫起这边，那边坐下；把那边叫起来，这边又坐下。大家都不愿意进。你们昨天过来真的很有效果。

事后很多年了，碰上过65军的人，就聊起来。他们说，这个部队后来给撤回去了。是不是被解散、是不是有人受处分？我们就知道了。

5月19日夜、5月20日晨学生与民众的不忿；某某某他们那次，完全没有受到《五一七》《五一九》声明的影响。“北京城区戒严”，对市民而言，无法律概念但有威慑作用；调兵的急促、命令的疲软、官兵懵然；从65军193师，可窥见：就近、不带火器、命令的更改（军车；步行；休整；）；半世纪的洗脑：鱼水情。

军队受平民与学生成功阻拦，世界罕见。世界通例：国防军守土保国。只有在红色中国，通过数十年全方位宣教成功洗脑，才有“鱼水情”之类深入双方意识。

还有军官们。1980年代初，邓小平自己决策，排长以上，要由军校学生出任——他们没有判断力么？38军军长徐勤先，以及28军军长何燕然、政委张明春、39军军长傅秉跃、师长许峰、65军开赴六里桥那位“两道杠”……现代意义上的抵御外敌之国军（而非内斗党军），已然出现。

当最热血的学生和市民在京城周边围堵军车之时，北京城里也有忧国爱民之士在行动。一件有望扭转局势的大动作在运作中。

当事人军报记者江林：

（5月20日）那天，对戒严，大家都在议论。因为在这年三月，我有亲临拉萨（“西藏骚乱”）的经历，知道北京眼下这样的局面，再由军队出面干涉，一样臭。

那几年我一直都在军报机动记者部，所以跟张胜（他当时是总参作战部战役训练处处长）很熟。我立刻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们亲眼见到的情况，说“能不能跟父亲说说，军队不能这样啊，请老首长们一定干涉一下？”

张胜的友人对那些天的情景，也记得十分清楚。他说，关于戒严：

直接给张爱萍打电话的，是叶飞。

他儿子叶小琦我很熟，那时候正在北京，在国防大学武官班学习。4月中之后，常开个小车子到天安门去看，回家就把广场情况告诉父亲。不仅直率地和他爸说，5月19号那天，得知他原先军部——20军（他曾经是该军侦察处处长）从河南那边开过来戒严，立刻过去对自己前袍泽说：你们千万不能这么干哪，这事是不对的！正规的国防军，不可以这样啊！

叶飞本人有文化，还有华侨背景，又在交通部当过部长，对地方也了解，那时候正是人大副委员长。叶飞本来就思想开放，这时候，对局势当然关心。

张胜告诉我：一开始，虽然儿子说了很多，叶飞认为这局势很好处理。后来看看完全不对头，说：怎么弄成这样？再到后来……实在按捺不住，就给张爱萍挂了电话，说“我们几个老同志要有个态度，是不是提个建议——这事不能这么处理。”

这是张胜告诉我叶飞的原话。

随着广场情况不断传过来：

张爱萍做事，历来就是这样的性情：敢说敢干。他说，就这么着吧，我来挑个头儿。我写完了，你们签字。

写，谁来写呢——秘书吗？张胜正好在身边，边听他们议论就边记了下来，成稿之后让他们看。很简单，就那么几句话、表个态嘛。

张胜告诉我就这么些。

这时候，已经到了5月20日晚间。第二天，江林正在黄寺家里，接到张胜电话：

父亲他们已经从各方面得知基本情况。大家商定：老战友们，在此关键时刻，要有态度。

他告诉我，已经起草好一份致军委的信，他起草的，就几句话。起草完，父亲先签上名字，然后由他拿着这稿，开上车，逐个找其他六位。全部签过名之后，他一刻没耽误，立刻送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厅。

在电话里，张胜把这封信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给我念了一遍。放下电话，我手握记录稿，立刻拨打《人民日报》大保（按：保育钧，该报编委会七人之一），逐字念给他。

大保问：“江林，准确么？”

我说：“百分之百。张胜一个字、一个字告诉我的。”

大保说，“应该立刻排出来、立刻见报啊！”——当时，张宝林就在大保身边。

他又说，“慎重起见，应该挨个儿向其他六位签字将军核实。”

《人民日报》动作起来。陆超祺回忆：

为了慎重起见，我请总编室夜班的同志和一些与部队有联系的老记者，帮助核对事实，征求这些老将军同意不同意在报上发表。经分别和这些老将军的秘书联系，证实信是真的，至于公开发表，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

我和大保（晚上只有他在办公室）商量，给总参谋长迟浩田打电话，听听他的意见。迟浩田在粉碎“四人帮”后曾率工作组进驻报社，任副总编辑，是熟人。迟浩田同志听了电话，表示不能发表，但并不肯定。只是说“恐怕不好吧”，让我慎重考虑。过了半个小时他来电话，估计是请示了什么人或者和什么人商量的，用很肯定的语气说，“千万不要发表，因为信是写给领导的，不是供公开发表的”。

当时，大保版面都留好了。不能原文刊发此信，大保老陆他们只好把原先准备发在国际版的一则匈牙利要讯：《不准用军队解决内政问题》，调到了一版。

迟浩田请示到谁？杨得志总长？杨尚昆常务副主席？邓小平主席？

另一边，当天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杨白冰、迟浩田、赵南起以及戒严部队指挥部成员参加，听取关于戒严情况的汇报。最严重的问题是：学生市民阻拦成功。

最触霉头的先说。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报告：徐勤先已解除军职。接着表态：38军一定听党的指挥。听过各部汇报之后，杨尚昆做出三点指示：

第一，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风浪面前，坚定政治信念，保证部队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

第二，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保持最大的克制，坚持以非致命性手段进行自卫，严格控制使用武器。主要以棍棒作为自卫手段，决不能动用枪枝，向人群开枪，违者要以军法处置

第三，执行任务考什么呢？精神：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发广大指战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八九民运史》）

会议最后做出决策：“从次日起，部队转入休整状态”。

至此，邓小平亲自提议的“以正规军实施戒严”的第二波威慑，即“文吓”之后紧急推出的“武吓”，竟然也没有奏效！

当晚，杨尚昆把部队无法进入目的地之现状，在电话里向小平汇报。邓对他交代了以下几点：

目前的情势大家都很焦急，我想明天老同志开个会，陈云、先念、彭真、邓大姐、一波、王胡子和你参加，讨论局势，两位老师身体不好就算了；

陈云同志建议，你、一波和李鹏、姚依林、乔石，要立即安排分头找各省市区主要负责人进京谈话，统一认识；尽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政委统统叫来，通报情况，认清当前形势，维护全国稳定。”（《中国“六四”真相》）

注意这里所说的令大家焦急的“局势”：“北京城区四面截兵”的结果，证明“武吓”失效。

失效，意味着什么？你老邓一错再错啊，你老邓拢不住局面啦。那，你和你的人，还要接着做常委和总书记么——这就是“政局”。

“原地休整，进行思想动员”的意思，什么呢？将“一举戒严”的军事行动先放放。政局，先安定下来。

政局怎么安定？你小平同志自己掂量吧。

邓小平决定退让。

5月21日

下午，军委领导正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开会，一部小车驶入。一名军官走下车，将一封信交到前来接待的参谋手中。

这，就是那封著名的七位开国上将联名给戒严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的信：

首都戒严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入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信，只有这几句话，但七位老将军的郑重签名，全在上边——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

亲自将这封信送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厅的人，正是该信的起草者，也是此信第二签名人张爱萍将军的次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大校——张胜。

张胜告诉友人当时的情景：

七上将签字完毕，张胜将原件送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厅。里边，军委领导正在商量戒严的事情。杨家兄弟都在里边。还有总长迟浩田。

就在这时候，七上将的信到了。出来接待的，是军委办公厅秘书局秘书处处长。签名信递到了他手里。拿到信，读毕，他神色震动，脱口而出：“来得太及时了，这封信！部长们正开会呢，研究要不要出动部队戒严。”

这里说的“出动部队戒严”，望读史人注意时间节点：并非李鹏5月20日早晨发布的那个戒严令，而是当天晚上，杨向邓报告之后，小平同志决定的“调入后续部队”；也是乔石得知后，极为焦虑地到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那里报告的“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不是三万、五万，而是二十、三十万了。

此信，再无下文。

二十多年后，说到这里，Y依旧难于压下心头之痛：

所以说，我们军队内部的人、头脑清醒的一大批干部，都知道这事该怎么办。为什么单单高层领导你不知道？肯定有别的动机嘛。

《李鹏“六四”日记》：

10时，我和乔石去尚昆处。

尚昆决定让受阻部队原地休整三天，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入，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调后续部队进入，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在这里，李鹏没有解释，这样大的动作：大军压境首都，谁的决定？杨副主席，抑或军委扩大会议？对他们主持戒严工作的二常委，是告知，还是商量？

乔石也没有文字留下。但从赵紫阳后来的回忆里，我们不但知道了他对局势的推测，也知道他的焦急：

5月21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改革历程》）

这时，应该是中午前后。乔石为什么这么急匆匆地过来见赵？而且仅他一人，同样知情的杨和李无动作。

那时，总书记正在他的三天病假中。他和启立，还都在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四月中以来，乔石目睹（而且遵从）了邓的“文吓”——“武吓”全过程。他十分担心，下边再大调兵，局面会怎么样：

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同上）

这是乔石的判断。他出生于上海殷实家庭。卷入共产革命，并不为分人家的田地浮财，也无意“跳到少奶奶牙床踩三踩”。他们这批理想者，愤恨社会不公，期望国家富强……情感决策，都离不开这底色。但他也缺着一块，若以中共顶层领导的标准衡量：因为没在毛泽东身边历练过，尚未具备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两个基本素质：对蚁民的漠视、对党内权争的高度警觉：时时用心揣摩，绝不敢稍息。

邓小平出手的第三步，调大部队进京，目标指向，党内权争对手。而他，却为“涌在街上”的平民着急！

人在“请病假”中，赵其实也在焦灼思虑怎样化解危局。他后来回忆：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5月21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同上）

对此，李鹏的记述是：

（赵）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他要阎去见杨尚昆，杨拒绝了赵的建议。（《李鹏“六四”日记》）

赵决意直接启动人大。他在《改革历程》中写道：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

据赵回忆：

在这之前，彭冲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改革历程》）

彭冲出生于发达地区，在协助华国锋解决“四人帮”、协助邓小平经济开放、协助彭真建立法制等等方而，不慕虚名，不求跃升，务实且稳扎稳打。1989年纷乱的春夏之交，正在人大常委秘书长位置上。

其实，早在5月19日，面对“北京城区戒严”这样的大动作，他们已经在敦促“提前召开第八次人大常委会”（原定6月20日）。此刻，新局面下，再度动作起来。他召开了在京人大委员长会议（共11人，其中党组成员6人），提议：提前开会！速召万里！

紧急上报到中央——无人批复。据《李鹏“六四”日记》：他和姚依林批复不同意；乔石画了圈。

常委分工，胡启立主管人大政协。情势发展至此，自然蹶蹶难安。这天上午，虽然对邓已经打算迈出的第三步无从知晓（他没有和李鹏乔石一起被召到尚昆处），出于对动用大兵一直持有疑虑，胡启立也认为，人大此刻该起关键作用了。他按照原程序部署下去，但是……居然……老程序走不动了！

常委指挥人大党组；国务院指挥外交部；万里听谁的？顶着“委员长”官帽的万里，能，还是不能在北京“行使最高权力”？

赵紫阳其实没有这么“书呆”。动用人大，他最先想到的，当然是请尚昆问问小平的意见。但是直到后来他才知道——

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改革历程》）

这就是问题的“眼”了。

就在赵紫阳他们急昏了头，完全忘记邓小平最恨的就是分权：分共产党的权，分他小平的全，竟然一心召回万里、启动人大；李鹏呢，他此刻满脑子想的、也是他最焦急的……可不可以说，“终于到这天了”。作为常委老二，只要老大下，不管什么原因，都该是老二顺序上位。

于是，也是这天（5月21日）中午前后，在乔石焦急地跑去看赵紫阳的时候，他致电邓宅。

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李鹏“六四”日记》）

5月21日起而行动的，还有一位在邓时代相当出彩，从而也极具戏剧性的人物：邓朴方大学同寝室上下床好友何维凌。身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下属的中美中小企业国际交流联络处，他一头儿联络着邓家，一头联络着索罗斯。

军队和人民僵持，何维凌自然想到理性且通人性的朴方。

据李凡回忆，5月21日下午，何打电话过来，说：

朴方那里认为可以调解一下。何说，他给邓朴方提出了三个办法：

一是小平同志发表电视演说，保证局面稳定；

二是由我们充当调人；

三是邓小平干脆不管，彻底退下了事。

他感觉邓朴方比较悲观，认为人们都想打倒邓小平。但他对朴方说，他今天上午到天安门转了一圈，觉得事情并非如此。对于改革，人们依旧认为，毕竟是邓的成果。只要邓对目前的局面有所表态，威信必会提高。

邓朴方讲，你们可以议一下。何维凌说，既然朴方有了这个姿态，下午在他家开个会，咱们议一下？

我们商量了一下，请谁参加合适。

下午4点，在何维凌安贞桥附近的家里，来了不少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也有不认识的。记得有朱嘉明、唐欣……何开口就讲了上述的三条意见。

会上，有人认为局势严重，我们应该代表邓去（同学生）谈。李凡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意见。他认为：

我们不能代表邓，也无法代表邓，这样会把事情搞得更坏。我们应该是中立的。我们可以找到两边的人，我们有这方面的联系。

有人提出，邓应该给出一纸手谕，即“学生只要退出天安门广场，保证以后不追究”。这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保证24小时内让天安门的学生退出。

李凡提出须增加一条：事情的解决必须是和平的，绝对不能开枪。

有人认为“绝对不能提‘邓小平退休’，否则会招来全面崩溃”。

到最后，何维凌总结说，原先的三条，看来只剩一条了：邓小平拿出来一纸手谕，然后我们说服学生在24小时内撤出天安门广场。他说，立即和朴方联系。

21日会后，朱嘉明没有和任何人（包括何维凌）商量，立即独自通过残联的唐若昕联系邓朴方。得到认可后，亲自到广场找吾尔开希——这或许就是当时广泛传布的“朴方的代表在广场上和学生领袖谈”。^[49]（采访李凡）

到这天晚上，什么正式名分都不具的“八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在邓家开会——顶层交闷火的戏，演到这个份儿上，再不推向高潮，已经说不过去了。

米粮库胡同，八老坐定，邓开场直奔主题：

^[49] 其实是吾尔开希等到了残联办公室。（采访唐若昕）

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赵紫阳同志固执己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就谈他的问题。

这段话，或许可以解释为：开宗明义，赵的安置，拖了很久了。我让一步。他说：

目前的局势大家都看到了：戒严了，秩序也没有好转。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出不了手，而是党内的分歧把本来应该早就解决的事件耽搁了，以至事情越闹越大，局势难以收拾。要是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连事件的性质都定不下来。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也许会坏事变好事。

现在，这些主张搞动乱的人已经在台前得到了充分暴露，他们与国外勾结，连台湾的国民党都想插手这件事，他们的就是要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国家、否定社会主义、搞垮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改革开放局面。

帽子老早就做好拿在手里了，必须扣下去——“主张搞动乱的人”、“黑手”，似乎早就选定为鲍形。问题是，“六四”前就将他拘捕，之后判刑七年，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定罪，拿不出一条站得住的证据。至于“与国外勾结”、“国民党插手”云云，更是信口甩出。讲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与1959年的“军事俱乐部”、与1966年的“走资派”没什么两样，在座诸位也都懂——毛的传统。

现在，有很多人的思想都被搞乱了，党和国家的确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固执己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连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的党政军大会都不参加——总书记不去，人家马上就看出了问题，这就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出来了。他是严格想把我们与他划开一条线来，表明他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能不谈赵紫阳的问题。

第一议题——批赵紫阳——开场。李先念立刻接上。不仅罪状逐条开列，还稳稳地落实到“权争”。

我老早就说，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赵紫阳就属于另一个司令部，现在就要揭这个底、挖这个根子，否则党内思想统一不了。从“4·26社论”一出来，赵紫阳就开始反对这个定性，一直认为不是动乱。他是一步一步有目的走的。

他的亚行讲话，我一听就感到气味不对。

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更把小平同志给出卖了，这不是有意是什么？为什么早不讲，晚不讲，偏在这个时候讲？让学生和老百姓都把矛头对准小平同志。

他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的讲话，像不像个总书记的样子，什么叫“我老了，无所谓了”？

北京戒严这么重要的会，他作为总书记可以请病假，又不是病得卧床不起了，他是有意制造党内分裂。

他反对在北京戒严，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要迫使我们这些老家伙交权、下台，搞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套。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他束手束脚，搞不了。赵紫阳已不适合担任总书记。

王震带着感情发挥：我们没有亏待他，是他自己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跟我们过不去。胡后立也应该撤掉！王胡子最恨的，是赵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出气口么，《河殇》不像话。最后的落点，还是打天下分好处：党没亏待你，你跟我们过不去。

邓颖超讨厌赵的“不谦虚”：

现在，社会上都把他当作一位改革家，是改革派。但他不谦虚。事实上这些改革方案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应该算在他的头上。这些改革方案很多是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你们定的，他只是执行。

她认为党的总书记应该虚怀若谷、承担责任。这次事件表明，赵紫阳同志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

彭真附议。

杨尚昆接下来的发言，稍稍转了调门：

在这件事情上，赵紫阳的确犯有严重的组织纪律方面的错误，胡启立的思想也与中央的意见不统一。但我个人意见，还是从大局出发，团结为主。何况现在这个时候更换总书记不是时候，可以让赵紫阳作检讨。常委的班子还是要避免大的改动，国外总说我们这派那派，希望我们内部闹不团结。现在就已经开始大造舆论了。

邓小平几乎直接打断他：

什么叫独立性，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造谣也好，挑拨也好，国际舆论让他去好了。

接着，他把毛左卫道们打算泼向他的话，自己说在了前头——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错，但后来他们都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栽了大跟头。

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们在座的都讲过多次，但他们就是没有很好执行。

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分裂党，支持动乱。好在有我们在，还能压压阵。

赵紫阳怂恿动乱，没有不换的道理，胡启立也不适合再当常委。不换，怎么向全党交代？他们不能成为全党的榜样。只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改变，只要坚持我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看换班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常委的班子首先应该是一个团结的班子。能担任常委的同志，政治觉悟要高，工作能力要强，思想品质要好，要善于团结人。一个常委班子如果是团结的班子，努力工作的班子，就能够成为全党的榜样。

轮流表态一圈，主将陈云尚未开口，邓忍不住点名了

陈云同志，请你谈点意见。

陈云厉害。

有主见、坚持己见，却最善于隐忍（有时候一忍就是几年，一般以“生病”掩护），直到关键时刻霹雳出手。对毛，他见风使舵扭转危局；对邓，政争权争，毫不退让，不动声色地干掉邓的人。

第一回出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不管你华叶邓定的大会主题，上来就说冤案，喧宾夺主，赢得满堂彩。

在十二大之前，他曾与邓联手，一步步挤掉华国锋、汪东兴等一批“功臣”，把权力，从毛的昏庸指定下夺回来。这，已经成为历史美谈。

十二大，邓选了耀邦，他“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嗖地在1983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工作）发飙——拿着讲稿念出“十条错误”，算不算把经济工作决策权，从邓的轻率简拔下夺回来？

到了1986年底，批胡生活会上，仰承变了脸的小平，邓力群、王鹤寿多么恣睢，陈云没看到？但他一把抓住的，是会议记录里王兆国（小平亲选爱将）的发言。陈云同志做出批示：小平同志暨中央常委：此人不适合高层政治生活，建议到基层锻炼。小平此刻，只剩下无奈——批示：同意陈云意见，找一个好一些的地方，让他去。

接着，十三大人事小组：姚依林被安了进去！结果是：万里和田纪云出局。待到赵紫阳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他能站起腿来就离席。

这回，已是十三大之后。1988年借物价闯关栽赃没玩成，到了1989，到了邓最恨的学生闹事，陈云人在上海，却立见战机，直至今日。

眼下能剔出来的点滴行藏，只有4月24日他的许氏大秘对李鹏23、24、25日一连串动作道乏，以及他自己刚一得知《小平同志四二五讲话》，不仅自己，同时立即通知邓力群：返京！

这回，算不算是，把权力，从被你邓放任得不知天高地厚、最后闹成如此局面的自由派总书记手里，夺过来。

好，回到这天晚上——轮到陈云发言。这回的局面，本是“小平，这回你服了吧”，但陈云同志开口说的是：

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全体八人一致意见：赵紫阳和胡启立不适合再任常委。谁合适呢？图穷匕首见——用不着小平发话，陈云不打磕地引入第二议题：谁上？

赵紫阳、胡启立不适合再当常委。新的总书记，新的常委班子成员在政治上首先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党性原则强；要能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不偏激，不主观，工作协调能力强；要学马列，懂理论，知识面广，工作实绩要好；要有良好的形象，各方面都能接受，能统领民心，稳定、可靠。

我们知道，即使这样的会（谁不知道谁呀？），开口道出的，当然一派冠冕堂皇：党呀，国家呀，人民呀等等。但那念头，明里暗里，在一对对恩师爱徒、听谁的不听谁的、哪次招待得好、哪次甩过脸子……不知运筹多久了。

先念同志跟我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同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我到上海几次，他都与我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为人谦虚，党性原则强，知识面也很广，在上海人缘不错。

李先念立即响应：

我虽与江泽民同志没有太多的接触，但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不错。我记得，1987年初那次闹学潮，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上海……这次“4·26社论”发表后……部署戒严后……所以，从政治上、党性上……抓经济工作……还有，江泽民形象不错，年富力强。我同意他为总书记的人选。

紧接着发言的王胡子，是不是有点慌了——早在十三大前，他就策动赵把总书记让给邓力群；这个春夏之交，终于逮住老赵错处，推“老二”顺势上位，他和李鹏底下叽咕多少次了：

江泽民没有中央工作经验。总书记应该从常委当中产生。李鹏同志可以当总书记嘛。他在这次反对动乱中的表现很好嘛，大家都看见了的。

彭真，无论理性还是本能，都不忘他的北京帮：

万里同志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既在地方干过，又在中央干，熟悉全国情况，现在又抓法制建设，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有威望，拿得起来。

这岂是陈云容得下的？立刻挡回去。总书记之外，常委也须精心布局。陈云立刻接过话头：

万里同志年纪较大，本来安排他去人大就有退居二线的意思。我建议，在常委人选，能否考虑宋平同志参加进来。他接任组织部长后，干部路线上抓得还是很有成绩的。这方面，薄老比我有资格。

薄一波赶紧跟上：

宋平同志搞计划出身，工作非常认真细致，在省部级干部的考察、培养与任用上，做了非常深入的工作，组织系统的同志对他评价很高。他对自己要求严，组织纪律性强。这次事件，他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我同意陈云同志的建议。

有趣的是，薄一波此刻，居然悄没声儿地废掉自己珍贵的一票：没有提总书记人选。精明啊，邓陈两边不得罪。

杨尚昆接下来讲的，如果客观地看，应该是水准最高的了——无论视野、经验，还是仅仅就规矩而言（乔石常委排第三）：

总书记可以考虑从现有常委中产生。现在各方面都把矛头对准李鹏同志，反对他的呼声很高，如果提议由李鹏同志担

任总书记，党内会有很大的压力。乔石同志年富力强，他是目前常委中在中央各要职部门担任工作最多的一位，当过组织部长、党校校长、中办主任、政法委书记、中纪委书记，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总理，长期在书记处工作，熟悉中央机关情况。为人清廉，工作能力强，在中央机关有威信。我提议乔石为总书记人选。

邓小平此时没有接杨尚昆话茬。这，也许是邓杨二人，在人性最深层的分歧。对常人的悲悯，他们尚存；强悍霹雳的政治家邓小平，不具。他提的，是小木匠：

总书记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表明态度，旗帜鲜明。天津的李瑞环有干劲、有魄力、有思想，善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化解各种矛盾，很适合做宣传鼓动工作。我跟他谈过几次，别看他木匠出身，劳动模范的帽子一直戴在他的头上。其实这个人很有思想，他懂哲学，并能活学活用。这个人敢于坚持原则，经济工作也做得出色。这几年天津的市政建设、引水工程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李瑞环算得上是一个实干家，在天津有口皆碑，天津老百姓、心目中威望高得很。常委中应该像有李瑞环这样干实事的人，这样群众才会服气，才会知道中央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经济建设方面是一贯的，才不会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他是常委的一个合适人选。

邓小平在这里说得很实在，李瑞环从不掉书袋。污染啦、自由化啦，可说与他天然不沾边。借此整人以博上位，他也不齿。^[50]应该说，胡、赵身上具有的深思好学，就他而言，相当淡漠。但邓小平这一阶段的“改开”，即中国经济改革和有限政治改革（行政效率改革）年代，小木匠最贴近邓的风格，实干、草根。他的座右铭是“靠实践、靠群众”；他在天津期间的狠抓城市基建、狠抓“菜篮子”工程……

[50] 1987年，十三大之前，赵紫阳“五一三”讲话，将轰轰烈烈的“反自由化”斗争来了个急刹车。赵再接再厉，决心打掉保守派意识形态堡垒，斩蛇斩首。他向小平提议，调天津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陈云反对。

小平话音未落，邓颖超跟进——和她在南开读书有关？

我对李瑞环这个人印象不错。共产党的领导人应该要有亲民思想，心里时时刻刻装着老百姓……

哇，获得两票的，二人：江、小木匠——虽然仅说到“常委”。其他四人如何倒向？李先念带兵出身。“不输”，应是首选。他说：

总书记的人选、常委的人选，我建议是不是再酝酿、考虑一下，考虑得越周到、越全面，对党的事业、对国家的前途就越有利。

邓小平：

我同意先念同志意见。这几天我们大家都考虑一下，进行反复比较。待考虑成熟后，再正式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我们的意见，并建议召开中央全会。

陈云：“我同意。”

八个人五个主意，会上意见无法统一。

按照中共自己在十三大上修改的章程（《党章》第3章21款），常委只能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总书记也只从常委里边产生。这八位，聚在一起毫无愧意地大抢上边一番话，典型的“小组织活动”吧？若说这不过老战友凑一块儿议论一下国事党事，倒也无妨？但他们做出了决议，并且立即生效：总书记赵紫阳、常委胡启立，第二天即停止了工作。

拿掉在位总书记的闹剧，在中国重大转型关头重演——距胡耀邦那次不过两年四个月。不同的是，或曰更甚者，遭废黜的主角竟然没有在场。这里，还用补述华国锋、张闻天、瞿秋白、陈独秀他们的命运么？

不能为邓所左右的中共“八老会议”，没什么好玩的吧？在邓心里，是不是已经明晰：此计从此“去它的吧”——虽然要到月数之后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才正式宣布。

眼前的局面必须应付，元老们转向第三议题：人大与万里。前委员长彭真很是忧心：

社会各界要求万里回国的呼声很强烈，还有人想期待万里回来解决问题。我看，万里继续在美国访问不妥，对中央、对万里本人都会有压力。一下子回来也不是很策略。

薄一波比他灵活多了：

可以让万里先回国，但不忙于先回北京。可以先到上海嘛。

李先念不仅跟进，还把他的意图（给江机会闪亮登场）加了进来：

这个办法好。一定要让万里了解事情发展的真相。到上海，可以由江泽民做工作。

陈云立刻跟着问：

小平同志的看法呢？

显然，八老中，此两人互知分量。邓小平点头。邓颖超趁势做些不咸不淡的补苴罅漏，颇有先夫风采：

最近一些天来，我不断收到各方面的来信、来电，向我反映北京和全国一些地区的情况，希望我出来说句话。虽然我已經退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为党做点事，表个态。

听说现在社会上对戒严，各种谣言很多。说中央有两派，一派支持戒严，一派坚决反对。为此，我心里非常焦急，准备给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写一封信，希望他们相信党和政府，爱护人民解放军。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快把当前的事态平息下来。

邓小平当然也顺着说：

邓大姐想得很周到，我们都要向你学习。这几天，我们在座的，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各界表明态度，支持解放军，支持戒严行动，有必要。我为我们还能能为党和国家做些事情感到欣慰。关于赵紫阳、胡启立，还有书记处另两位成员（阎明复、

芮杏文)的问题,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可以先停职,具体决定由中央全会做出。我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要立即召开党政军领导人打招呼会议,以稳定人心,统一思想。(以上八老对话,《中国“六四”真相》)

陈云完全同意。并且郑重提醒:打招呼会议可以先不向党外副委员长、副主席传达。

什么叫一党专制,什么是一党专制下的寡头政治,这天的八老会,足够生动了吧?

至此,会议结束。这个纯粹由最高级元老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决定:

撤换赵紫阳总书记、胡启立常委的职务,并于5月22日起停止工作,正式决定由四中全会做出;同时提出了新的总书记和常委的酝酿人选;做出了让万里回国不回京的重大决定。

按照常理,总书记的人选应从常委中依序递进,胡耀邦下台时,作为总理的赵紫阳就是当然的总书记,即使是中共元老,在这个问题上当初也没有人明确反对意见。如果比照胡耀邦的那一次,这次在明确赵紫阳下台后,李鹏接任总书记应是顺利成章之事。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李鹏的名字,不仅邓小平不提,连陈云、李先念都出人意料地将其弃之一边,只有王震一个人提名,当初竭力推荐李鹏出任总理并做了大量游说工作的邓颖超,此刻更不发表关于李鹏的任何意见。

现有常委中,为元老们冲锋陷阵最积极的、最不折不扣执行戒严命令的李鹏,怎么在出任总书记问题上得不到元老们支持?除了李鹏工作能力不令元老们满意外,最主要的还是杨尚昆说的那句话:李鹏的民愤太大,当总书记难以服众。

就在这天(八老会之后的深夜),江泽民接到(中办)电话,命他立即进京。

第六节 重兵布下——政局重整

5月22日

“武吓”失效。

以民众的眼光看，戒严部队，被咱百姓“围阻”在北京中心之外！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他们是接到命令“休整三天”。

调兵同时，高层开始密集开会“打招呼”，向“各路神仙”说明政治局“地震”、赵紫阳下台的情况。

这天下午，据《李鹏“六四”日记》，未被“八老”罢免的三名常委紧急开会，讨论接下来如何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解决组织处理）。按照邓的部署，此会应放到一周后——“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

赵紫阳回忆：

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启立未被撤职，我在开会前也未被撤职，还是常委。常委中有两人不通知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恐怕不能说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三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不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布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布我的问题做准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这些重大部署，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

决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启立被排斥在外，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

应该说，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质。因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行职权，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显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的，都是违反《党章》的。

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改革历程》）

没有人理他。

而按照邓的意思，军队固然是重中之重，参会者，也先要吹吹风。于是，这天晚上，依照5月21日八老会结束时邓给出的“建议”，为“稳定人心，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常委，要立即召开党政军领导人打招呼会议”。

所谓“立即”，没人敢怠慢。不到一天，由杨尚昆加上三位尚存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分别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组成人员会议，已然齐集北京。

对昨天的“八老会”，李鹏且不掀盖头，但依旨意行事，说：“最近，中央虽然未开过政治局会议，但常委多次研究过，几乎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研究……”，对赵紫阳予以清算。

在讲话里，他特别提出“谁为核心”：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党究竟以谁为核心领导，谁代表改革、开放。是紫阳同志，还是小平同志？这一点大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年改革以来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对世界来讲，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当然紫阳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执行小平同志的方针。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误。（《李鹏“六四”日记》）

尚昆看来很同意李鹏的意见，强调成就都是邓的，麻烦都是赵的：

先念同志讲，有两个司令部。究竟有个甚么司令部在指挥？所以，现在不快点把底揭了，很难办。在大家看来，紫阳同志是个改革派。实际上，他改革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小平同志的方案。那些乱子，是出在他当总理的时候。小平同志有句话：“这些乱子是三年以前就很明白的，五年以前就出现了的”。（《中国“六四”真相》）

姚依林自然是锤锤敲到点子上，定调也最高：矛头指向小平同志，改变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分裂党、支持动乱云云。

对5月21日的八老会，乔石似乎未予闻。他在这次会上的讲话，没有丝毫清算赵的意思（虽然也道出了他们之间不同意见）。他主要关心的是学潮与戒严：

这次学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开始，一个多月了，事态不断扩大。这中间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学生头头中提出希望“下一台阶”的，只要不丧失原则的，都尽可能地做了。所以，维持了一个多月，没有抓一个人，没有流血。

4月18日学生在大会堂请愿，北京市派了三位人大代表把信接下来，他们认为胜利了，说要走了。但又连续两天冲击新华门，有些又冲进去了，喊的口号也是很反动。总之，一步一步，有好多台阶可以下，但是始终没有下来。

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找出好的办法。如果能再退一步解决问题，早就退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不能再退了。（《李鹏“六四”日记》）

他认为，直至戒严，也并不意味着“流血”，并始终在谋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现在戒严令发布了，我们不想发生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但军队完全不进城也不行，实际上已经有一些进城了。军队进城是要帮助维持秩序，保卫重点部门、要害部门，根本没说要镇压群众。

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紧张，一个多月没好好休息了。这种局面旷日持久，他们会认为你没办法了。（同上）

不能再退让。如何了结？乔石认为“一方面把军队作为威慑力量，一方面找个适当时机清场——用警察、用学校领导、用家长……部队进入而停止动作，拖下来”。总之一句话：“就是不想动武，避免流血”。

作为这项工作的主持人，他明确如此说——他觉得，这并不与邓违拗。但从他的发言，看不出对邓的这一步，究竟明晰几分。

同一天，全国人大正召开委员长会议，彭冲主持。副委员长们（似对八老会未闻风声）对北京戒严仍然机能亢进，（延续日前的提议）提出：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汇报，等等。

而我党早就安排下釜底抽薪之计。同一天，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致万里的电报已经发出，命他“提前结束访问，先到达上海，稍事休息后再回北京”。5月22日北京的下午，是纽约当日凌晨。《人民日报》记者即刻向总部报告：万里已经接到电报。

5月23日

继续打招呼。

在这几天里，人大、政协、国务院、各省市，以及各大军区和民主党派第三层领导纷纷入都，由第二层领导一对一分别谈话：形势、决策、应对措施，让他们一个个表态，循规蹈矩地与八老“保持一致”。

这场政治地震给人的震撼，目前只有许家屯留下了记载：

廿五日，杨尚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一间休息房里见我。当时，他们把北京市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许多负责人都搬了家。杨尚昆、李鹏搬进了中南海，他们比邻而居，一个住毛泽东的游泳池，一个住池旁毛泽东逝世时的住宅。

在我等待他们召见时，我已经知道，此行是属于中央“打招呼”性质，全国不少省、市负责人大多已来过北京，我属于最后几个人，至于打的什么“招呼”，不用讲，也已猜出八、九分了。

杨尚昆没有和我讲到5月4日两人谈过的话题。一见面，就解释：“常委决定，因为我和你及几个人熟悉（杨尚昆没有讲是哪几个），要我出面谈话。”又说：“经常委决定，赵紫阳已停职。小平同志讲，已经没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希望你理解，支持中央的决定。”

我当时十分难受，一时讲不出话来。半晌才讲：“动用解放军，千万不要流血啊！”杨尚昆当即表示：“不会的，不会的。”并说：“几位老帅，徐帅聂帅，也是这样意见。他们也向中央提了这样的意见。”又重复了一句：“不会的。”我便问：“谁当总书记？”杨尚昆回答：“还没有决定。”随即又补充说：“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我立即郑重地向杨尚昆说：“不能让李鹏当啊！”杨也肯定地回答：“不会的。”

在这样的问答过程中，我激动地流泪了。（《许家屯香港回忆录》）

“打招呼”会之后，也是按照“八老会”的安排，杨尚昆把江泽民留下。杨代表邓小平向江泽民交底：

小平同志要我与你谈话。中央决定，万里同志将提前结束访问回国。北京的局势现在很复杂，一些人想利用万里同志的特殊身份重新挑起事端，扩大影响，所以，小平、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一致认为让万里同志先回到上海，由你代表中央先向万里同志介绍最近一段时间的国内情况。（《中国“六四”真相》）

杨尚昆告诉江，这是中央的决定，已经发电报告诉万里。要他代表中央向万里传达三件事：

- 赵紫阳已被废黜（罪状三条：反对“4·26社论”、反对戒严、向戈氏露话）；
- 嘱他告诉万里，政治局常委会宣布戒严，不是针对学生和市民；
- 以及，眼下一些人大代表、副委员长等，呼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人大常委会已通知所有人大代表不要参加签名行动。（同上）

嘱他对万里说，中央希望他在上海就此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

杨尚昆明确告诉江，“你是政治局委员，你就是（中央这次行动的）代表，何况是小平同志指定的。”

江泽民受命。当晚即返回上海。第二天早晨，先向上海顾委会正副主任（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做了汇报，接着召开市委常委紧急会议传达。

这天下午，街面上爆发各界人士参加的、自发布戒严令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打出的横幅已经是“军管引起动乱，戒严引起瘫痪”、“不许枪指挥党”。湖南过来的三个浏阳人用鸡蛋壳装油墨投掷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

“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与学生真正站在一起，与邓小平等进行殊死斗争”，发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发布《光明与黑暗

的最后决战》、创办《新闻快讯》，并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后来又有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背后长胡子的人加上非法组织，先有蛋后生鸡，到这会儿算是坐实了。

这一局面，普世、“无产”两造，就价值评估与政治学判析而言，可谓两极对立：前者认为，与《宪法》并无冲突的独立的民间反对派开始出现，从而构成政党政治以推行宪政的雏形；李鹏等“无产”们呢——“一小撮人的幕后策划、利用学潮，公然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并千方百计地成立非法组织，进一步扩大事态，使运动不断升级”。

广场花式闹民主，北京四九城的秩序究竟怎样呢？公安部发布的《公安信息简报》：

5月1至21日，北京市治安案件发案数182起，与以往没有明显变化。期间，共发生重大交通事故13起，死亡15人，是今年以来较少的三周；共接到火警138起，比去年同期下降33%。

5月24日

继续打招呼。

杨尚昆召开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通报赵紫阳的问题，统一部队高级将领的认识，以防军队高层产生思想分歧。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出席会议，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各大军区、各兵种、国防大学的政委、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会议。

杨尚昆说：

一段时间安定了，中央某人说话或者一篇文章出来，又起来了。然后又下去一点。接著又起来了。到了最后，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搞得首都这样失去控制？全国都发生大的游行示威……经过分析事情发展的过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接著，他历数了赵紫阳在“4·26社论”、亚行讲话、会见戈尔巴乔夫讲话，和5月19日“告别讲话”的错误，以及他对待戒严问题的消极态度，透露了中央“势必要换领导”。

然后，谈到军队问题。他说：

特别重要的是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军队是不是都思想通呢？这就要靠你们去做工作。我想大军区一级的同志没有问题，但军以下会不会有人有问题呢？现在还有人说，军委有三个主席，为什么邓小平一个人就能够调动执行戒严令的部队？这些人根本不懂军队，只能欺骗学生，军队实行首长负责制，我们这些人只是协助主席工作，起参谋作用……

紫阳同志做这些工作，老实讲，我们给他贴了不少金。这几年的成绩，基本上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经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他只是执行。

杨尚昆强调：

请大家来，就是要做这几方面的工作。

一，请你们心中有数；

二，回去开党委会，跟大家说清楚，军队要传达到团级干部，团级干部非常重要；

三，党委要统一思想，无论如何要统一到中央的思想上来，特别是军队，不执行命令，我要以军法论处；

四，请你们特别注意院校，院校的干部、主任、教授，要对学员做好工作。军队院校绝不能参加游行示威和声援；

五，现在到达预定地点的军队，要立即安置好，保证他们休息好。要下去动员，向基层干部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来的时候，邓主席要我传达一个意见，要组织干部战士，做学生和市民的工作，向学生和街道群众讲清楚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已是戒严第五天了，五天来我们没有开过一枪，没打一个人，这一点老百姓是清楚的，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做好宣传工作。

军队干部要听党委的，党委“要统一到中央的思想”；中央在哪里？杨这时候——依照记录——已然语无伦次：

中央考虑来考虑去，势必要换领导，因为他不能执行中央的指示，同时另外还有一套。他就要通过这样一套立法程序达到他目的，因为在党内，政治局大多数不同意他的意见，常委里只有他一票。赵紫阳要辞职，传到外面去了，现在外面就放出空气，说是七老八十的人，怎么能解决问题呀；我说这个问题很好答。这是政治局常委多数做出的决定。这几位老同志在党内威望最高，历史最长，而且对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小平同志不用说，先念、陈云、徐帅、聂帅、邓大姐、彭真，还有王老都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党和国家这样紧急关头，他们怎么能出来说话？他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处于危亡状态，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现在有人散布说没有什么党，都是一个人决定的，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件事的处理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多数人做出的正确决定，陈云、先念，包括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完全支持和拥护这一正确决定。（以上杨的发言，《中国“六四”真相》）

中国纳税人供养的，究竟是国防军，还是党军，没有比这篇“自供状”更明白的了。

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结束，海军、空军、除了北京军区以外的六大军区，通电中共中央，拥护李鹏及戒严。参、政、后三大单位，翌日在《人民日报》头版，联名要求驻京部队毫不犹豫地执行李鹏的戒严令。

对那段几近窒息的时日，鲍彤留下了记录：

5月24日上午，紫阳同志找张岳琦同志和我，说要起草一个发言稿。他说，不知道政治局什么时候开会；如果开会，就会批评我，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要我回答；你们帮我起草一个稿子，哪怕不成熟；如很快开会，就有个准备；如最近不开会，有个稿子也就可以摆在那里慢慢修改。

当时，紫阳同志阐述了从追悼活动到他提出辞职（4月15日至5月17日）的一些想法和考虑（另有草稿材料）。我是当天起草，当天晚叫张岳琦同志转紫阳同志的。

这是我为紫阳同志作的最后一件事，此后，我没有见过他。（《鲍彤“六四”密件：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

5月25日

据《真相》载，

二十五日凌晨三时，万里的专机抵达上海。在虹桥机场，万里受到了江泽民、朱镕基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公琦的迎接。随后，江泽民等与万里一起前往西郊宾馆，江泽民亲自将中共中央给万里的有关文件呈交给万里，并简单地向万里汇报了北京的情况。

一同等在机场的，还有丁关根和万家子女里边最为出类拔萃的老四万季飞。^{【51】}

据陈小雅：当时有消息称，上海学生也拉了一个大的队伍到机场。逼得执政党不得不玩起地下党的老招数：

江泽民和丁关根商量后，用了一个掉包计，万里在上海虹桥机场下飞机后，不按常规去西郊宾馆，而从机场侧门出去，住在市内宾馆。同时，却安排了另一车队将万里的随行工作人员和市里迎接人员接到西郊宾馆。（《八九民运史》）

此次万里出访，一头是小平同志交付的对美外交大任，一头是国内危殆诡谲局势。万里所经受的内心煎熬，至今未见档案披露。

但他终于应召提前回国——安抵上海而非北京。此时面对的，已经是一个高层领导口径统一的局面：“中央派丁关根同志到上海迎接万

【51】万老四为什么到场？可对比5月17日邓宅会议后，赵紫阳召开的紧急家庭会议。他对家人说：可能坐牢，一定对你们有影响……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犹豫，支持他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决定——可见，原本正常政争，为取胜，以亲属待遇要挟，正是中共自延安整风之后的惯用手法。

里同志，向他传达中央5月17日会议情况，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李鹏“六四”日记》）

中国本届人大委员长，此时已处于全世界政治聚光之焦点。

这名最早冲破毛之樊笼、推进改革的先锋，其观念——无论黄金十年，还是这回“在民主与法治轨道上”对待学运，与赵紫阳基本无二致。更何况他的个性：耿直、坦诚、好胜、宁折不弯……让他违背初衷、“站到党的一边”，彭真、杨尚昆出场都悬——谁有这资格、这本事？丁关根！但那时节，正在计委和对台办当差的丁某，与人大毫无渊源啊……。

丁同学正宗交大毕业生（1946 - 1951），一直稳当低调地在铁道系统任职。1982年秋，在小平一跃入常、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二大《开幕词》）的时候，丁同志的官，不过铁道部计划局局长助理。这位心思缜密、乐天随和、秉性尚醇厚，特别是“领导跟前没见解”的小个子技术官僚，到1983年，突获火箭式提拔——五年间，已经升至政治局候补委员、铁道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无奈此位子尚未坐热，铁道上出了大事故，不得不引咎辞职。咎了平民乘客，丁同志的官接着升，只不过调到了人大代表弹劾不着的系统：中央书记处书记、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对台办主任——直到此刻担此重任。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确确是不辱使命：万里同志站到了党的一边。

但是，万里怎么就听他的了？

1983年，胡耀邦还在跑深圳、赵紫阳还想着怎么让中国容纳“商品经济”，人家关根已然经万里引见，以“算力上乘、配合默契”，上了小平同志的桥牌桌；一年后，更是顶替聂卫平成了小平同志的铁杆搭档。自此，老爷子的四人组就很少输过。

6月3日晚，在南长街口遭38军子弹射杀的少年王楠，是他的外甥。王楠妈妈张金玲，“天安门母亲”之一，一直坚持抗争。但关根对小平同志的忠诚与钦敬、拜服，绝对胜过区区亲情。对此，牌桌上两搭档心中都有数。

据陈一谘说，十三大结束时，邓朴方让他转告赵紫阳，建议他“要注意和万里、李瑞环、江泽民、丁关根搞好关系”……陈直接向赵紫阳说了朴方的话，他非常感谢。（《陈一谘回忆录》）

镇压之后，这位立了大功的桥牌高手进了政治局，接着再担大任：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有他坐镇，胡乔木邓力群者流，再没能像1980年代那样搅事儿——舆论大权牢牢回到小平同志手里。

在这个位置上，他依旧心思缜密、乐天“随和”、忠贞不二，直坐到2002年，尊贵搭档离世五、六年之后。在这个与他的专业（包括更为重大的桥牌）毫不搭界的位置上，丁先生淡定应对自由派，遂获一声形并茂的绰号：盯、关、跟。

虽然低了头——或许仅仅出于邓万两家之亲密——万里，这名曾经的有理想却无心机的改革家，其意气风发的仕途，从此画上句号——余年，也就管管绿化和桥牌。但是……让我们等着这百岁老人的自述吧。

5月26日

陈云主持中顾委常委会，“向全党、全国人民表态”。这是他荣任此主任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临主持，可见埋在心底的自豪。会上放出豪言：

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2000万革命先烈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就会变成资本主义。（《陈云文选》第三卷）

哈，此说，与他那句“还是把权交给自己的孩子放心，起码不会挖祖坟”堪称双璧。

到会的22人“一致坚决拥护”，包括曾经致信反对戒严的上将。83岁的陆定一没有像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那样拍案而起，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张爱萍、黄华等五人“因事因病”请假。

“中顾委”这阿物儿，在“没了个毛泽东”^[52]的中国，开场、收场都随着邓小平转。表面上看是退休制度没有建立之前的过渡，深层原因是对毛泽东错误——至死不离开最高权位——的深恶痛绝；再深一点，则是“陈云（资格在邓之上、经济上很有一套）怎么摆？”、“老同志怎么摆？”、还有最要命的“待遇”这类大难题。

但几十年下来的位子有限。那就造新的？也不敢多造。于是有了（到今天还因其权势无边吓死人的）中纪委（陈云主任），以及中顾委（邓小平主任）。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相当清楚判读自1980年代起，党内高层权力博弈的内核之所在：特供（这已经令平民气愤不已）再优渥，若跟权力寻租比，就什么都不算。

这是中共1980年代以来最为深刻诡异的故事，这里先放下，容当后叙。

这天下午彭真在丁关根、阎明复陪同下，与列位非党员副委员长的“座谈”，已属中共运作娴熟的统战应酬：喝杯茶、摆摆花——七位德高望重民主党派领袖当然稳练旷达、一致拥护。

5月27日

由党为人大委员长起草的《万里书面谈话》发布：

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同志和杨尚昆同志五月十九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国务院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赋予的权力，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符合和维护宪法的，这对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支持国务院采取的这一坚定措施。我相信政府能够妥善地解决问题。我们的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做好维护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李鹏“六四”日记》）

[52] 与几亿人高唱的“出了个毛泽东”对照，人“没了”，章程咋办？中顾委应运而生。

无一字脱开党八股。在表了与党完全一致的态之后，委员长宣布那千呼万唤但已然打针吃药退烧降温无甚危险的人大常委会议，将于6月20日左右召开。

至此，红色中国党治天下的各条经脉，疏通完毕。

这天晚上，八老再度聚会邓宅。讨论上次（21日）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策立新君。

戒严令发布已一周。对邓而言，第一，局势紧迫，没有时间缜密部署了；第二，谁上位，陈云李先念他们功课做得远超过他。遥想这两位倒胡倒赵经年，左右自有马屁精，心中早已攒出替代人选。而对赵紫阳相当满意、还想让他再“做两届”的邓小平，准备自然不如他们。

选拔原则话音未落，李先念已经叫板：

小平同志，大家想听你对总书记人选的考虑意见。

小平的回答简单而平静：

比较来比较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的确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我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总书记人选上，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于江泽民同志，大家有什么见？

不错，从三万大兵入京受阻，邓已打算让步：这里的“让步”，依旧挟带着“不让”之两条：第一，军队还在我手里；第二，强调新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陈云的态度？军权，他莫奈何。但对第二条，他做出补充：“要敢于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表示认可他们提的江泽民，但李瑞环要入常。其他人跟进。

在敲定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六人）的同时，“总设计师”相当动感情地给出条件：

新的领导班子一定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

话是如此说了，没了赵紫阳胡启立，没了万里阎明复，特别是没了联系社会各阶层、起草报告、制定政策、衷心拥戴改革的整套班子，以及政界、学界、新闻出版界一整批在改革开放春风沐浴下一步步融入世界价值体系的学人和企业界精英，请问怎么“不变”、怎么“不动”、怎么“讲到底”？事实证明，不过两年，他自己对此已经察觉：虽然红旗照飘、“小平同志”依旧给捧着，胡赵两任在他的支持下开创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局面不仅变了、动了，已经根本没可能前行“到底”。

不落到如此局面，又长了三岁的老爷子，怎么会自己不惮辛劳南巡、隔代指定接班人？

直到今天，还流行在顶级红色接班人里边那套什么谁可塞进、谁必剔出、谁是第几代等等说法，正源于这次邓小平对“成熟领导集体”的论述：

我们党从毛刘周朱开始，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个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他本身没有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 we 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要让这个第三代取信于民，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

想来，陈云对此未必认可。他认为自己属于毛的一代，共产党拿下政权之后第一代领袖。之后的第二代，以你所说，莫非是“改开邓时代”咯？

陈云没有吭声。

据张良记载，这次会开了五个小时。快到尾声，薄一波感慨式发问——正合了丁关根对李鹏说的“……大军压境……”，真真泄露了老邓调兵的要害——广场上那几千人，都快忘了吧？

很多同志说，戒严部队不进城是个问题，学生老留在天安门也是个问题。现在好了，党内的事情确定了，应该考虑如何结束动乱的问题了。我在想，这步棋该下，下好它却不容易。
(以上对话，《中国“六四”真相》)

至于邓颖超强调“用温和的办法解决问题，劝说天安门广场学生回到自己的学校去”；杨尚昆强调“要坚决制止动乱，又要坚决避免流血”，或许列不进此会主调。

吆喝了一个多月的“黑手”，终于在这天揪出：谁——竟然是1980年由中组部选派，担任总理秘书、总书记秘书、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的鲍彤！具体动作：李鹏将一份安全部报送的“最高机密《要件》”，紧急批阅后立呈小平、先念、陈云：“鲍彤泄露了戒严的最高国家机密，蛊惑人心。建议立即予以法办。”

收到这份《要件》，邓在八老会结束前，主动提起。他说：“鲍彤这人我不熟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责难逃。李鹏主张立即法办。”

不熟悉？两次精彩讲话起草，都忘了？学运开头，在游行要求彻查康华公司的时候，邓家女眷专门找到总书记大秘鲍彤希望通融……居然碰壁。当时还丢下一句村妇骂架的狠话……回去没对老爷子说么？

或许这些都上不得台盘。此刻既然邓发了话，李鹏立即亲自下达逮捕令——中组部部长宋平现场执行：谈话后，直接押送秦城^[53]。

注意：时至今日，八老们对赵的处置，只是“出常”。党龄五十年，赵紫阳，能否依旧留在政治局？留在中委？留在共产党内么？

从这天起，赵紫阳开始了软禁生活。

[53] 6月2日，赵紫阳对如此非法行事提出强烈看法。有关部门受命于6月10日补办“监视居住”手续。

5月28日

晚上，据李鹏自己说，他在这天见了丁关根。谁约的谁？日记没明讲。逻辑推断，应该是对“总书记须从常委递升”仍怀切望的这位：他急于打探昨天的消息呀。

当然，在准备公开发表的日记里，只有如下描述：晚上，我和（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的）丁关根同志谈话。丁关根对我说：

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

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

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

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你们态度坚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下台。

到5月19日因赵主动辞职，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写道：

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陈云和李先念同志还先后对我说过，国务院任务十分繁

重，你已经开始熟悉这一工作，比较之下，由你继续担任总理更合适一些。（同上）

至此，从表面看，李鹏是死心了——虽然江泽民登上宝座之后，为安抚他，还巴巴地把视察三峡工程，作为晋位后的第一动作。当然江做梦都想不到，20多年后，在三峡已成为全国共讨之的灾难工程之后，李鹏会反过来把这屎盆倒扣到自己头上……这是后话，有机会细述。

5月29日

据李鹏这天的日记，政治局常委已经全盘接受“‘五二七’八老决议”。对广场——

再次明确由乔石分管戒严指挥部。

大家还重点讨论了如何清理被动乱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既要进来，又要尽量避免发生流血冲突，这是当前最难处理的事。

包遵信披露出一件他在这天亲历的事：

深夜回家，他发现何维凌留下的一张条子：“无论多晚回来，都立即回电话。”老包立即拨打，接通时已是午夜。何接听后立刻赶了过来。

一见面，何维凌就说：能否劝王军涛他们，动员学生月底撤离。原则是“别让老爷子一口气咽不下去”——读者诸君还记得马尔克斯的小说、还记得比照此小说的“4·26社论”：《一场事先张扬的武装镇压》么？老爷子“气咽下去”了，杀戮或许能制止——办法么，何维凌给出的是，“广场打扫出一块地方，学生代表和军队长官都讲几句话，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团结和解的气氛下把事情了结”。

老包问他，你到这里得到谁的指令。何说“都跟朴方说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的首肯，杨家也知道”。（《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槃》）

5月30日

早晨，包遵信赶往文化书院（“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临时办公地）。大家听后觉得事关重大，当即决定了具体联络运作人：刘刚、刘苏里、王丹——其实刘刚他们这几天一直忙的，也是这个：人员撤出广场，让军队白来一场。

包遵信立刻给何维凌回电话——再也无人接听。“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老包写道，“他从我家回去以后就被捕了。”

那时，是5月30日的丑末寅初。

何维凌，“六四”之前即遭拘押的第二个人^[54]。逮捕令谁签发？也就是说，谁不许邓家的代表出面制止可能发生的惨剧？

25年后，何维凌挚友黄晓京说：他是为斡旋和平解决广场危机遭遇秘密监禁的。（《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

斡旋和平解决为何遭遇抓捕？

前一天晚21:00^[55]，由北京市局出面，^[56]将其秘密逮捕，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安置在密云水库北京市局招待所。如果说抓捕何维凌，是因为他与索罗斯的关系，下手的，应该是安全部啊。^[57]更为令人难解的是，他这次斡旋，可说最接近功德圆满：从最激进的广场领袖，到发令的邓老爷子，都联络了，甚至都点头了。那么，如若斡旋成功，谁不高兴？此人（或者此势力）能指挥公安部（或者北京市局）？

若从何维凌在“监视居住”期间受到的超乎寻常的优待：一周后即可电话与外界联系；接着，亲属与朋友都可以到监禁地看他；他可随意写作，手稿可方便带出；1990年，第一批获得解除……能不能这样看：

[54] 在他的《回忆录》里，陈一谔也写到这节：5月29日下午，维凌兴冲冲地找到我说：“我干了一件大事。我想了一个办法动员学生，比如明天晚上10点全部撤出天安门广场，再把广场打扫干净，表示欢迎解放军进城。而后，开一个联欢会，由军队代表和学生代表讲讲话，造成和解的气氛。朴方很赞成，老爷子也首肯了。”并说马上去斡旋。（《陈一谔回忆录》）

[55] 此时间为何维凌司机提供，与包遵信所说有异。包认为，何离开他家，已经是5月30日午夜。

[56] 也许是公安部。因为何案的“专案组组长”林警官，是从天津调来的。

[57] 时至1989年5月，索罗斯开放基金会中方主席，已经是国安部副部长。

他对小老包说的“朴方、老爷子、杨家”的“首肯、知道”等等，不是谎言，但可能只是他们一时的认可，随即又有了新的意见……比方说，“光压境，威力尽显了吗？”，比方说，“你怎么知道联欢之后这帮家伙回去两天又呼啦啦过来了？不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但何维凌，怎么说也是朴方密友。但也不可以太活跃了。公安部门得到命令对他拘押，其实是限制性保护？

这天，尚存理智的知识精英们艰难运作的“全体撤出天安门广场”计划，在最后一刻出了意外：柴玲本应依照先前约定方案，高声读出以“大游行”的方式撤离广场的路线和各地区同学暂驻北京不同高校的方案。不想到那一刻，她不仅没有履行集体决议，反而说：

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不是我们广场指挥部的决定，也不是我们坚持在广场的广大学生的意愿。

说着，挥手指向刘刚、刘苏里一千人：

而是他们，那些所谓的精英们的意见。（刘刚《再谈一下我同柴玲关于5月30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争论》）

至此，交火之前撤出的努力，包括实施计划，全盘落空。^[58]

接下来，广场“自由村”安营扎寨、民主大学成立、民主女神像耸立……“郑义等人所期望的庆典似的成功革命”，已见曙光……

有文章说，柴玲成功逃脱赴美之后，接受访问时，对她当时的举动曾作如下解说：是赵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抑或智囊，授意她这样做的——大“地震”后，赵身边还任何人在上班么？或者，有什么人顶他们的名在联络广场学生，阻止撤离？

多数人是干着急。据李鹏5月30日记：

[58] 也有记载：广场指挥部（李录、张伯笠）与军队（中共中央、戒严指挥部的代表）正式接触，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客房里，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

下午，王震同志握着手杖颤颤巍巍地来见我。他对当前局势很着急，他说要带领自己随身警卫人员到广场和动乱分子硬拼一场。

李锡铭的办法比王震的可行，但常委拿不定主意：

晚上，我（李鹏）主持常委碰头会，北京市委提出组织百万工人大游行方案，以显示工人反对动乱，支持戒严，结束当前僵持的局面。李锡铭表示市委对组织这样一场游行有把握。但是我们都感到北京市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没有对此建议做出决定。（《李鹏“六四”日记》）

广场“前敌”一线的纠结纷扰，都端不到总设计师的棋盘上。本来，他认栽、退一小步，为的是往前跨一大步。怎么样的一大步？

依照他的布局，这天下午，江泽民从上海抵京。到机场接机的，陈云大秘许永跃。

江被安排在中海休息；打发“没事儿”的由喜贵暂时招呼。^{【59】}接着，由温家宝带着，去见陈李两位——温情之中，时时闪着胜利的喜悦？

张良记载，这天，小平同志从米粮库胡同迁往西山——仅仅出于安全考虑？已知的确切事实是：接下来的两个重要谈话，已经安排：上午，江泽民；下午，李鹏、姚依林。

5月31日

这天，是前阶段遭受挫折的邓小平，为保住他开创的改革开放，放出的压轴手段。

【59】 由此时在中办警卫局任处长。自此段经历之后，1990年即晋升为少将。接着担任中办警卫局长，并接连晋升为中将、上将，及中共十五、十六届候补中委。

在西山驻地，可以想象的是，他如何把江叫去：不错，你是他们挑的。我同意了。上来之后么……他是不是说了“已经传邪了”的这几句【60】——

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不会这时候就说吧？

张良的披露是：邓与江的这次谈话，“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有江泽民本人知道”【61】；或谆谆，或峻峻，也许就是必须改开的几句套话，但新君进京聆昭，谁人龙庭法旨，这最重要。

李鹏和姚依林——一个多月来，冲锋陷阵斗士喔。这回单挑他俩过来，显然十分重大。因为，宣教结束前，小平同志说的最后一句，竟然是——

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此外，这几个细节，也十分耐琢磨：

第一点，这天谈话，按照李鹏记载，主题是“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这场权斗的第一重头，必由小平亲口通知他俩，而非得意的陈和李！

第二，这天的谈话对象没有乔石。我们已经知道，在5月27日第二次八老会上，定下了三旧三新加起来六常委。这天，光李、姚两旧人前来，为什么没乔石？想来，对于原先的五常委里，谁在搞事，小平同志心里是有数的。

【60】 据萧克对李锐说，他看到文字，谈到江泽民接班的时候，邓对江讲了三句话：毛主席当家时是他说了算，我当家时是我说了算，如果你当家后也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邓小平时代》）

【61】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的是：萧克曾对李锐说：他（看到文字），谈到江泽民接班的时候，邓对江讲了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此话，到6月16日，当邓代表政治元老，召集新的政治局常委班子谈话时，又公开说了一次。（2013年9月20日对李锐的采访）

第三，李姚这边西山聆教；那边“海里”，居然大佬齐集——李先念、彭真、王震、宋任穷等，还有尚昆同志。最不寻常的，集聚在哪里——陈云家！这是毛时代，包括江青发飙时候都没有过的。谋大事，还是逗逗闷儿散散心？

第四，小平特别谈到“胸襟”——别再斗个没完了，行么？

张良在他的书里给出了这次谈话的“择要摘录”，现全文引录如下。邓小平一开始就谈改革开放，说：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正如在中共元老会议上邓小平把陈云、李先念摆在前面，这次，邓不得不再施故技。

接着，邓小平专门谈了结束动乱以后，应该如何做的问题，邓说：

第一，动乱平息之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做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优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次事情总的说还没有完啊！目前学生还没有上课，就是上了课，也还会上街。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

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总之，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接着，针对李鹏、姚依林的保守，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改革开放要大胆一些的问题，邓说：

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

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邓小平说：

今天请你们来，让大家考虑一下这个论点对不对。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要惩治腐败，并体现我们不但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

心里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末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要看到这个大局。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对四月中以来，学生市民怎么一次次上街，小平脑子里基本一团浆糊。

接着，谈大局，谈斗争经验的问题，领导班子的成熟问题，并强调一定要干出实绩，不能闭关锁国。

邓小平说：

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人都有缺点，我们在座的人都有缺点，别人一样也有缺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弱点。当然缺点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

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

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

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

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邓小平特别谈到“第三代领导人”要如何取信于民，领导人的胸怀与眼界问题：

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

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过去毛主席就曾经长期敢于用反对过他的人。

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人都是有缺点的，进了班子后还可以继续改进。

针对“动乱”平息以后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一要尽快树立良好形象，二是处理人与事，不能涉及太广。邓说：

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

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份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

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

这不全是紫阳当初的意思吗？不全是赵出访回来之后，想做而且开始着手做的么？

讲到这里，邓小平又回过头来讲胸襟的问题，再一次向李、姚敲警钟，并希望他们“自觉地变化”：

进入中央常委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向。

为了防止李、姚在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结盟，形成另外一个核心挑事，邓小平毫不隐讳地提出了不能搞宗派的问题。他强调：

还有一个问题，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你们是要在第一线顶着干工作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一点。

讲来讲去，讲到最后，邓小平终于向李、姚亮了底：江泽民将担任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要求他们很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

邓小平说：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中央决定，江泽民同志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希望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不要互相不服气。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以上邓的发言，《中国“六四”真相》）

广场继续乱。三名工自联负责人突然遭抓捕；接着北京市总工会发表声明，要求取缔“工人自治联合会”。这引得三千多大学生从历史博物馆出发，先绕广场一周，高呼“爱国无罪”、“反对暴力”、“还我同胞”，接着到北京市公安局、市政府、公安部，口号变为“李鹏下台”、“陈希同下台”、“李锡铭下台”……

北京市委穷极无聊，组织郊区三个县农民游行；远郊县二十多万农民也游起行来——“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所做出的正确决策”。

以上，太重要了——邓最基本的东西，或者说，可以而且必须拿到面上的东西，都在这里了。里子呢？

这天，邓小平、杨尚昆批准了戒严指挥部关于部队进入北京市区执行戒严任务的实施方案。

回应军方请战——“不计一切代价”地“镇压暴乱”。

万里回京。到西山陪邓玩牌。

第七节 镇压“反革命暴乱” ——平民之血

6月1日

这天是儿童节。不少小朋友来到天安门，还上到了纪念碑。

驻扎广场的大学生也玩儿得很欢脱，放起“李朋鸟”“尚昆虫”样子的风筝/气球。

《北京日报》刊登（中宣部化名）文章《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神圣的天安门广场不容亵渎》，又引出北大、科大、人大等校千名学生骑自行车游行。

本来载着女友显摆的愤青“飞虎队”，也变成“拼凑敢死队堵截戒严部队，调集流氓痞子冲击北京市公安局”。

这厢，广场领袖为分钱不匀打起来；那厢，刘晓波等四君子也来了……面对广场乱哄哄的局面，挑事的，和真、假息事的，都在活动。

上午，国务院召开“校长、教授、专家座谈会”，讨论对学生予以宽大处理的《十条政策》，即所谓王丹、柴玲等广场领袖从一开头就喊的“秋后算账”：赵在位的时候不讨论，直拖到此时。而此时讨论，也是套话堆积，毫无诚意，当然无结果。李鹏结论——党和政府所作的“以和平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在喧闹的广场大面下边，真正的活动正在展开：就在这天，三份报告，通过李鹏，当天送达全体政治局委员。

一份是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的报告。“极少数人要进行反革命暴乱”，就是这里第一次提出。读史人或许记得，4月24日那次会，“动乱”二字的

启用，也始自他们。这回么，“暴乱”！而李鹏自己这天日记的标题，就是“从动乱到暴乱”。

和这份报告同时提交的，还有国家安全部《关于美国等国际政治势力对我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这场运动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真正目的就是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云云。

戒严部队指挥部在这天也向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提出报告：

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了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准备，只待中央军委的命令，即可开赴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通观中外军史，军队，服从调动听候命令而已。用得着玩这一套么？

政客间是有的。“高调表忠”者，其要，并不在“忠”，而在“表”。而且，这“表”里边，一定有自己的企图。自家企图达成，忠不忠无所谓啦。这里，政工出身的杨白冰想干什么？除了表忠，有没有“不干它一场，怎么显得出我”的意思？

这份“请战书”，加上上边两份关于“暴乱”和“外敌”的报告，是李鹏在第二天向元老汇报的重点。也可看作是促使邓小平最后下达天安门清场命令的重要依据。

有趣的是，在晚上的常委碰头会上，鉴于那几个报告，李鹏痛感“时不我待，再不清理实在不行了”。但大家认为，由工人纠察队出面清场比戒严部队直接清场要好。会议遂确定：以工人纠察队为先导，戒严部队为后盾的方式清理天安门广场。（《李鹏“六四”日记》）

但戒严部队指挥部已然动作起来：

随同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部队进京，实施战争时期的“靠前指挥”。

军、师一级，按照战时规定，设立

“前进指挥部”（军博）

“基本指挥部”

“后指”

“解放军戒严部队 / 清场指挥部”（人大礼堂）。

更有趣的是，居然直到这天，总参测绘总局地图供应办公室，才接到戒严部队前指紧急电话：

奉命即将开进天安门广场，一天后急需大比例尺北京市区及近郊图。（梁策《坐标中心，在天安门广场》）

当然接下去的就是干部战士们如何加班，高效率完成等等——有这么打仗的么？

部队无图，如何找到“冲击出发地”？本是常识。难道“戒严部队前指”连这都不知道？想当初，1936年9月，你们这回奉命平暴之大军的老老老前辈——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在毛“察觉”张国焘意图，决定打出“北上支队”旗号夤夜窜逃之际，叶剑英当机立断偷的什么？陈昌浩的地图啊。

但是，出这样的纰漏，是不是从另一面也证明了：此前，杨尚昆等，的确没打算动真格的；或者说：被紧急征调的部队，也不知怎么回事；以及，虽然迟浩田总长是“戒严部队指挥部”成员之一，总参有关部门，没有参加。

6月2日

宣布戒严第十三天。

在这十多天里，党内顶层人事调整，各派势力已达成一致。中共元老决定清场——邓小平主持。陈云没有来，但李先念、彭真、王震到了，杨尚昆与薄一波自然必不可少。留任的三常委出席。江泽民没到。

主题——迅速制止动乱，恢复首都秩序。对天安门清场做出决定。

暂任的“党中央一把手”李鹏做开篇报告。他的依据是昨天北京市委和国安部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

在他“对局势的汇报”里边，主要攻击的，已经不是赵紫阳的严重错误，变成了“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广场指挥

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飞虎队、敢死队）、境外反对势力（美驻华使馆人员、中央情报局特工、台湾国民党特务、中国民联、美国之音、港台报刊和电台）、港台财金支援。

“暂任”最后给出结论：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次动乱是国内外一些反动势力勾结的结果，目的就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在李鹏汇报完以后，王震第一个说话，气不打一处来：

他妈的，这些狗崽子！竟敢在神圣的天安门作践这么久，真的找死啊。小平同志，对这些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派部队去抓，人民解放军干什么的，戒严部队干什么的，不是吃干饭的，就是抓这帮反革命的。不抓不足以解心头恨，不抓不足以平民愤。谁要推翻共产党，谁就死无葬身之地。

李先念通过国际大势来解读中国，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确实希望中国乱。它们不但希望中国乱，也希望苏联、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乱。它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无孔不入：

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哪里能有今天的中国？我们用一千多万革命烈士流血牺牲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十年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不能毁于动乱。

他认为，纵容动乱就是允许搞资本主义。这样，中国一切的希望都将失去。

李先念其实话中有话：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这个场合，邓没有接这个茬，像是更加高屋建瓴地同意他。后来，他对戒严部队说的那句名言“国际大气候”，这回是第一次提起。当然后来为了对仗，又加了“国内小气候”。

邓的原话：

先念同志说得对，这次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现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这番话，逻辑上是混乱的。因为，属于地缘政治的“霸权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煽动动乱”，本不是一个领域。看来，他的火，还是在“自由主义”，不过披挂上了吓人的政治符号：

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现在我们比过去更清楚。

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主权。西方那些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谈人权，他们剥夺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

“国际上的大气候”——1840年就开始了。老外打那一仗的目标可是“五口通商”。没有一个字关注中国百姓的人权。中国国民基本权利遭受全面褫夺，从私产、迁徙、言论……连带生育，谁干的？

接下来发言的薄一波，完全同意“和平演变”说：

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

务实的彭真同意“稳定”比什么都重要。他认为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戒严非常必要。接下来，邓小平讲了一段很特别、也十分重磅的话。他先说：

不要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

接着又说：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西？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

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

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什么势力会造成内战？他说：

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不只是对我们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好家伙，这是说什么，“民主斗士”？局面乱了，谁能拿到权力？谁和谁会打起来？就算当年出了个蔡锷，叫号的、应声的，都是军人啊。

中国若说内战，朱元璋之前、外族入侵先不管它，1920年代的各路军阀割据算一次；再一次，就是他自己从头到尾介入的1931-1950的国共权争了。几十年来，“民主斗士”们，为避免生灵涂炭，除了诸方作揖说和，有谁曾“各霸一方”？1940年代末，地方小军阀找到张东荪，想把自己那点人和枪交给民盟，得到的是峻拒。

在这场合，邓居然罕见地说起自己的失误。失在哪里，居然在“教育”、在“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他真的这么想，还是给自己找个可以顺坡溜的台阶？他认为，因为教育不够，所以：

不能责怪参加绝食、游行、签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这是一条原则，不能改变。要使广大学生放下包袱。

邓心目里的教育，是不是就是爱党爱国拥戴领袖的灌输？与世界公认，包括后来李慎之一再反思的现代社会基本公民教育，完全两码事吧？他也许忘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造反、夺权？这回，吾尔开希们，还有要联络部队、还要“上山”的柴玲，不正是该教育之活样板？

张宏遵说，到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1989年（甚至整个开放改革以来的八十年代），中共政权、邓陈、以及紫阳后立他们，面对的，是半生不熟的中国社会：不懂规矩、不讲信用、无独立人格、忠君、钻营……造反有理、为崇高目标可以不计手段……简言之：不成熟的政府，直接面对不成熟社会。

小平同志心目中的“教育”，与此普适认知，满拧吧？

邓接着还说：

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都应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

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或许他说得也对。但“稳定”——机枪坦克下边的鼠蹊与钳口？务虚完毕，李先念回到广场现实：

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动乱的病灶……要这些人自觉撤离天安门广场是决不可能的。让天安门广场真正回到人民的手中，我们才能真正扬眉吐气。所以，要立即挖掉这个病灶，要立即清场。我建议今晚就开始。

再没有人提“协商清场”——哪怕是在大军压境境况下。

怎么回事呀？从前一天晚上的“常委决定”到这天之“元老决定”，中间有了什么窥探、暗示、明指？

杨尚昆的发言，在一众同志们里边，所表现出的，永远是最冷静明智的态度切合上意：

一个多月来事态的发展表明，静坐绝食者不可能从天安门广场自行撤出，我们的确到了非采取措施的时候了。对于形势的估计，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不管怎么样，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是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的。我们要对天安门进行清场，是恢复秩序，制止动乱，决不是放弃改革，闭关锁国。

大合邓之脾胃口！邓小平：

什么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这一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有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建设容不得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所以，清场的决心非下不可。

主持具体工作的杨尚昆立即跟上：

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机关院子等，都已有戒严部队进驻。对天安门清场，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已经作好了充份的思想准备。经过近半个月的思想政治工作，全体官兵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到戒严的必要和合法。执行戒严任务的各部队都表示，要坚决排除干扰，无条件地执行并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以实际行动证明戒严部队是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到目前为止，各部队都已制定了警戒、防卫方案，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迅速执行命令。来北京后，各部队坚决实行全时、全员、全方位的封闭式管理，管好人、管好枪、管好车，保证了戒严部队自身的团结和安全。同时，各部队广泛开展军民共建工作，增进了与首都各界群众的感情，树立了戒严部队良好的社会形象。所以，我对以和平方式在天安门清场充满信心。

邓最后拍板：

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清楚，责成其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以上对话，《中国“六四”真相》）

何谓“仁至义尽”？何谓“赖着不走”与“后果自负”？在警员清场实施条例里，应该都有明确规定。丁子霖名单里边的百余名死难者，当局“仁至义尽”到了怎样的程度？他们是如何“赖着不走”的？“后果”，您邓小平此处指的，是不是……

他接着命杨尚昆“找军委的同志开个会，传达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我们大家的建议”。

命李鹏将此会向陈云“通个气”。（《中国“六四”真相》）

下午，杨尚昆召集“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根据政治局常委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决定，发布6月3日零时进入“攻击出发地，向警戒目标开进”命令。16时，发布“如遇阻拦，采取一切手段”命令。

应该说，到这个时候，弓已拉满，回头箭怕是没戏了！著者实在是忍不住，在这里与读史诸君一起回忆1976年的那次——也是出动军队实施天安门清场：

在毛已经认可“邓小平就是纳吉”（国际大气候）“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矛头是对着我的”（国内小气候）的情况下，负责实施的，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

虽然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62]的命令外加一再催促，军人吴忠的态度是：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晚上10点半，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市委书记吴

[62] 1976年1月，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德)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分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但没有死一个人。(吴德《1976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内幕》)

当天,另有一个很值得琢磨的小事。王任重、丁关根来到赵家,说你不是要见尚昆么,中央委托他们来谈话,说“最近要召开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解决赵的问题,要他好好考虑做个检讨”。

这两位,与处置党员错误的中组部、中纪委等,没什么关系:那时节,丁关根是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对台办主任;宽厚、对组织忠诚(但对同志不怀恶意)的王任重,正相当可笑地给安在政协副主席位置上。

在6月2号这日子,清场局势如此紧迫,单单发过他俩过来和赵谈,唱的哪出?

不能不让人联想,这或是邓小平的意思:他不但要探得赵的真实的想法以及情绪,也想知道,都这时候了,你不能软点?而且,有什么要对小平同志讲,就对关根同志说。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如果紫阳此刻愿意如5月19日那样去趟广场,局面或许会缓解?

应该说,可能性非常小:这不是老邓的思路。现在知道的事实是,这张牌,赵没接——“这次谈话,他们认为我的态度很不好”——赵紫阳说(《改革历程》)。

午夜,一辆无牌照但装载器材的武警部队吉普车,在木樨地冲上人行行道,发生三死一重伤车祸——军队进城的消息广泛播扬开来。

6月3日

凌晨，戒严部队按既定计划向警戒目标开进。北京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午夜1时许，市民学生有所察觉。消息传递到广场。广播站发出的呼吁，竟然是“请同学们、老师们、广大市民们立即行动起来，到各个交通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中国“六四”真相》）

据吴仁华：

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一批批呼喊着奔赴建国门、复兴门、朝阳门、永定门、宣武门、木樨地、曹各庄、车道沟、公主坟、新街口、西单、王府井、南河沿、六部口等几十个路口，阻拦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部队这天遵奉的军令，包括携带的装备，与5月20至21日相比，已经完全不同。大家还记得在六里桥，65军那位“两道杠”对北大教师某某怎么说的？这天，民众“阻拦”的结果，可想而知——流血与死伤连连发生，双方。

李鹏6月3日日记：

下午4:00在勤政殿，由乔石召集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理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中央的同志和戒严部队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

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在工人纠察队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但也议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

与李鹏的日记不同，据《真相》记载，这次会议的召集人不是乔石一人，而是“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四人。

会议由杨尚昆主持。杨尚昆做完开场白，请李鹏讲话。李鹏讲话的要点是点明：“从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陈希同对“反革命暴乱”的描述：

其一、武警部队吉普车在木樨地发生重大车祸的消息，被“暴乱的组织者”所利用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进城开道车故意撞死市民，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市民到各路口，阻拦解放军进入市区执行戒严任务。

其二、从今天凌晨起，在建国门、木樨地、新街口、虎坊桥、南河沿、西单等几十个主要路口都设置了路障、拦截军车、围困并殴打解放军，一些军车的轮胎被扎破，还有暴徒抢夺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央机关和一些重要部门受到冲击。

接着，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作了进一步补充。他没有使用“反革命暴乱”和“暴徒”的提法：

今天凌晨，部分戒严部队奉命进赴市区执勤点。开进途中，几乎所有的部队都遇到了市民、学生的阻拦，遇到了路障。一些人砸军车，朝战士们吐口水，我们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被围困的一些士兵，他们的上衣被扒得精光，当众受辱；朝阳门被堵住的四百多名解放军被市民用石块乱砸；虎坊桥着便装进来的一支部队，被人发现后四处追打，现在还有一些士兵不能在大会堂西侧集中，队伍整个被冲散了；被堵在南礼士路的一些士兵被强行搜身。总之，现在戒严部队一些士兵忍气吞声，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气。有一些被羞辱的士兵恨得牙根都痒。各部队正在做政治思想解释工作，以稳定情绪。

之后，李鹏的讲话利用了连陈希同、周衣冰都没有来得及引用的“暴乱”的最新的事例，并提出了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的底线。李鹏说：

大家都知道了。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六部口，那些暴乱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车，并在车顶上架起机关枪炫耀。还公然冲击中南海西门、新华门。刚才中南海高度紧张，被迫向这些暴乱徒施放了催泪弹。所有这些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决不能让这些暴乱分子以为政府软弱可欺。（以上会议记录，《八九民运史》）

关于“六部口暴徒抢劫武器装备车”，吴稼祥的亲历是：

这天（1989年6月3日）中午，我拿著饭盆去食堂打饭。刚走出楼门，被聚集在楼外的一群穿白色制服的大汉们吓了一跳。他们正在狼吞虎咽，我的同事们殷勤地在给他们送水打饭。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陕西精选来的警察^[63]，个个膀大腰圆，功夫精湛。看著他们，你理解什么叫虎狼之师。

他们来干什么？对付正在六部口驾着一辆面包车的大学生们。那辆车是前一天夜里被人开进城，车上放着一些没有子弹的枪支，故意让学生们拦截，制造（暴徒抢夺武器的）“暴乱”假象的。学生们果然上当，现在他们正开着那辆车，车上架着一挺机枪，（学生本意是）让市民看官方和军方的残忍，（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此行为，同时为当局提供了暴徒阻挡戒严的画面）。

戒严指挥部的目的达到了，这会儿要派陕西警察去把枪支抢回来——大汉们吃饱喝足之后，从中南海西门出去，带著催泪弹和棍棒，一路打出去，得手后，从中南海新华门进来。我

[63] 文中“从陕西精选来的警察，个个膀大腰圆，功夫精湛”，或许并非老远从陕西选来，据吴仁华，应是武警部队北京市总队第5支队，作为机动部队，曾多次协助、配合解放军戒严部队行动，包括6月3日下午参与六部口抢夺弹药车的行动。其下属第8中队（防爆机动中队）于6月3日晚上，为挺进天安门广场的第38集团军担任开道先锋。“大汉们”的装备：头盔、盾牌、电警棍、催泪弹……

听到的，就是发射催泪弹的声音。（《真相在文件背后：谈“天安门文件”事件》）

而李鹏在会上说：

所以，我们决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对极少数暴乱分子决不能手软。凡妨碍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勤务的，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一切后果由其自己负责。”

以上诸项，就是“6月3日凌晨，在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事实依据！

杨尚昆最后告诉与会者，他刚才“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

小平同志要我转达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我们戒严部队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清场任务之前，要利用电视、电台各种宣传媒体向北京的市民、学生讲清楚。奉劝市民、学生千万不要上街，留在广场的一定要自愿撤离。总之，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要千方百计尽力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

杨尚昆特别强调：

戒严部队指挥部一定要向各部队交代清楚，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开枪。我在这里特别重申，决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发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不走，我们戒严部队架也要把他们架走。决不能在广场上杀一个人。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见，如果大家同意，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致意见。（以上会议记录，《八九民运史》）

下午，常委和军委——所有与戒严有关各方面——“就严峻局势紧急磋商”，制定清场坚决措施。杨尚昆传达邓小平的两句话和一个意见：

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
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措施；
决不能在广场上杀一个人。（同上）

天安门广场？南北长 880 米，东西宽 500 米的这一片空地儿么？38 军队从西向广场开进，沿途可以杀——杀到何种程度？

接下去，发生了什么？

三十年来，对接下来的 24 小时（以及至 6 月 9 日之间的六天），很多研究者包括亲历者，都给出描述。

这里，仅引入一段当时一名现役军官 Y 的亲述：

……到了 6 月 3 号，整个气氛已经很不正常。

当时已经有通知下来：尽量不要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部队有可能执行戒严什么的，但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时候。

军队的班车已经不能开了。长安街上见到军牌车，常常会堵住。我们那些日子上下班，都是穿便衣、骑自行车。

那天下午下班回来，我发现有军车停在路边，在六里桥那个方向。我拐过去问了一下：是 54 军的车。我找了一个干部，出示军官证，问怎么回事。他说“任务下了，晚上要进城。准确时间不知道。在这里待命。”

知道有行动，我赶快回家吃过饭就又出来，站在公主坟行道树边上。这中间不过半个多小时，发现大街上原先纵向的隔离带，怎么全横过来了——这得多少人干哪？沿途的百姓都下手了。说“部队要进来”，就把桩子都推到路中间，一段一段地，横着摆。

当时，已经有军车停在公主坟环岛那边。看车牌，是 38 和 63 的，想开向京西宾馆方向，进不去。我站在路边，看见军人和百姓互相扔石头。还看见部队开过来一辆铲车，意图把路桩铲开。

这时候，我看见大约100米外，一个女的骑自行车过来，像是机关的下班的，戴眼镜，穿着裙子，白连衣裙。我见她骑过去，跟战士招手，居然把军车拦下来。接着，见她把自行车停到一边，爬上车去和当兵的说……我老远地看着她，军车队停下来好一段时间。

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后边有命令过来，让车继续前行。她呢，像是不让他们走。后来……你知道，她人还在车上，但（得到前行命令的车）猛地往前冲，一下子把她甩到地下。

接着，我看见过来一堆人把她扶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摔得很重。

这时候，铲车开动，哗哗地铲起来。部队车紧跟在后边。路边上的老百姓就往车上扔石头——你知道，部队的车上也是有石头的，预先放了很多，双方对扔。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7、8点的样子：天傍黑，人还看得见。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枪声——不是从天安门方向，像是翠微路、万寿路那边。接着西边的车开了过来。我看见那辆首车，是63军军长带着谁……军长和那参谋我还认识……

我在路边呆了一个多小时。车从我身边冲向京西宾馆的时候，还有一块石头扔过来。但后来就开枪了，而且是连续开枪。再后来，估计车到了木樨地，枪声就很响，也很密集了。

38和63是一块儿进来的。

北京军区这种安排，就是让这两个军——这两个军本是死对头——同一时间从公主坟出发向天安门开进。抢着打，打比赛一样，谁准时到，谁立功，以杀人为比武。哪有这么上的？

27在石家庄，保定是38。63在太原。

63军军长，赵什么，坐在车里跟着第一梯队往前冲。前边几十辆车，后边就是军长的车，比着往里冲——两路。

最早到是38。我看见了。38往里冲得最厉害。

在六里桥，我爬上车问了，知道今晚部队要进城，但是根本没有想到会开枪，而且这么肆无忌惮。因为真用不着啊！

这样安排、指挥，杨也好、军委也好，基本就是没人性。你有没有想到，夜间，如何对付赤手空拳平民？我们的野战军是没有这种训练的。

当时部队农村兵为主，他们哪里来的——上千公里外。北京啥样？立交桥怎么走？

记得当时站在公主坟往东这边大街上，想着——我倒要看看，这是要干什么。最没想到的，居然开枪了，而且是真枪实弹——说空爆弹，我一看就知道是真子弹：前面出火花，打到地上、墙上，56式冲锋枪呀……部队就像打群架一样，闭着眼睛打。所有人，裹胁而下，再有人性的战士，你也得打了，没法控制。

你让他们来处置这样的民事问题——懵头懵脑的农村战士，面对着一腔热情的学生。你告诉他们你是人民子弟兵，前边面对着的是暴徒，与对敌作战有什么不同？战士知道什么？干部也不知道呀——当时说得很重，“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境外敌对势力”、“推翻共产党”、“改变中国的颜色”、就和上前线打仗一样，“表忠心”，战士听了，认为就是使命。

但面对的学生市民——这样的敌人？白天，为什么部队停下来了？因为眼见民众在劝，对方不是坏人，怎么能开枪？到了晚上，农村兵，脑袋被扔过来的石头砸了，你给他枪，让他开，他会怎么样？打架的时候，谁拿着枪都会开。子弹射出去，都不知道伤的是谁。

我听得很清楚：在公主坟，砰砰几枪；从京西宾馆那边过来；到木樨地，枪声密集。再听，怎么太平路、翠微路、万寿路、永定路、五棵松这边，也响起枪声。怎么南边，也响枪了。

我知道全面打了——非常严重。我转身回家，立刻就给一位老师家里打了个电话，把刚看到的都说了：部队今晚进城，而且，开枪了！打死人了！你们出来看一眼，不要错过这个历史机会，做一个自己的判断，会永远记在心里。

打电话之前，我看到海军司令、副司令们，穿着便衣，都到路边去看了现场。

著者曾多方向职业军人请教：你们觉得，“不计一切代价”命令，谁发的？6月3日晚上么？

他们只能按经验推测，综合起来，当年军人的大致印象是：

通常没有文字命令，就是电话通知，“请示电话通知”，谁也不发文字命令，一级级传下去。

各军区、军，他们这样说：军委就说“几月几号出发，什么方向，几点几分，到达天安门广场”。接着，就给各军布置了。

到军一级，可以再加码，各军各师团自己下达的命令就是这样的。

前线执行任务的戒严部队士兵又是什么状态呢？一位某军的军人：

晚上（6月3日）……我们坐在卡车上待命。整整一个白天，没吃没喝。到晚上10点了，还堵在那儿（木樨地一带），走不了。那次给下的死命令，是12点到达广场，否则军法处置。

正着急，见有人从22号楼，用小口径步枪向他们射击。这第一枪，并不是我们解放军先打的。然后，我嚷了一声：抄家伙！接着跳下车，朝天开枪，这是我打的第一枪。

车上兵也跟着下来，先往地下打，从地下反弹的子弹，打到了围观的人群。这时有人喊：别怕，解放军用的是橡皮子弹。于是，市民继续围着，阻拦前行。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横扫。但也不是连续不断地扫。因为前边有人中枪，见血了，后边的人就散开了。到这时候，我们根本就没再上车，而是朝前跑（朝天安门广场）。只要枪击一停，人群就又涌上来——北京老百姓就不怕死！后边人不知道，还以为是橡皮子弹。我们只好重复地开枪：朝天、朝地、

横扫。^[64]真的不想伤人，只想警示，结果……没办法呀……就这么停停跑跑，终于到了广场。^[65]

到广场之后，才见到团长呀什么的，都出来了，部署谁在哪……这才知道，到这里的，不光我们军，而是每个军抽调一个团。然后集合，宣布纪律：广场（即栏杆围起来的）内，绝对不许开枪。谁开枪谁违反纪律。但是广场外边，比如马路上，不属于广场。马路上，要是谁阻挡清场，就可以朝他们开枪。

一到广场，最迫切是憋尿——朝着金水河就撒。就在这时候，人大会堂的北门、东门突然大开，军人潮水般地从里边涌出来。咔咔咔前行，推倒一切障碍。这时候，听见侯德健他们在喊；看见他们过来谈判；看见东门出来的兵砰砰枪击高音喇叭……

广场本来灭了灯，这时突然嚓的一下亮了——开始清场。这个时候，要是有人有阻挡，是会开枪的。但自己很注意：在广场过马路的时候，想着：我不能打死人。也是在这时候，我突然悟出，（今晚将伤人死人）是有准备的。因为，就在这同时，从天安门两边的过街地道里，上来好多穿白大褂的，要是有人受伤直接就抢救。所以这里是有准备的。

开始清场。确确实实，在天安门广场内，没有尸体。帐篷，基本上也都是空的，人已经撤了，从广场南侧，都撤走了。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基本上清完了。

这时，命令我们“从西边进来的”，全部进入中山公园。真正恐怖的，是在中山公园。

到了公园里，已是极度疲劳：一天一夜没睡了，人好像不知昨天干了什么，有些人有点精神错乱，拿着枪扫射起来。好些战士就是在这时候被自己人打死。当官的急了，立刻朝天开枪，同时命令“把枪放下”，全体缴械。

[64] 木樨地 22 号楼副检察长的女婿，或许就在此时中弹。

[65] 据吴仁华：凌晨 1 时 30 分，将西长安街杀成血路的 38 军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部，集结在天安门城楼前。随队指挥的北京军区副司令齐连运兴奋地通过电台向清场指挥部报告情况。从公主坟到广场约 7 公里，38 军花了 4 小时才抵达，可见民众是如何奋不顾身地阻拦。

在中山公园里死多少？根本不知道。后来就是缴械。

在六月三日下午的会议上，至少有多名决策者提到了侯德健等四人的绝食，没有人想到他们将在关键时刻起到的关键作用。

晚 10:00，各路部队奉命开进……

这天，曹思源、高瑜被抓捕。他们一直在分别运作人大常委会提前召开。民间法学家曹思源遵循的宗旨：“开会总比开枪好。”

长安街上、天安门和平民又看到了什么呢？当时的军报记者江林决定无论如何要去看：

我想知道，我们穿军装的军人们是如何举起枪射向自己的同胞的；我想知道，我的同胞看着他们的子弟向着自己射击，内心深处涌动着的是什么情感？我想成为这次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向我的读者报告他们最关心的事实。我出门走向街头，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因为我是记者。

我告诉了张胜。他说，那我就跟你一块去吧。他一说，刘含妮（妻子）也说要去；他儿子小亮也要去。我们四个人，骑上他们家的自行车……

先到木樨地看了开枪的惨状，然后我们沿长安街一路过西单、六部口，想从西华门那边进到午门……

还没走进去，就被一群手执高压电警棍的武装军人挡在东西华门之间的公共通道上……

他们挥棍就打，先击中我的背部，一股强大的电流和刺痛把我打倒在十几米外的空地上，紧接着第二棍，第三棍……我至今清醒地记的，那种痛，是非人能忍受的。不远处，一个行人被打得惨叫起来，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叫声，这是一种死亡前绝望的声音。

当时，我只要说明身份，就可以免遭毒打。可是，我没有吭声，准确地说，已经没有这样的想法。在目击了复兴路到西单的惨景后，我已经把自己开除出“军队”——我已经不是军人，也不是军报的记者。

我就是西单路口的市民，就是广场上的学生。

我从地上爬起来，还没站稳，军警又追上来，不容分说，挥棍就打，他们疯了！这个社会疯了！

在日后的审查中，清查组的人推断出我的被打伤，一定是骂了人，或参与了什么活动。其实，我没那么勇敢，不过是咬紧牙关，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挨打，也比同流合污好。

我被追打着到了午门。由北向南的第一个照明灯下，我感到头上左边一股热血往上涌，天昏地暗，“我要死了！”我大叫着倒了下去。

有人夹住我往外拖。张胜……又有军警过来了，他们又举起了警棍。我听见张胜说：“别打了，她已经给打死了。”那些人叫着：“就是要打死你们这些人，谁让你们听到‘通告’还不走。不打她，打你！”

张胜继续拖着我，终于，被拖出了午门。他扶着我，问：“怎么样，伤到哪了？能走吗？”我吃力地摇摇头。他说：“你趴在我肩膀上，我把你背出去。”谁知，刚靠近他的背，他自己也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我说：“你也受伤了吧？”他说：“没事，再来一次。”我小心地趴到他背上，听见他大声地喘着气。

不知是鼓励我，还是鼓励他自己，他反复说：“能出来就好，哪怕有一个人活着也好。”

我头上的血往下流，把他的汗衫染红了。

他把我背到东华门口，自己趴在一个铁栅栏上，大口地喘着气，之后说：“好像肋骨被打断了。”我劝他赶紧离开这里，万一那些军警们回来，我们会丧命的。他伏在栅栏上，用低得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儿子和妻子都在里面，我怎么能走？”

天安门广场方向，枪声鞭炮似的密集。这时，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见我满脸是血，上来搀扶我，要送我去医院。我声嘶力竭地拉着张胜：“我不离开你，我要和你一起去医院，你也受伤了，也是重伤。”他直起身来，对那个年轻人说：“我不要紧，我还要进去找我儿子和妻子。拜托你了，一定把她送到医院。”

这时又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陌生人，他让小伙子把我放在他的车座，骑车送我去。我头昏目眩，根本坐不住，小伙子决定由他在后面扶着我，陌生人推着车，两人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有人受伤了，快叫出租车！”。

在东华门出租汽车站，只有车而没有司机，还有一些外国人，他们被我的样子惊呆了，“是中国人，她是中国人！”一个男人喊着：“快用手压住颈动脉，否则血会流干的！”他们拦住了一辆刚刚发动的小汽车：“有伤员，请你们停下来！”车门打开，一车的金发碧眼。我认出来，这是在午门遇到的外国同行。他们见有伤员，不由分说，立即开动，把我们送往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门口，一辆公共汽车堵在门口，我们的车停在旁边的岔路上。那位挎相机的外国同行打开车门，扶我下车。只见从那辆公共汽车上跳下来一位老大爷，他泪流满面的喊：“医生们，快来救我车上的人，他们全是被枪打中的，死的死，伤的伤，快救救他们吧！”协和医院门口跑出数十个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一位穿白大褂的人撞到了那位外国女记者，照相机掉在水泥地上，我看到马达和机身分裂了，我想帮她拿，小伙子不让，架着我往里跑，我回过头来问：“你是哪个国家的？”小伙子急了：“都什么时候了，命要紧，快走吧！”“你快走，我们还要去发稿。”女记者说着消失了。

几天后，当我头缠纱布躺在床上，看到一本朋友送来的《参考消息》，上面刊登：“我们的记者救了一名中国姑娘”。

看到这条消息，我哭了，我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普通公民，而不是中国记者。因为我再也无法把自己看到的所见所闻报告给外界了。我所目睹的一切都成了“反革命谣言”。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在反复刊登和播放由“戒严部队新闻处”提供的“新闻”材料。

对著者讲述的军官记得，他是在第二天接到张胜电话的：“小亮——”张胜说，“人丢了，帮我找啊。”自己的事，他不便出面……毕竟涉及党内斗争。他爸刚写了信，你孩子又丢了。宣扬出去……我赶紧联

系北京军区 / 戒严指挥部；他那边是通过军委办公厅，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几条渠道。两天之后才找到。张小亮，小手指头都打断了，也是咬死了什么都不说。

6月4日

子时，各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连续广播。广场上十多万市民学生，剩下数千名。

丑时，6月2日参与绝食的四君子，在红十字会医生陪同下，出面与金水桥边的部队谈判。38军112师336团政委季兴国上校出面接应，许诺立刻报告。

正在此刻，“准备清场”时间（4时）到。广场上灯光关闭。

数分钟后，有新的命令下达——双方决议达成：留出广场东南口，尽快带领人群撤出。军队在限定时间内不开枪。此突发情况，依照38军序列，直报到天安门指挥部，罗干从天安门指挥部跑到中南海。李鹏、乔石和杨尚昆当即做出决策。

广场的地面上，没有形成如柴玲所“期盼”的血流成河，而是不折不扣执行按照邓、杨的部署，真的没有死一个人。

但事实是，即使在已经清场、学生撤离之后，还在流血。一名大学教师的讲述：

6月3日深夜，学校派车接回一车（或本校、或外校，总归是广场的）同学后，该校一名共青团干部……同车的团委副书记说，“不行，我还得去一趟。”说完自己转身就去了。第二天（6月4日）早晨，我在校门接到他：一脸的惊恐。

我问怎么了？他说，本想到广场看看还有没有学生。到西单，看见的，全是新的戒严部队，新进来的”……他没再往广场那边走，站在西单路口朝学生喊：“都跟我回去！往学校跑！”

好多学生跟着他跑。跑到西四那儿，听见后边跟着打枪了！听见后边“通”的一声。跟在我身后的一个女学生说：老

师，后边有人倒了。他头也没回的喊：什么也别管，自己赶紧跑。女生说：不行，我得救他呀……那学生一回身，砰，又是一枪……他回过头，亲眼看见那女学生要去救那倒下的男生的时候，又一发子弹过来……

这名团委书记说：无论如何我得走了。他说：我绝不在这个国家待着了。实在受不了了。怎么能这样！？

过了两天，他真走了——到澳大利亚去了。

徐勤先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在决策刚刚形成、命令刚刚下达时所预料的，终于难于避免。

寅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李鹏“六四”日记》）

“人民”——新华门影壁上那金光闪闪的大字么？

但是，人民确是有的——五十天来，从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身上，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何谓赤子苍生、何谓礼失求诸于野。

连拉带拽、带呵斥、带恳求，周舵带着伤（非枪击而是棒戳——这又是什么武器？），从广场东南口、到新文化街、到六部口，一路连劝带骂，最后随撤出人群来到西单路口。25年过去，这位温煦君子面对著者镜头述说这段经历……说到这里，竟哽咽着语不成声——“满地狼藉啊：衣服、鞋子、自行车、血迹……但沿街橱窗，不见丝毫破损”——他站在那里，呆住了。北京没坏人？小偷呢，盗匪呢，都罢工了？

四十年来，毛共口中的“人民”、“群众”，缴纳贡赋、下工地干活、上战场卖命……如此而已！而这五十天，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好青年好孩子们、为了未来与正义，似乎是，胸中激荡着一股凛然之气，往日间小小的妒忌、猥琐、贪婪……似乎是，在一个新的、几近全民对未来的呼喊中，一扫而光——自己真正看得起自己了！

自尊，基于对正义、对自身权利切实认可的自尊——这，邓小平，孜孜于“大权不可旁落”铁腕专权的邓小平，你知道么？

这里，再为读史人加进的两个小花絮。

一是6月4日上午，著者在家中接到的一个电话，一个当年发小、彼时现役军官打过来的电话。

我拿起话筒。对方迟疑了一会儿，说，“我，XH。”

我惊问：“XH，你……在哪儿啊？”

他答：“武警总值班室。”

我朝话筒喊起来：“你们干的什么呀！！”

XH只说了一句：“邓小平让干的”。

再一个，为读者补入一点开枪后的余绪：

友人YL，大约在6月5、6号（或者9号以后）吧，突然接到李先念儿媳电话，请YL到她家坐坐。她与YL算是认识，但并非知交，也不常走动。几句天气之类闲话后，主人不咸不淡地说：6月3号那天夜里，爸爸被枪声惊醒，叫起秘书。秘书也不知怎么回事。爸爸让他联络陈云那边，问陈爸爸知道吗。秘书立办。没多久秘书报告——陈处答复说：陈爸爸那边也听到了，不知怎么回事。

YL说，不知道听到枪声、打电话问云云是真是假。也不知她叫他过去说这一番话什么意思，除了本著者，YL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过此节。

而真有其事的是后发的戒严部队，在这天早晨：

7时许，数以万计的民众将28集团军的车队堵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民众向官兵们宣讲屠杀情景，官兵们起初不相信，有民众从附近的邮电医院拿来血衣展示，官兵们军心浮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头消极抗命，不顾中央军委派来直升机在上空下达的强行进军命令，最后弃车而去。

该集团军包括31辆装甲车、2辆电台通讯车在内的74辆车被烧毁。（《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这天，依照代表中央主管党报王维澄（李先念前秘书）之安排，出现在《人民日报》一版的，是转发《解放军报》社论——标题：《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开篇第一句：

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人民日报》值班总编辑陆超祺问：暴乱发生，怎么不见政府（包括国务院、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电台、电视台向人民宣布，而要在一天之后，由军报发社论宣布？

这篇断言6月3日凌晨发生严重反革命暴乱的文字，是从哪里、又是怎么来的？

《人民日报》自从4月26日发表社论之后，此后的四十多天里，公开发布的官方（正面）意见，只有消息、讲话、报道，直到6月16日，也就是在邓小平的6月9日讲话（新华社消息）两周之后了，《人民日报》社论才第二次出现——《统一全党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五十多天里，不仅《人民日报》，其他报纸一概没有动静。

到了6月4日。这天，《解放军报》推出通栏社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怎么回事？

前一天晚上，在军报办公室值夜班林冬，收到一纸文字——来人语气决断：“社论。立刻发。”

林东瞟了一眼标题。强压住内心悲愤的涌动，对来说：“作为社论发表，必须有人签字。否则不行。”来人愣了片刻，见这小值班员语气毋庸置疑，抓起文稿，返身走了。没多久，社论稿再次送达。签发人（唯一）：杨白冰。

林冬说，社论在他手里压了两个小时。杨白冰非常生气。

6月5日

这天，据吴仁华：

戒严部队仅控制了天安门区域，以及东长安街天安门城楼至建国门立交桥路段、西长安街天安门城楼至复兴门立交桥路段。20、24、27、38、63、65集团军、空降兵15军、北京军区炮兵14师、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等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区域。（《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戒严部队拥挤在广场区域，情况混乱，杨尚昆说：“若有一个班部队哗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昨日紧急将邓小平嫡系部队、南京军区的12集团军空运进京，作为督战队。12集团军在国共内战时期隶属第二野战军，邓小平任二野政委。

李鹏担心戒严部队面对北京各界民众的普遍抗议而士气低落，凌晨1时，与王震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看望部队官兵，为他们打气。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情绪十分紧张，要求成立北京市区级戒严指挥部，实行区自为战，保卫广大居民和机关的安全。办法是以区委和政府为主，同时配备一定数量的戒严部队，加以配合。李鹏同意李锡铭的意见，并通知戒严指挥部研究他提出的方案。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发动在京机关为部队送主食，战士食宿虽已有安排，但没有蔬菜吃。几万官兵都挤在大会堂各大厅内地板上睡，特别是厕所不够，大小便困难，室内空气污浊，如不迅速解决，部队难以为继。

李鹏等认为，目前至关重要的事，是打通天安门各方的交通干线，保证部队给养畅通。于是，天津坦克1师和38军坦克6师，多次奉命出动，武装押送戒严部队的给养车队。

于是这天上午，在长安街上，一列坦克车队由西向东驶去。30年来，作为中国人抗暴的典范，一直在全世界传布的“坦克人”（至今不知他是谁，也不知他后来的下落），就站在这列坦克前边。

著者有幸采访到一位现场目击者、当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教师、不肯放弃任何精彩镜头的摄影迷王欧。下边是他的讲述：

6月5日早晨，我骑车从家里出来，往南骑，在军委两栋大楼那儿，右转，上了北长街。从南长街出来，沿着长安街朝东，这时候……

在公安部门口，我看见街面上有新鲜的血迹，两摊——不像是前两天留下的，那已经发黑了。是新鲜的血……

过公安部，往东跑，翻过一个铁栏杆，到了北京市委那一带。我们一群人站在正义路

临长安街的路口。旁边还有几个人，但都不认得。

这时候，听见一阵坦克车驶过来轰轰轰的声音。

就在这时候，看见了坦克人。

他在坦克前边，不是十多米，不是两三米，好像还要近。

我看见他小步左挪右挪。

（坦克人爬上坦克的场面，叙述人不记得了。）

后来又过来几个人。大家看着他，都特紧张。

有个骑自行车的，就过去把他拉过来了——跑着，拉到我们这边的圈子来了，拉到正义路，靠东单这边的路口。

这人看上去不像学生，也不像北京人。个子比我矮一点（我180cm）。我朝他喊：你不要命啦？别傻了，坦克……要死也不能这么死啊！你还可以做点事儿的啊！

他什么也没说，脸色煞白，懵懵的样子——就是特别茫然那种神情——也不一定是茫然，就是经历生死那一刻、惊魂未定那种感觉。

他也没回答，时间很短。就在这时候，我们正说着，看见坦克车里的军人出来，端着枪，滴溜滴溜沿着墙，慢慢往这边走，枪口正对着我们这边。

我们当时也没害怕，因为刚刚看到，“坦克人”想死它都没压，我们不过在旁边看，应该也没什么事儿。我们还在那说……（从坦克里边出来的人，向我们这边）走到离我们差不多20米的时候，端起枪，突然扫射了。

扫射，在白天，子弹射出是看不见的，就听到打到旁边的草里嗖嗖的。我认为在当时，那几个解放军没打算打死我们。他如果朝人扫射的话，我们不给打死也会受伤。他就是吓唬我们。

他还是很有准儿的，那个枪。我们没什么事，但没有选择，大家转过头，撒丫子就跑……跑的方向、快慢，谁也不掌握……就是跑。当时年轻，我也就三十多岁吧，一口气就窜出好几百米。我记得还拉了一个女的一块儿跑……但是，“坦克

人”在哪里，已经知道了。再也没见到他……后边的事都不记得了。

在此采访基础上，著者曾就“专业训练之便衣”、“手语”等说法，请教相应领域人士。他们认为，这些，都属于臆想：

当时无论警方军方，绝对没有可能预知、布岗并且策划。别说北京市局，就是刘华清，他都因为得不到具体及时的报告心里没底，竟然让他的保健医生骑自行车到广场看，回来跟他说。

结束了，“镇压反革命暴乱”？

6月6日

下午，“反革命暴乱”平息之后第一次六元老加新常委班子的会议，在西山举行。邓小平再谈“四项基本原则”，再谈“稳定压倒一切”。

在这次会上，确定了6月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和紧接着（6月21-23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再走一趟中共自延安定盘以来，粉饰规则的过场，以合法方式认定非法干下的事情。

江泽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发表。——谰言归谰言，国人受到十足威慑。

6月8日

下午，通过邓办，李鹏把三天以来的情况和目前采取的措施都详细报告了邓小平。

6月9日

震惊世界的“六四”平暴结束。

邓小平在王权象征的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武力宣威功臣——“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捍卫者”、“最可爱的人”。

对此次怀仁堂接见，在邓讲过“一看就明白是什么事……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之后，《晚年邓小平》的作者引用了大型文献记录片《邓小平》里边“四川口音的原声”：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不是因为这次动乱，这十年就发生问题，正确性发生问题，正不正确？这十年！我们制定的，包括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发展三部曲，正不正确？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右，是不是“左”的问题？

我想我们没有做出一种“左”的判断，也没有提出过过急的目标。因此第一个问题要回答的，我们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它是失败的。（《晚年邓小平》）

这番话，说给谁听的——底下坐着的那帮刚刚镇暴完活儿的大兵？

近两个月来的广场抗议，可以说，没有一条标语、一个口号，是将矛头指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就是骂李鹏（以及后来骂邓小平），也从没有否定过改革开放的“大目标”，包括“发展三部曲”。^{【66】}

若说邓小平的改开大业要由兵们开着坦克保卫，底下坐着的这群里边，有谁知道何谓“‘左’的判断”？有谁知道邓制定的战略目标，被哪些人下了“失败”之判语？

只能说，到了此刻，面对“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84岁的老人，心心念念的，而且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何种手段保卫的，自己十年来奋力开拓的成果啊。

另有一段，也为后来整理“官版6月9日讲话”的同志们所不取。军委邓主席说：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

【66】 又称“三步走”，即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家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如果话只说到这里，应该说，与5月18日38军徐勤先军长抗命的出发点大致一致。然而，邓主席接着说的是：

……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同上）

不错，在正义路临长安街的路口，一辆东驶的坦克没有朝那位拦在前边的无名青年“压过去”。六部口呢，6月4日清晨7时许，当撤离广场返校的学生，从这里拐上西长安街，沿自行车西行的当口，天津坦克一师的三辆坦克在团长罗刚率领下，一边开枪、施放军用瓦斯弹，一边快速追轧学生队伍，是在干什么？编号106的坦克冲向学生，当场11人死亡，多人重伤。邓小平，你是不知道，还是明明知道偏这么说？

读史诸君当然也已经注意到本文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多少尚待披露、尚待剖析的顶级绝密啊。对自己国度历史，民众有知情权——民众要求真相之上的正义与和解。

我们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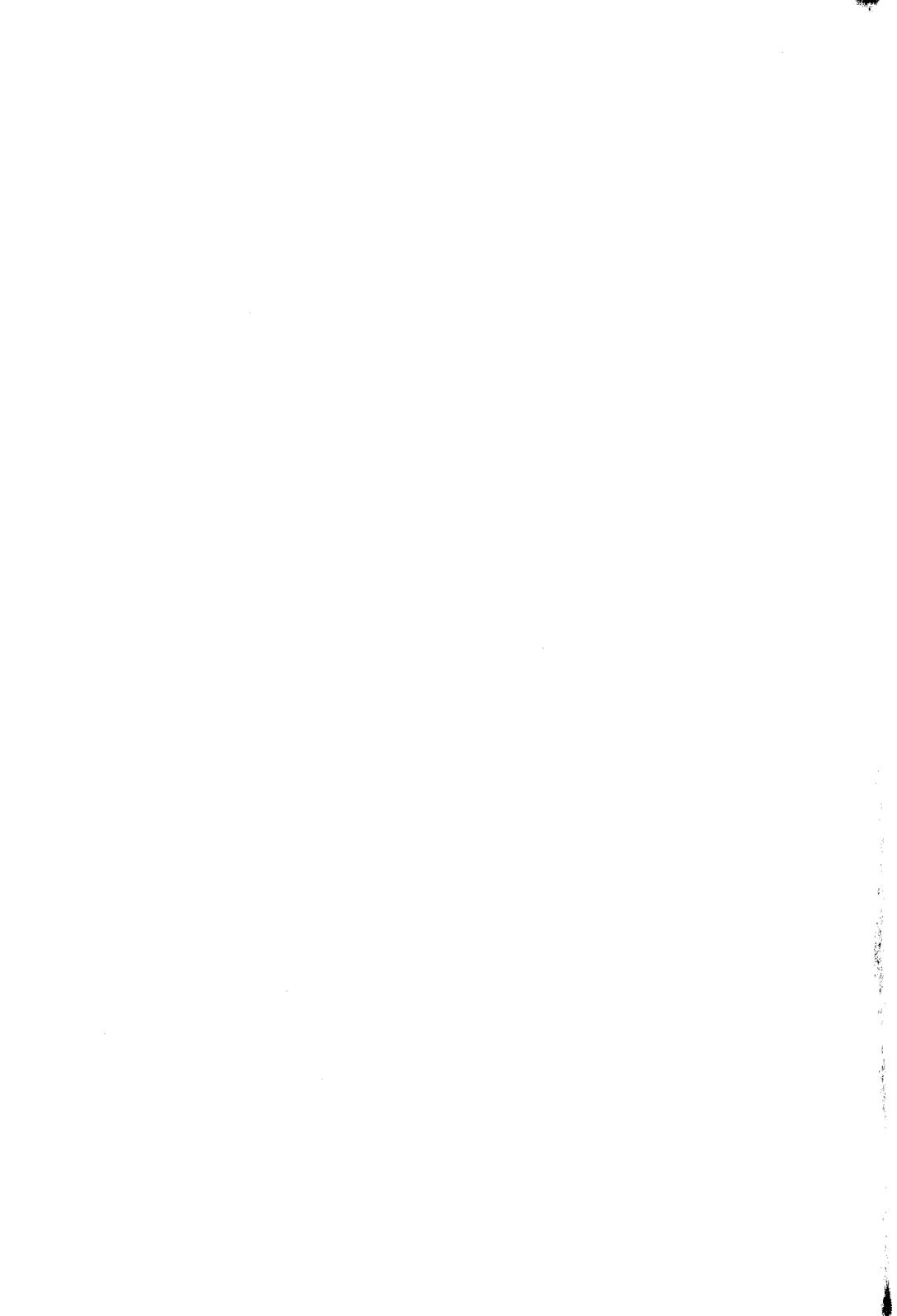


炎炎夏日

——处理异己

鲜血
在
烈日下烤炙

意志与良知
？



从上边给出的一出又一出众好汉“行状”里，对这“千年之传统”，只觉目不暇接。枪杆完活，笔杆接棒。左倾卫道大笔杆叫出的第一句：赵紫阳垮台，对我邓力群的诬陷攻击得到澄清！自6月中，连续数月，这位实际已经不在位的“左王”，入中南海，主持（坚持四个坚持为何不力的）“反思会”，“老同志”个个正襟危坐，跟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怔营惶怖，差相仿佛。

也在这个袈节儿上，6月16日，赶在预定的四中全会前之“政治局扩大”前，小平同志把即将成为“新常委”的六位（三旧三新）找到家里，又是一通三代、核心、政治交代等等。里边比较精彩的一句是“服从核心”：有老毛为核心，文革才没有打倒共产党。是否暗含着，今日核心邓、明日核心江、一代代核心下去，共产党江山永固？

6月19日，全会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场。主题：批赵紫阳，为下边的换将程序做铺垫——不意碰上硬汉子（《赵紫阳就六四事件自辩书》）。

在这之前，“六四”之后，成立了一个“中央清查办公室”。这可是陈云地盘啊，谁人负责？卫道们竟然没抢下来。负责人：新任书记处书记丁关根。

清查对象，自然是鲍彤和政研室：发动学潮、指挥动乱的“幕后黑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而赵，这一切的“总后台”——好家伙，“文吓”说辞，又全扣这儿了。然而据后来流出的信息，清查报告上去，丁“拍了桌子”。

对赵，闪过邓力群们漫天飞的掉花枪，小平同志怎么看？据传邓朴方说：“若论才气，全党谁都比不上赵。但他太自私，太看重自己的清誉。”（采访李欲晓）

在这里全文引用该会主题兼主角赵紫阳的叙述——没有比这更恳切扎实的了：

6月19日至2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建议撤消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

接着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做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批判会开始时邓未到场。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两句话，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我的组织处理。王震的发言主要是说，邓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67]。

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10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钟。

因为我的发言披露了事实真相、争论的实质，对会议对我的指责进行了申辩，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听我发言时，面部紧张，急躁不安。我发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我当即离开会场。除我之外其他人没有动。显然他们事先打了招呼，对我的发言不满意，对我的态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消了。原来李鹏的报告以

[67]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胡耀邦待遇。华国锋是“中委”）。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及一些人的发言中，都说要撤销我的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但这次拿出的稿子，却把中央委员也撤销了。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分。

但我发言时邓小平、陈云不在场，所以估计他们又报告了邓和陈。（《改革历程》）

这里，赵的估计没错。6月21日，会议的最后半天，邓到场了。没有多余的话，只甩出了两张牌：第一，赵的党内职务全摘（即不但政治局，中委也不能留任，只留党籍），第二，票不够、列席凑。

邓小平这时，真正失望了——对赵紫阳。

小平啊，您真真一个毛之爱徒：“老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党龄70有余，《党章》各项规定，不知道？赵说：

这一次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听可以讲，怎么可以参加表决呢？大概是为了壮大声势吧！当时李先念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这完全是以势压人，哪里还管什么《党章》党规？（同上）

赵说，

对于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但《党章》明文规定，党员对处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明确规定，“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

由于我进行了申辩，就加重了对我的处理，这是完全违反《党章》和党的规定的。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么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我本来想在表决时发表一个声明：“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后来

一想，许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邓小平、聂帅等等，我发一个声明，会更刺激他们，话到嘴边又忍住了。但在表决决议稿时我不仅没投赞成票，而且举手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说：对撤销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不同意、不接受。

我声明后，在场的人，包括邓，以及主持会议的李鹏，都没有做声，大概他们也早有精神准备。（同上）

紧接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6月22至23日），各方利益早已搞掂：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一揽子撤下赵，走个过场而已。过场归过场，对读史人而言，还是有看点的。

首先，常委是双数（六名），有点不合常规吧？但闭幕次日，由新华社统一稿，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边的“集体照”，却是七人，正当中加了个杨尚昆。杨当时职务：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这衔，与政治局常委没什么相干吧，但在此刻，这样张扬掌军权的“特殊地位”，没法不让人想起十三届一中全会最后那一幕：鼓掌通过——今后“重大问题仍然要请（军委主席）小平同志掌舵！”

但军委邓主席明明还在。加重杨尚昆的份量，是对“春夏之交”精当表现的奖掖？还是为制衡江及背后之陈、李？

在这次全会上，没再玩大批判。胡启立、阎明复、芮杏文等人，悄没声地免职而已。

距此大约一个月前，即5月19日的邓记“十三太保会”之后，胡启立实际已经给放置一边。但这次全会，他是在场的。北方有句描摹人品的老话：“这孩子仁义啊！”——放在陕西乡党启立同志身上，最合适不过。对自己的入常，以及这回的免职，他只说：

难忘奖掖提携之恩^[68]。但到此时（怎么对待学潮），只有对不起小平同志了。在小平同志面前，我不过一个毛孩子，忠于

[68] 与坊间泛论不同，胡启立并非团派。耀邦就多次说过，启立是小平同志选定的。至于小平在什么时候以及怎么注意到他，一个细节是：1966年8月，毛亲自下场之前，胡担任刘邓主管的北京市西城区工作组长。对于当时各中学（包括邓榕就读的师大女附中）学生此阶段过激行为，他全部包揽下来，不上推不下诿。另一小段花絮：1987赵代理总书记。到10月，

党的毛孩子。我永远不会背叛党，但坚持认为，在组织内发表意见，是每一个党员的基本权利。

还有阎明复。邓小平对他非常赏识——他的人品、学识、行事风格。小平不止一次夸他为人谦虚、干练、知识渊博，说他风度翩翩。十三大讨论中央委员，邓说：我就推荐一个人，阎明复。

不知亲历 1989 春夏之交的人是否记得，学运，大学生闹事，怎么高教部门庭冷落，繁难的事，全是统战部出面。原来，当年的学运领袖何东昌早已具备了党所欣赏的“政权意识”，对“振臂一呼”们之形右实左已然洞若观火，与紫阳之天真兼爱顾完全不合。

陈必大（陈璠、袁永熙之子）写道：

蒋南翔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作“宋襄公式的蠢猪”。（《陈必大：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

阎明复完全不同了。如何为党做“统战”——在独立意识蓬勃萌生于社会的时代，在共产党员们也不仅仅只知遵纪、“修养”的时代？

阎部长有他独特的、与时俱进的思考和举措。可以说，在改开时代，明复同志是同时为紫阳信赖、又为邓所激赏的人。

赵信赖他，是因为价值取向。邓赏识他，最主要的，当然出于历史渊源（1950年代末以俄文秘书身份共襄“九评”），但处事为人上……他与赵紫阳是很不同的。

紫阳，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除了工作，上下同志间，没有特别私谊（比方说子女秘书间相互帮衬）。但阎明复是有的，他肯在各家的走动、

十三大五常委已定，胡启立入，负责意识形态。陈云把他找到家里。“列宁《帝国主义论》读了？”“哪五大特征？”胡启立恭敬应付。考试毕，临出门时，陈云对他说：你不懂马列。邓力群懂得。你不要跟他过不去。（刘宏遵）

他和尚昆、小平间的私谊^[69]——对此，赵看到也看重。虽然他自己（与阎明复相比较）更加正直耿介，但对别人，宽容体谅。

在1989年的炎炎夏日，对这三位，邓小平为什么如此苛峻寡情？他们不过协助总书记，以温和理性的态度对待学潮，怎么啦？当年袍哥会，也不见这么对待自己的弟兄吧？

对红色中国“打天下”老伙计（红军、八路与新四、一二三四野）间盘根错节之恩怨，有实地了解的Y说：

邓的冷酷寡恩，源于他自己文化水准低，几乎不读书。对知识人，在人文领域，疏远、无好感。特别是那些“蔑视权威、有独立人格的人”。这一点，与胡赵，是完全不同的。

邓，在理论上，是大短板。他周遭的一批人，讨他喜欢的，王震、丁关根、王瑞林，杨尚昆……都是没有观点的。

炎炎夏日里，在国内一片惊惧、国外一片制裁声中，针对“反革命暴乱”的大通缉、大清查、大逮捕，当然还有大奖掖、大提拔，开始了。

方励之夫妇避入美国大使馆；“决不妥协”的广场好汉，经“民间救援”，逃往境外；一批不入卫道者法眼的，分别被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区县公安分局、这支或那支戒严部队抓进牢房——其中最冤的，除了横尸街头的不算，就是作为暴乱首犯而立即处决的八位北京市民。^[70]

[69] 现引阎明复与邓家私谊一小例：1987年，他曾安排邓榕通过当选全国妇联常委，踏入副部级。本以为“小事一桩”，阎部长没有考虑周全的是，基于当年社会的觉醒，妇女们已经越来越看重她们“庄严的一票”，待到（近200名）当选执委差额投票选（近20名）常委的时候，投票人也想到要问问“邓榕同志在人大工作，为什么是解放军的代表”，结果邓家公主落选（与邓力群的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落选类似）。阎明复的安排落空。

[7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6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判处一批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期间进行打砸抢烧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放火犯林昭荣、陈坚、祖建军、王连禧、王汉武、张文奎，抢劫犯罗红军、流氓犯班会杰等八名罪犯，一审判判处死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流氓犯”看似无关，但不宜分开。

这些虫蚁细事，邓是毫不挂怀的。他坚信，镇暴之后的四中全会，定能为中国赢得了十到二十年的稳定。至于国际制裁，傅高义说：

邓小平显示出自信：中国有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经历，一定能够挺过 1989 年之后外国的制裁。他说，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很快，严厉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续几年。他认为外国商人会向他们的政府施压改善对华关系，以便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外国政府也会重新认识到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要站稳立场，鼓励外国友人终止制裁，为好好利用将来的每一个机会作好准备。

他坚信，庞然大物的中国，世界是无法无视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果然，布什总统见了钱其琛（换取中国在联合国的支持）——这是镇暴之后恢复中美关系重要的一步。到 7 月初，邓会见了布什总统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

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之前，邓小平对李鹏和钱其琛说，今天和美国人的会谈只谈原则，不讲具体问题；中国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中国领导人既不怕美国人，也不怕制裁，外交人员要牢记这一点。（同上）

据陪同斯考克罗夫特的美国人说，邓小平亲切问候了他们，他说：

我把布什总统当作朋友，是因为自从我与他交往以来，我觉得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少说空话假话。（同上）

但是邓小平在评价中美关系时，态度不但强硬，极其严肃。谈及“六四”时，他说，那个事件——

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国人也涉足太深……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把中国逼入墙角。……那场反革命暴乱的目的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让他们得逞，就会天下大乱。坦率地说，这有可能导致战争。（同上）

邓小平接着谴责了美国帮助那些试图推翻中国政府的人，并且说，美国的媒体夸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国内政。他认为布什决定向中国派出两名特使，是一件好事。

看来仍有希望维持我们原来的良好关系。……我相信这是布什总统的愿望。我本人也有同样的愿望。但这种性质的问题是不能从两个人做朋友的角度加以解决的。（同上）

邓小平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

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取决于美国不再火上浇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22年仗、死了2000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同上）

邓小平请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他对“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友情……无论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谈的如何，只要他继续把我当朋友，我也会同样对待他。”

他把布什对镇压的谴责称作“中美关系的不幸插曲”。他要看，“为了结束它……要看美国采取何种行动。”

邓为什么取这样的态度——他的武断、偏狭、底气，还有不问是非、不受制约的气概，基于何种理论、何种社会现实？或者……累世相传的御民术？

随后，邓便去了北戴河。

下边，他重点着手做的，就是那件他说呀说呀、说了几年、看上去他最要做，却最不肯做的大事：退休。应该说，不是他恋栈——他没什么可恋，只看1992，他真正“全退”之后，照样红太阳一轮。他的逡巡趋赴，是想着怎么让那些大佬退下。而大佬们百般不让他退，其实是自己不想退。

这回，他老话重提。在八月的北戴河，对杨尚昆、王震他们说：今年一定完成全退（1987那次算是“半退”）。

真的大撒手啦？或者，还藏着什么猫腻？

阴冷深秋

——以退逼退

阴冷的布局中
社会溃败之困境
已现

.....



秋风起。

1989年9月4日，还是在家里，邓小平向中央几位负责同志（六常委加杨、万），再做“政治交代”：

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举重若轻喔——人还在，起作用。这么大事，他说得相当“家常”：

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

对十三届一中全会那出（“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小平同志，最后的决策人是小平同志”），此刻心境依然纠结。他“真诚地”对同志们说：

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对于退休、甚至最后离去的方式，他都在这次说了：

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

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话是这么说了，依旧放心不下：

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要确定国家军委主席。

当然要有，要确定。您老退休了，就别……邓小平此刻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

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以上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同时提名杨尚昆兼副主席，刘华清任副主席，杨白冰任秘书长！呵呵，“人还在、起作用”。

他接着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回，没有人再玩假招子，恳请“别、别、别”。政治局决定，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说是讨论，用得着么？但相应文件必须准备——于是又引出一个小花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共的大人物都不自己动笔了。对邓而言，最著名的应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的：他的重磅发言，原本交给胡乔木，不料会场的自由开放着实让他一惊，于是有了于光远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回呢，辞军委主席？邓特别指定胡乔木和邓力群为中央起草“同意”决定——而不过几天前，当宋平再度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要给这位前“左”统领安排位置的时候，邓坚决不许。最后同意了李先念的提议，许他到政协去当个副主席。

小邓在老邓心里，啥印象呢——好文笔、刁心计？

终于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十三届五中全会。这时候，北京已入阴冷深秋。

天道冷归冷，官场可是十分火爆。

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常委班子，平暴前就定下了——记得吧，5月31日，邓在西山分两批召见。

亮相，是在初夏——记得吧，6月23日，那张遮掩又张扬的“3+1+3”照片？

几乎大获全胜的陈、李，在这届常委里，有了江泽民、李鹏、姚依林、宋平——经济、计划、外交、组织人事、治理整顿……重头领域大权，无不在握。邓系的小木匠管意识形态——这局面下，怎么管？扫黄吗？乔石……政法？政已定，有法么？

丁关根给放到书记处。

但此次全会的大主题是邓小平从军委主席任上退下。退下后由江泽民同志接任。这话，早已放出，不知说了多少遍了。

且慢，还有戏哪——军委出了个刘华清……确切说，刘上将华清同志晚年的奇异经历，这时候突然冒出。

刘华清，1916年生人，一般印象，长过征的海军司令——也该中顾委了吧？

不错。红色交通员加儿童团长出身，小刘文化不高，却朴实厚道。到了1937年，已经是八路军129师司令部的秘书主任。更巧的是，该师政委张浩病重，小刘接受任务，跋山涉水到山西去接新政委邓小平。

建政之后，中刘的跌跌撞撞这里不说了。到1987年11月中，也就是十三大闭幕后两周左右，71岁的老刘突然被军委主席邓小平指定为副秘书长。

读史人或许知道在解放军里，总长以及军委秘书长，不同时段的特别地位；或许记得1977年，邓小平如何面对汪东兴对罗瑞卿任总长的顽拒，把他信赖且倚重的罗安置为军委秘书长——从那时起，此职位，已经是主席之下百官之上。

十三大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其实对赵而言，根本没感觉——两头夹着他的，还有主席邓和常务副主席，而且，常务副主席还兼着这要命的秘书长。

这回，成了第一副主席的尚昆同志哪里忙得过来？小平遂为他安置了两枚只干事、不揽权、年岁也很老了的老实人。

平平安安两年过去。到1989年拿掉赵紫阳之后，又出么蛾子：

这年深秋，73岁的刘华清已经回中顾委，正以委员身份列席十三届五中全会。那天会上，印发了邓小平9月间与江等六常委、杨尚昆、万里的谈话要点材料。在这份《要点》中，白纸黑字：

邓小平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提名江泽民任军委主席，杨尚昆兼副主席，刘华清任副主席，杨白冰任秘书长。

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吃惊了：小平同志提名我当军委副主席！

我感到自己能力难以胜任。于是，给小平同志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向邓主席报告：还是选别人好。

邓办的同志告诉我：“邓主席已经定了，不会改变。”

我不再坚持了。（《刘华清回忆录》）

在十三届五中全会当场，邓小平说：

刘华清当副主席，杨白冰当秘书长。

我们军队中老干部四方面军的占大多数，这个副主席要是四方面军的。刘华清是四方面军的，某种程度上说是比较年轻力壮一点的，身体好，是能听党的话的。当然，听党的话的人多得很，但是他几个条件都具备，我比较倾向这次加一个副主席，搞一个新秘书长，作为泽民同志的主要助手。（《刘华清年谱》）

11月9日下午，全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提议议定的中央军委人事安排：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杨尚昆、刘华清；

委员： 杨白冰、秦基伟、迟浩田、赵南起

注意：在“六四”之前，邓就表示打算让赵紫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以逼退其他元老，向总书记集中权力，保证改革路线。现在换马不换阵，江虽然是陈的人，邓也按原计划转交（军委主席）大位，但你陈的人能掌军？

还有：军委委员四人各司其职（参政后三总部和国防部长）。刘华清呢？

还有：杨白冰，军内，总政主任兼军委秘书长；党内，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

还有：他哥，不仅军委第一副主席，还是国家主席哪。

这是不是在诏告天下：杨尚昆此刻，已在担当辅佐“弱主”的摄政王？论功行赏啊！春夏之交忠心效力终得回报——权倾朝野“杨家将”！

大得意，再多一点，就是太得意。此时距十四大，还有两年。

中共忙着封官还愿，可有人注意，也正是在这天，柏林墙倒塌？

紧接着，五中全会落幕——恢弘而温馨。官媒是如此报道的：

11月12日，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即刻驱车前往会场。

在休息厅，邓小平与第三代领导人以及在场的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合影留念。在会议大厅，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中央三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代表。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

“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邓小平在江泽民的陪同下，与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见面。邓说：

“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而确定的。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2日）

绝对是在演戏啊——如此真心实意地演。而且，“我还在关注”……这时，算是87至89这一大波高层权斗划上了句号——你们再闹，再砍（我左膀右臂），大权（军队），共产党的天下，依旧在我手里。

这道理，在那场合，是不是每个人都明细？

都知道毛一直说：党指挥枪。但一路打天下而后坐天下的权贵们之共识：党什么时候指挥过枪，从来都是枪指挥党。

这，不正是邓一路践行的——

中共建政，依照许诺，须“政治协商，民主建国”。为适应新形势，党中央不再建军委。这局面一直延到1954年——几次运动下来，协商建政的诸位已然钳口。

毛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再度恢复：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无；军委委员，十大元帅之外，就他一个——届时正担负着党与政府职务的邓小平。

统领武力之威、随意调用武力之意气，切实潜藏在这两位几乎不穿军装的政治家灵魂里——邓，毛之爱徒啊。

然而，他的军功？

大事已毕，快到月底的时候，小平同志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回顾“刘邓大军”的历史，以及，指挥“淮海战役”的头功。当年的邓政委说：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同上）

是这样吗？读史诸君对照刘伯承与粟裕的传记细琢磨。

就在邓小平正式退休和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11月10日），老朋友亨利·基辛格秘密来到北京。总统密使也脚跟脚地抵达。对此，美国民众后来（12月18日）才得知。他们认为，政府代表秘密飞往这个在街头枪击手无寸铁的民主拥护者的共产党国家，是对道义的践踏，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布什宣布停止高层交往之后。

据傅高义：

邓小平对基辛格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会继续。他请把他的信转交布什，其中提出了一揽子外交设想：

- （1）中国允许正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异见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前往美国；
- （2）美国取消一部分对华制裁；
- （3）双方设法签订一到两项重要的经济合作计划；
- （4）江泽民访问美国。

几个月后的1990年5月，布什宣布批准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中国已经同意让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出国的决定。（《邓小平时代》）

在第二次访问中，邓小平对密使们说，没有牢固的中美关系，也难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又说，并不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而是美国的政策威胁着中国；此外，如果中国发生更多的动乱，对全世界都有很大危害。

他用和缓轻松的语气，请斯考克罗夫特转告布什，在中国，有一个退休老人，相信中美关系很重要，双方必须想办法解决问题。

几乎就在这同时，罗马尼亚局势紧张起来——齐奥塞斯库在12月17日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东欧领导人中唯一下令军队向平民开枪的人）；12月25日夫妇二人被新政权枪决。

此人可算是邓的亲密战友：1965年在华沙组织、1985年向邓颁发该国最高勋章、以及，代表邓向戈尔巴乔夫传话……斯考克罗夫特当时正在北京，他说，中国领导人过去经常赞扬齐奥塞斯库，说这人证明了共产党能够顶住自由派的猛攻。

除了“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活动”之外，中国官方无一字泄露“听说罗马尼亚的事变后感到的惊恐”。眼下唯一能对此局面给出的一点信息，是当局出台了正处在公检法调查阶段的“黑手”的严厉政策：对在押的“黑手”们，年底前，“杀一批，关一批，流放一批”。

其中，第一批杀掉的六名，名单已定，^{【71】}包括正在秦城坐牢的著者。

此霹雳政策的出台——心境、行事风格，都很像邓小平。

【71】这是高检人员到秦城监狱提审犯人，在餐厅讨论案情时候，声音过高，被也在旁边用餐的工作人员听到：著者正在这六名当中。（戴晴《在秦城坐牢》）。

又一春暖 ——扳回一局？

比拔扞
比机谋
比谁活得长

活得长
意味着
也只意味着……

坦克从长安街撤出。中国上空，镇压的阴云难于散去。

政治上——“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治理整顿”，精神与文化——人人检讨过关。“左倾卫道”空前强大：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和平演变”！

邓小平的威望？他左右局势的影响力？

这年，中国国际环境：一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一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全世界都谴责中国，谴责中共，外商大都撤走了。

邓意志坚定依旧。他告诫新班子：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这几句“嗑儿”，对于背靠陈、李两大恩人的江泽民、李鹏而言，犹如春风过马耳。邓在北京说话，失灵了。

不听是么？那就找个听得进的地方。

1990年1月，邓小平到上海。这回，还用不着军队。他有把握拿到手的，是政治力量，是使他得以压倒保守派经济政策的“官心商心”。

上海，中国现代经济从来的龙头老大，商业金融工业多项全能，在改开十年却被陈云死死按住，不得施展拳脚。小平此番南下，用不着动军队。他有把握拿到手的，是改开之政治威力，是使他得以压倒保守派经济政策的“官心商心”。

小平同志找到知音：朱镕基、黄奇帆……开场话题：浦东开发！

《新区十大政策》出台。他说出他们的渴想：浦东开发开放晚了整整五年，如果要早一点起步更好。朱镕基的回应：“新区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

早春回到北京，再谆嘱李鹏江泽民，还加上杨尚昆，不厌其烦地说、说、说：

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同上）

没人理。那，咱们就转到“开放”这手棋。

遥想1980年，邓曾对世界银行的麦克纳马拉说“中国未来与世行的关系中，观念比钱更重要”。镇暴以来，全世界声讨同步，关系当然中断。到1990年中，似乎有所松动：以释放“‘六四’政治犯”（200名，本著者为其中之一）为条件，世行对中国“有条件恢复贷款”。

6月间，就在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赵紫阳一切党内职务一周年的时候（6月21日），审查组长王任重向他宣布结论：罪错“三十条”。赵驳回二十一条。邓小平表态：到此为止。

暴戾肃杀之气，一点点收敛？敛爪收牙，换一副笑脸，重新开门迎客？

年底，十三届七中全会将开。邓小平还想给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他们上课：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放弃保守的经济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苏联和东欧的覆辙。

（同上）

不理。“治理整顿”们担心的，不是增长速度放慢，而是过热。

全国经济局势，萧条。

萧条归萧条，处于社会意识形态光谱最左端，也即最坚定凶狠的“毛左卫道”，把手伸向各领域：春节期间，王震在广州召集“有关专家”座谈会，向中央上书，把国务院“五年之内不谈三峡”的决定否掉，将此工程再度提上日程。在镇暴后的政局之下，自然一路顺风。到1992年，由本已“归队”的万里主持，此灾难工程获人大通过。

李锐说：“六四”与三峡，是邓小平对中国犯下的两桩罪。在他生命的最后一页，第次达成。

1991年到了。

邓小平再到上海。他“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出现在《解放日报》：

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

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邓力群与之针锋相对，回以《人民日报》社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

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

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小平在江南、沪上这里那里的讲话，一一传到北京：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乔石、田纪云在中央党校旗帜鲜明地呼应。当代理论与思想界“左王”不让步。省委书记们应召入京，“反和平演变训练班”在中央党校开场。

1991年8月12日，苏联解体。

二十多年来，无数文章探讨社会主义阵营怎么会轰然一下分崩离析。深浅远近，精当贴切。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共当局的“六四”镇压，也可归为不容忽略的导致全世界共产党垮台的要素之一。

邓小平当然不这么看，估计也没人敢这么对他说。流传出来的，只有他让身边人员转告中央负责人的那句话：

苏联今天发生的事件是紧急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事件。中国的表态要研究一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

他自己呢，据邓质方：

苏联垮台，老爷子就一直自己呆着，不跟任何人交流。突然一下子，就自己贯通了，知道该干啥了，于是有了南巡讲话。（王育琨《小平南巡原版：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

“该干啥”？坚持自己开创的改革开放啊——人民为什么拥护我们？经济必须上去！

邓小平认为，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其高层领导人也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苏联还和美国搞军备竞赛，钱都花在武器上，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

天安门镇压之后和苏联解体这段时间，邓小平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邓小平时代》）

此信念，对他而言，是不可动摇的：这是他自认为由他主导的中国改革，比苏联高明的地方。

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他的思索，从未上升到文明与制度层面。至于眼下邓力群他们闹得正欢的马列毛之意识形态道统……邓质方说：

有一次，我问老爷子：共产党讲究按劳分配，您现在鼓励搞股份制，这不是按资分配了吗？这不是在搞资本主义吗？！老爷子沉思了好一会儿，说：我们这代人的智慧，不足以做出判断。还是留给更有智慧的后人做判断吧！（同上）

这年10月5日，金日成生前最后一次访华——也邓小平最后一次见外宾。当时邓小平这样说：

从历史上来看，同盟是不能相信的。军事同盟也不能相信。（未取得对方同意不能废除的朝中同盟条约），也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只能相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太具邓小平风格了。与对越作战一样，这套说辞，为的是下一步改开行动——第二年，韩中两国打破禁忌迅速建交。

1991年底，该开八中全会了，左倾卫道们上仍占上风。改革能否走下去？邓小平改变战术：不再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这里不挺爷，自有挺爷处。

时间走到了1992年。

一月中，就在邓力群在北京发表宏文《学习毛泽东，做坚定革命者》；陈云也提出：“重新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加强党的建设”之当口，广东省接到一则中办通知：

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1月17日——按照后来传媒的说法，在孙辈放寒假后一天，邓带着全家加随员共17人，登上南行列车。1月18日上午，到武昌，停靠20分钟。

按照惯例，书记省长到车站。关广富嘻嘻笑着趋前，说“接到中办通知，小平同志……”，接下去，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的，邓发了脾气……最后，乘着这股气，撂下一句：

回去说，谁不改革谁下台！

关书记吓傻，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此时，距“六四”镇暴，已有两年多。“退休老人”一词，是不是已经深嵌于这俩湖北佬之脑际？区区“中办通知……”，对于胸中澎湃着南下大布局的总设计师，过于简慢了吧？【72】

列车于当天下午抵达长沙火车站，邓小平花十分钟时间见了湖南官员。最后指示：

湖南，搞改革开放的胆子要更大一些……要加快经济发展。（《邓小平时代》）

然后到了广州。以及，深圳和珠海。

这块土地，与他刚刚离开的北京、两湖比，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亲尝小平改开带来的物质红利与精神解放，广东的干部百姓，对北方的镇暴阴霾好像没感觉。邓爷爷、小平伯伯来了——迎救星、接亲人啊！

小平兴致很高，谈锋甚健。媒体，当地的、香港的，感觉到老人此行之分量，激情澎湃，奋勇尾随，生怕漏掉一个字、一个细节。

这里那里，说这说那……

一件与南巡似乎毫无关联的事，发生在此刻：1月20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广东省珠海市召开。

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王芳、刘复之、贾春旺、蔡诚、周文元、陶泗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党委主管政法工作的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大单位的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72】此细节引自著者与友人KG面谈。关广富，KG父辈早年下属。他们一直在琢磨，小平同志哪儿来的气。

第二天，21日，王瑞林直接（而非通过军委办公厅）通知杨尚昆和刘华清两个军委副主席到深圳，^[73]给出的事由是“陪同”。事实上，从公开报道看，也确是如此——大家从媒体报道看到的，全是什么植树啊，什么“两个主席”啊等场景。

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者解释。贾延安大秘立刻联络广东，获知邓当时下榻的宾馆：桂园。电话打过去，王瑞林接听。江泽民亲询：刘华清去深圳，（军委这边）为什么没有事先得到通知？王瑞林的回答是：他也不知道刘华清临行前为什么没说。

心中小鼓敲起来。

1月24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闭幕。邓，以及军委三巨头，都过去了。当然也可能是那边的会结束，乔石一个人（还有谁？）过来。关于这次会，28年过去，给出些微披露的，只有傅高义一人：

“珠海会议乔石主持。杨尚昆和刘华清到会。还有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

在珠海，邓小平召开了一个表面上与军事规划有关的会议。

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他们对加快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也与邓小平意见一致。

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邓小平时代》）

当时无官媒报道珠海会议，事后《邓小平年谱》中也没有相关纪录。

另有一则传播最广（也相当邪乎）的花絮：江泽民吓坏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贾庆林给了他一份会议录音；此后不久官方就宣布贾庆林入选政治局。

说它邪乎，是因为，前来参会的北京那一大票里边，难道没一个老江心腹？谁能在会场录音——福建公安厅长安还是安全局长？邓乔杨他

【73】此刻，没有提是否也通知了杨白冰。

们私下谈的，福建方也能录到？没有人追问。也没人敢追问，更别提披露。

但珠海会议，确是邓南巡之最重头。1989年对左倾卫道让步，弄成今天这样子。他必须扳回这一局，以挽救快让他们折腾光了的改开大业。珠海会议，无疑是这一“扳”的发力点。

此“扳”，究竟是筹划有时，还是到了特区之后灵机一动？

见乔石，在北京的时候就有商议？还是人到珠海之后，得知政法委正在开会？^[74]与乔石议论之下，主意打定——上老套路：“枪指挥党”。把他们三个叫过来！

注意：此时，正是江总书记晕乎乎不知听哪位才好的十三届八中全会（91年11月），和邓笃定已扳回了一局的十三届九中全会（92年10月）之间。

谜底的揭开，或许就在某一时刻——当有研究者可以披览小平同志92年间起居注的时候。

1992年的冬春时节，热闹啊！

1月31日，邓北上，到上海，拟在那里休息了三周。郑必坚赶过去，为他的“南巡讲话”，整理出一部7000字稿。

2月3日，江泽民打来拜年电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接着，到了月底，江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勉强传达了“删减版”的南巡讲话。即使这小小转身，也很为老左们不屑。用“六四”屠杀后派到《人民日报》任社长的高狄的话说，《讲话》不过出自“一个普通党员”；邓力群也在毛左喉舌双月刊《当代思潮》发文，强调：

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左，而是来自右。

信奉自由主义执迷不悟的人，正是打着反“左”的幌子，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如不加以反击，结果必然是各种反共思想的大泛滥。

[74] 在傅高义的书里，对这次“与军事规划有关的会议”邓小平的角色，他有时用“召开”，有时用“参加”。

在“南巡”的最后一站上海，邓小平讲了一段后来整理文稿时被删去的话：

有人问我，难道今天还要全面批邓小平路线？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那个高狄想干什么？看来《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他们不发表改革开放文章，你们可以多发，广东也可以讲话。总之，现在不是四人帮当道的时代了，谁也别想封住我们的口。（阮铭《邓小平帝国三十年》）

《人民日报》不得不稍稍变脸。在邓小平回京的2月21日，刊发了据郑必坚“整理稿”撰写的社论《更大胆地进行改革》。对于已经为港媒报了一个月小平南巡，依旧只字未提。

只隔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了。校长乔石亮剑，力挺小平。开学典礼讲话：“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

再看看下边顶层拉开架势的几招：

- 4月26日，中央党校校长乔石邀请田纪云副总理到中央党校给省部级干部做报告。报告内容：支持改革开放。
- 李先念旋即出手，批田纪云中央党校报告。
- 江泽民要求田向李道歉。田拒绝。
- 小平发话：公开肯定田纪云的讲话没有错，是个好报告。

到了月底，江泽民批准：郑必坚“整理稿”作为“中央2号文件”下发。获此消息，深圳那边壮起胆子，连发八篇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报道，包括稍晚些的《东风来满眼春》。

这一连串交手，在3月9日至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了初步结果：15名政治局委员讨论2号文件后，表态“一致支持”。新华社终于正式报道了邓小平南行。到了月底的七届五次人大会上，杨白冰再次醒目地吆喝：“军队是改革开放的坚强后盾”，“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解放军报》社论）

小平同志南巡，终于在全国上下各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又到春夏之交。88岁的老爷子一鼓作气：两次视察首钢（陈希同陪）；“中央4号文件”出台：开放长江沿岸、边境、内陆省会城市！邓的“南北巡”，再度成为改革的行动指南、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以及，接下来的中共十四大的主题。

直至今时，邓还没有“召见”过江泽民。

5月，李先念、王震先后报病危，老天爷推了摇摆不定的江泽民一把，总书记打算彻底认怂了。

是不是，“不换思路，换人”的“小平同志说”包括布局，已经传到他耳朵里？那就快换“思路”！

6月9日，江泽民到党校毕业班，做了一个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为稳妥，干脆又攒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取代陈云“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比紫阳当年为应付陈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又跨前了一步。

三天后，总书记惴惴地登门讨教。邓小平告诉他，喜欢。江如释重负。邓又加了一句：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江泽民再接再厉，提出：

中共十四大报告要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

着重阐明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就是要一百年不动摇！

在珠海气呼呼地说过的“换人”呢——势转境迁啦。

政争权争啊！邓小平“六四”那一退，虽然舍掉自己一线干员，但你陈的人，是在我大兵监督下的喔。陈云对此此毫不介意。对，你有兵，但保的是我的政策方针。

但到此刻，邓已经可以说，不错，那是十三届九中全会以前。南巡，我已扳回了一局：代表你“方针政策”的江，终于认怂，你的人执行的是我的路线。还有什么，出手吧！

局势发展到此，按说不该再有什么意外，顺坡儿开十四大吧？不料人生苦短，欲壑难填。

8月，邓中风住院。

杨白冰召开高级将领碰头会，商讨十四大军队人事安排。但为什么在这个日子口？是不是暗含着“老邓百年之后”？杨秘书长此刻，居然开列出拟提拔的100名中高级将领。

此名单，交刘华清和杨尚昆批准之后，呈递江泽民审核。

你杨家兄弟自以为十三届五中全会被安到监军位置、南巡期间敏锐乖觉、人大高叫“保驾护航”……但肆意点将……以为自己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啦？没注意，身边还有总政副主任呢。谁？不正是你自己特地从南京军区调上来、但已给调教得换了一个人似的于永波啊。

接着的故事是：

总政副主任于永波向江告密。老江全懵。曾庆红出手，通过康华的俞正声、刘京向朴方“进言”：这是要在军内彻底替换“老爷子”人马呀。

下边是：军委主席江某获召，带着于永波见邓。邓呢，叫来刘华清稳坐御侧——这是告诉江，你状告杨家兄弟有别心，朕知道了。但常委里边，我依旧有心腹。

于是有了这年的那封信：共产党员、退休老人（88岁）邓小平，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提出刘华清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进入政治局，并增加另一个比刘华清还老的老实头子张震为军委副主席。

信里说：

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据我了解，刘华清、张震同志最熟悉军队。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

依旧是，军人秉政。大权，依旧在邓小平之手。

杨家兄弟呢？

历史致密大幕底下流出的信息，表浅且零星：

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杨尚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被罢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同时被罢免的，还有他的弟弟杨白冰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当时，邓小平走出会场准备回家，杨尚昆等人一直把他送到电梯口。邓小平站住了，对杨尚昆说：你要想得开！杨尚昆连着说了两遍：想得开，想得开。【75】

江，位置依旧。即“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当然须接受军人时时“辅佐”——但人已换，没杨家什么事了，换成小平同志信里说的刘华清（76岁）张震（78岁）。

煊赫一时的杨尚昆，随“中顾委”一道悄没声儿下场。杨白冰呢？军委职务拿掉，退役，空留一个“政治局委员”——他之后在此位置上的“发挥”，比耀邦当年还屏声敛气。

读史人或许已经注意到：煌煌《李鹏“六四”日记》里边，如此重头人物，居然只有一处稍了一下名字【76】。

这里头，藏着什么玄机？

杨白冰，“六四”镇暴，高调示忠、临场鼓励士气，已有确凿证据：“镇压命令”的签署、“不计一切命令”的下达，他的责任？当时军内传：总参作战部，居然找不出作战命令。开枪的命令，到底谁下的？【77】以及，《解放军报》“六四”社论的预制与签署。

镇暴之后的90至92年，他又有动作。当年现役军人对著者说：

他作为军委秘书长，责令总政干部，把所有戒严中立功受奖那些人，通通弄到国防大学，连续举办了两期“戒严干部培

【75】选自2015年9月14日“周说”微信公众号，作者周志兴系共识网创办人，原题为《点点滴滴话尚昆：作为国家主席的他竟吃我们的剩菜》。这是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拍到的画面。但不允许用。

【76】提到一处即5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

【77】中宣部制作“六四风波的经过”，要求司局级以上党政军官员观看，“当场看，当场收回”。见香港媒体在2004年报道。

训班”。就像当年对越作战之后搞的“对越作战培训班”——培训完毕，马上提拔。档案里要记上。

正式文件都有——总政直接下任务，有师团职，张工、张美远、罗刚什么的都在里头吧？当时说的是“这些人都要提起来”。他还讲——这个案翻了，我下去，你们也完了。

不就是培养和他绑在一起的杨家军么？“保驾护航”，防谁？江已服软，陈李已经无力。保驾者明显在强调自己在邓系统的位置。

到了1991年，杨秘书长（自获得此位置后，他坚持所有的人对他只能用此敬称，不许用别的）的气势，已经直指李瑞环。在一次南京军区获（文化部）奖，进京演出的场合，因为CCTV只准备拍摄小木匠看演出而忽视了他，秘书长当场发飙，把准备在北京会演的“好戏”当场定为“坏戏”，取消门票已经售出的三场演出……在场军装笔挺中将少将无人敢有一丝忤逆。周旋得最出彩的，正是侍候身边的于副主任永波。【78】

看戏发飙，众人瞠目而已。还有隐秘的呢。诸位记得军报记者江林吧：6月3日夜在午门被打得头破血流？后来，她觉得，怎么也要把自己的亲历记录下来，就算活不下来，也要留给后世。撑着病体，江林整理采访记录并写下午门亲历，合称为《大件》——

1991年，我“大件”手稿丢失，先落到北京市公安局，后来被送到了部队，直送军委杨秘书长并总政工作组。为此建立了“江林专案”。

我的专案组长，就是杨白冰。他不让保卫部门插手，全是他自己直接管。他说，保卫部你们可以派人到“江专案”，但如何发展，与你们无关——这是后来参与专案的人告诉我的。专案组直通杨白冰。后来让我写材料，都是“军委杨秘书长并总

【78】 以上极简细节取自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邓海南《杨白冰的霸气》。读史诸君一定上网找原文细读。

政审查组”。调查对象：同情江林的人（三总部师以上干部）。一定把这些人揪出来、开除出军队。

比如材料里有张胜（在午门背我出来），由此即可牵涉到他家。再比如上将赵南起，他曾派他秘书到处找我，把我从海南找回，说帮我找工作。

小小江林不算什么。杨白冰要把所有同情我的给挖出来，把他们打成“反对邓决策的一伙”，把他们归在“对立的那条路线上”……

张胜后来告诉我，杨白冰曾经特别得意，把“江林专案材料”拿给杨尚昆。当哥哥的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弄这个！”

哥以为“都什么时候”了呢？老弟我这不是再献忠心么——坚决拥护镇暴邓路线！理念、套路、手法，与毛主席、与小平同志的6月9日讲话，并无一丝冲突啊。

那么，别再“弄这个”，为什么？

杨秘书长有没有注意到九中全会里边那“决定”：

同意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并结束审查。

这不就是邓对王任重丁关根他们说的：“到此为止。”

爱将紫阳啊。这是陈云他们逼他干下的：自断臂膀、血溅长街。

最后落下谁——杨白冰！文革整人材料也上来了。张爱萍他们，当时就捂着盖着别再张扬，成了“军内反邓派”……

杨尚昆没骂他“猪队友”。但到了“这时候”，只能是“不可说不可说”。不懂吗？

没见陈云认输。大限已近，他最后露面支持改开。然而表态后还有一小“嘚瑟”：在最后一次政治发言里，陈云同志没头没脑地给小平来了一句：擒拿四人帮，他其实无功而拔头筹。

再说两句刘华清：小平这回选人，似乎是，最注重人品：诚实、敦厚、本分。为什么他们两人？129师战壕之谊，固然绵长，但更重要

的，或许是杨白冰的教训：贼胆儿大而没品，敢放这位置上？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记得邱会作说“九一三”么？他想了整整十年，对毛那番做戏，终于想清楚了：原来不是怕他跑，是怕他不跑！这回刘华清，依小平同志安排，原来不是要他做什么，要的是什么都不做——这一局已经扳回，你们给我戳那儿就行了。

不过邓身后，在江又张狂起来的时候，刘华清和张震还真的做了什么——这已经是另外的故事了。

就在这一届，仅仅按上两位老军头挟着江，看来还不够。邓小平隔代指定了江泽民之后的总书记：胡锦涛。

尾声

1997年，邓小平病逝。他的病，官方说法：

1997年2月，医院报了病危。根据医生解释，他心脏健康，肝脾也好，致命的是“帕金森综合征”。临终前，在看到电视屏幕上的自己的时候，“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异样的羞涩”。（301随侍医生黄琳）。

他走得潇洒：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骨灰撒向大海；角膜和器官捐赠。

追悼会，江泽民主持。据观察：“喜极而泣”，摘眼镜抹泪凡三回。卓琳率一众高官厚禄、事业有成、腰缠万贯子女送别。^{【79】}正合了“邓小平的每个后代都应该积极要求进步”；也一一身体力行了父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号召。

众百姓——四里长街送别：^{【80】}

【79】 长女邓林，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长婿吴建常，自南巡后率有色总公司在香港成立中国有色（香港），与李嘉诚联手，至此，已“掌控整个中国有色金属（包括黄金、白银）、稀有金属、稀土生意”，掌握数十亿元资产。长子邓朴方淡出大小康华，时任中国残联主席、党组书记，99年12月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待遇，2001年11月明确为正部长级。次女邓楠，国家科技部副部长；次婿张宏，与吴建常联手，在美国发展，掌控稀土矿市场。幼女邓榕，小平同志办公室副主任（副部级待遇），版税逾千万的作家；婿贺平，总参装备部副部长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幼子邓质方，留美物理学博士。南巡后，低价“圈地”、联手周北方、李嘉诚，“首长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80】 官方报道“沿途2公里送行”；看CCTV记录片，人群的年龄、类型过于统一。著者怀疑是有组织的。

北大师大，打出白布自制标语——“小平走好”^{【81】}

不由得让人想起同样质地和风格的：

1984，“小平您好”

1989，“小平尔好狠”（尔为你字去人心）、“小平你好糊涂”

追悼会上结束两天后，全国军队和武警军官，被要求学习江总书记所致的悼词，被要求“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完全一致。

至此，邓小平在1989，以及，1990-92，应该算是给自己——共产大统之接棒人——的一生，划上句号了：先追随、后辅佐、继而承袭、再在承袭之上修补，表号为“第二代领导核心”。

这句号，红的？黑的？五色杂染或金光曦曦？大不同啦。

这就是邓小平的1989：

改开大业澎湃于胸，再年轻20岁也力所不及。

同志们较劲不遗余力，党内厮杀毫不留情。

一场接一场小戏大戏推出，政争之下的权争——百姓血溅街头。

以退为守——换你的人，但大权不可旁落，“改开”大业不可丢。

其实，中国数千年的中央帝国皇权体制，就算挂靠了“国际”，披上了红旗，其厚实板结的主奴文化土壤，以及扎根于此的军事政治行政架构，再套上——这是最逗乐的——20世纪以来，拜开放之赐而囹圄个儿趸来的政治局、书记处、常委会……到了1989年，军委主席邓小平，与恩师“大救星”一样，正经红色帝王一枚啦。

红色帝王，也是帝王。

明君？昏君？庸君？暴君？——讲求实际的“爱民”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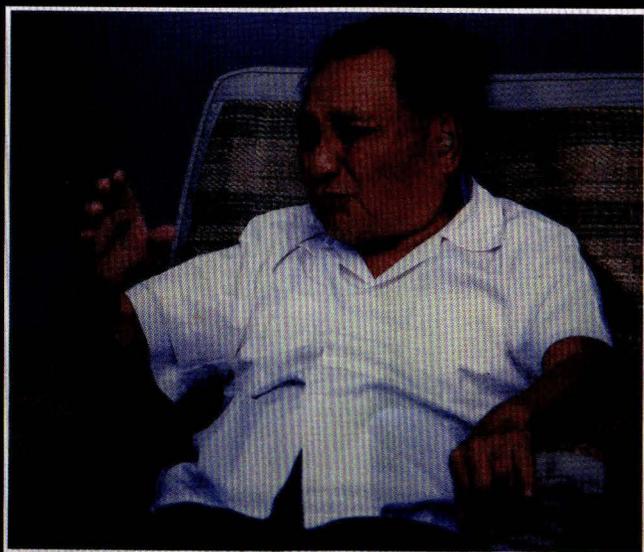
历史将给出回答。

【81】民间有一说：官方学生会组织专人制作打出。可以为此动机再证实的，是2019，邓榕参加的纪念“小平您好”35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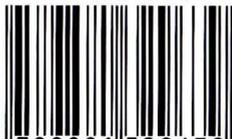
三十年了，我从48岁长到了78岁，
积累了三十年的史实与史识，
交出这部“未定稿”。

这是著者作为亲历者、作为调查记者的讲述和叩问；
基于三十年来所能翻检到的著述与文档，
对可敬的、“豁出去了”的当事人的采访，
以及历世阅人半个多世纪日渐养成的逻辑与常识的交叉印证。
而关于这段历史的“定稿”，
还要等多久？

——戴晴



ISBN 978-988-13296-3-9



世纪出版社

CENTURY PRESS